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大卫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林兆木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本刊专论 •

努力实现工业强国百年梦想 苗 圩(005)

大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聂振邦 胡恒洋 邱天朝(014)

• 国际经济 •

论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 徐占忱 陈文玲(026)

2014 年:“安倍经济学”面临大考 王绍辉(038)

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融资模式比较研究 梁云凤 肖 鹏(048)

• 宏观经济 •

关于“营改增”改革问题深化研究 沈开艳 杨亚琴 汤蕴懿(058)

现阶段我国民间投资格局与未来展望 王元京 史 昊 刘 明(072)

• 产业发展 •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重视的几个关系 姜长云(088)

• 企业发展 •

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调整研究 宋 群(096)

• 理论前沿 •

办好智库刊物是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 王晓红(106)

• 名人观察 •

产业变革和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卢中原(116)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3)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31)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 年度)评奖公告 (134)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36)

2014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

征文启事 (封二)



CONTENTS

Working to Achieve the Dream for a Century: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owerful Nation	<i>Miao Wei</i> (005)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ie Zhenbang, Hu Hengyang and Qiu Tianchao</i> (014)
On the Strategies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 Major Countries in the New Period	<i>Xu Zhanchen and Chen Wenling</i> (026)
In 2014: Abenomics Will be Put to the Test	<i>Wang Shaohui</i> (03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arket Financing Mod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Liang Yunfeng and Xiaopeng</i> (048)
A Study on the Reform Program: "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i>Shen Kaiyan, Yang Yaqin and Tang Yunyi</i> (058)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Prospects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Wang Yuanjing, Shi Hao and Liu Ming</i> (072)
Several Relation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	<i>Jiang Changyun</i> (088)
Research on Deepen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Enterprises	<i>Song Qun</i> (096)
Making a Good Think-Tank Periodical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ink-Tank Influence	<i>Wang Xiaohong</i> (106)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Lu Zhongyuan</i> (116)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努力实现工业强国百年梦想

苗 圩

摘 要：建设工业强国，是实现工业由大变强的使命使然，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经过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转变，迎来了建设工业强国新的历史性阶段。建设工业强国，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参与和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工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环境。

关键词：工业强国 转型升级 自主创新 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苗 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揭示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凝聚国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为各行各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追逐“工业强国梦”，奋力谱写中国梦的工业篇章。

一、建设工业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自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成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渠道和现代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工业兴则国家兴，工业强则国家强。建设工业强国，是实现工业由大变强的使命使然，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一）从战略目标看，建设工业强国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要求。纵观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部工业化与现代化相伴而行的历史。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工业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现代化的速度、效率和水平，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没有实现工业化，就谈不上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现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就是加快实现工业化。要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放眼全球，结合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打造世界工业强国，为到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从核心任务看，建设工业强国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经过建国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工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转变，但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深刻调整，要素支撑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过去长期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工业自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直接影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推进工业强国建设，有助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形成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等新的发展方式，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三）从实施途径看，建设工业强国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工业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兴起无一不是始于工业腾飞，而伴随国家地位衰落起伏的也是工业的没落跌宕。国际金融危机后，债务沉重、受虚拟经济泡沫拖累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重新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力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而诸多新兴经济体也期待通过强化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追赶的目标。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迫切需要推动中国工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有序接替，实现从成本竞争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素质红利转变，从资

源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进工业强国建设，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在全球制造业分工版图重构中抢占有利地位，有利于培育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四）从支撑条件看，建设工业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现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还是提高工业综合实力。工业集中度高、关联性强、技术复杂、价值链长、带动能力强，为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提供原材料、燃料、装备和动力，为文化产业提供技术基础和消费市场，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供工业消费品。它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是国家经济自主、政治独立、国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加快建设工业强国，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可以更好地发挥工业的带动作用，使工业化成果扩散到整个现代产业体系，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民众更好地享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牢牢把握建设工业强国的历史机遇

自洋务运动开始，建设工业强国寄托着数代志士仁人的光荣与梦想，承载着推动民族经济振兴的历史重任。经过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转变，迎来了建设工业强国新的历史性阶段。

（一）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建成了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1 个中类、581 个小类，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占比达到 19.8%，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一个半世纪后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资料，按照国际工业标准分类，在 22 个大类中，中国烟草、纺织品、电力装备、交通工具等七大类行业规模名列全球第一；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水泥、粗钢、汽车、家电等 220 多种居世界第一。2013 年，中国工业品出口达到 2.1 万亿美元，占全球 1/7，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中国企业迅速崛起，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入围“世界 500 强”的工业企业有 36 家，总营业额达 2.27 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是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已经有 1.6 万多家投资者在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2.2 万家，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5257 亿美元。

（二）充分认清中国与世界工业强国的差距

综观世界工业强国，都有几个共同特征：技术强，掌握世界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企业强，拥有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和知名品牌；产品强，占据全球高端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软实力强，具有强大的工业人才优势和鲜明的工业文明特征。目前，中国工业的基本特征是大而不强，与世界工业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一是总体规模大但人均规模小。虽然中国工业总体规模世界第一，但就人均而言，2011 年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仅相当于美国的 21%、日本的 18%、德国的 16%。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较少，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低。三是产品质量整体不高。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 10%，国外通报召回问题产品数量居高不下，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 2000 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四是资源利用效率偏低。据英国 BP 公司统计，2012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为 329.5 吨标油 / 百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9 倍、美国的 2.4 倍、日本的 3.65 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五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部分传统行业集中度相对偏低，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空间布局不合理，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严重。六是行业领军企业较少。2013 年中国进入“世界 500 强”的工业企业有 36 家，仅为美国的 60%；25 个品牌入选世界品牌 500 强，仅相当于美国的 1/10，领军企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七是信息化水平不高。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水平亟待提升，设计、管理、控制、优化等高端核心工业软件主要依赖进口，大部分地区和行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仍处于以初级或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且不同地区、行业及不同规模企业间差距明显。

（三）切实抓住建设工业强国的历史机遇

纵观历史，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往往能够深刻影响和改变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每次产业革命都会伴随着大国崛起。英国、美国、日本、德国都是因为抓住了产业变革的机遇，先后崛起为世界强国。令人扼腕的是，中国接连错失两次工业革命机遇，没能及时建立起适应生产社会化趋势、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业体系，从而落后于时代步伐，最终导致国家在近代发展中衰落。当前，以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和深度应用为标志，全球范围正在酝酿兴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经过长期追赶发展的沉淀和积累，本轮产业变革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最小的一次，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建设工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即将

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切实增强机遇意识，积极迎接新一轮产业变革，妥善应对挑战，奋力谱写中国梦的工业篇章，实现工业强国的百年梦想。

三、不断开创建设工业强国的新局面

建设工业强国，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

（一）以做强制造业为核心，夯实工业强国基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提高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制造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决定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建设工业强国，必须以做强制造业为核心，进一步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提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加快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努力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工业结构的阶梯式升级。一是要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度，运用市场机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突出矛盾，促进传统制造业高端化、精细化、清洁化发展，提升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的源动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化转型，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效率持续改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发展格局。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科技创新对工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不足。建设工业强国，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工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一是要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的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千军万马搞创新的生动局面。二是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产学研结合机制和模式，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形成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的“多级火箭助推机制”，使科研成果有效地进入企业生产经营领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要切实加大基础研

究投入。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尤其是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行业共性技术，突破中国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四是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技术成果转化机制；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创新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五是要大力倡导“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努力营造勇于干事创业、大胆开拓创新的社会氛围，充分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三）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当前，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向深度融合方向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必将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国既无时间也无必要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必须把信息化的时代特征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两化深度融合为重要内涵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使命，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制高点。一是要加强两化融合顶层设计。建立两化融合推进机制，借鉴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做法，制定一套非强制性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引导企业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数字共享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使产业链上的各企业间能够实现数据共享，为企业通过工业自动化集成控制系统实现协同奠定基础。二是要深化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的集成应用。广泛应用互联网改造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跨界深度融合，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三是要加强两化融合支撑能力建设。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和“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尽快建成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绿色的网络基础设施；集中突破高端芯片、关键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软件、大型行业应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大力发展应用电子和工业软件，形成重大信息系统产业链配套能力。四是要大胆探索两化融合新模式新业态。增强互联网意识，积极采用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制造、按需制造、众包设计等新型制造方式，鼓励支持平台经济、互联网直销、移动 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到线下”）等新商业模式发展，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实施质量品牌战略，提高工业发展效益

质量品牌是产品高附加值的载体，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源泉。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是推动中国工业由大变强的战略选择，是打造竞争新优势的迫切要求。必须大力实施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以提升经济效率为核心，不断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一是要提升产品质量。健全质量发展政策与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发展的地位，改善产品质

量的政策环境；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推广先进质量技术和管理方法，推动企业建立全员、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在重点领域推广可靠性工程，加强产品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研究，提高产品内在质量和使用寿命。二是要加强品牌培育。完善鼓励工业品牌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改进产品外观设计、包装质量与售后服务等，不断提升品牌的质量形象与市场竞争力；组织开展全国性品牌培育试点，完善品牌培育方法，引导优势企业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建立品牌培育评价机制，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宣传，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努力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中国工业品牌。三是要强化安全保障。建立企业质量诚信管理体系和评价机制，引导企业通过产品质量自我声明，承诺和履行保证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生产、流通、进出口环节的质量监管，增强质量安全溯源能力，加大对失信企业的监管和惩处力度；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质量公共服务平台，增强中小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提升产业链的整体质量水平；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五）推行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也是工业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设工业强国，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一是要建立支持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综合运用环境管制、环境税、碳税、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完善绿色技术、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的标准，严格规范和管理，激励和约束企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二是要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理念。坚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降低工业能源消耗总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废水、废气及固体废物排放，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三是要加快现有生产装备的节能环保改造。大力开发和推广量大面广的节能、节材和环保技术装备，发展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设备，推广高效绿色生产工艺，积极发展再制造产业，构建节约、清洁、安全、低碳的绿色工业体系。四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探索推进节能环保的新机制新模式，积极尝试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节能减排新机制，加快形成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努力营造建设工业强国的良好环境

建设工业强国，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参与和努力，需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工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环境。

（一）研究制定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引导工业强国建设方向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谋划新时期工业发展，纷纷制定发布体现国家意志的工业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顺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潮流而动，加强工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把建设工业强国转化为国家意志，增强工业发展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争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是要研究制定实施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丰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内涵，提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路径、战略重点和行动计划，明确建设工业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引导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方向。二是要构建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抓紧研究建立一套可与世界接轨、体现中国特色、便于实际操作的评价指标和测算方法，定期发布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估报告，引导工业强国建设有序推进。三是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完善支持工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实施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营造各方面关心、支持工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优秀人才投入工业发展。

（二）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增强工业强国建设动力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建设工业强国的最大动力。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创新助推工业转型升级。一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继续修订完善工业领域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进一步缩减核准范围，简化报批手续，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真正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二是要推进市场准入改革。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继续推动社会资本进入电信、军工等领域取得新进展；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打造“生得顺利、死得顺畅”的产业生态环境。三是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扩大中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政策覆盖面，壮大产业发展基金规模，发挥政府采购、首台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对创新的扶持作用，建立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体系。四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倾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制造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和比例，推动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服务创新能力。五是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通过资源税改革、国有资源产权收益制度改革，实现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把外部成本和所有者权益体现于价格之中，以真实

反映要素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倒逼工业转型发展。

（三）推动工业开放发展，拓展工业强国建设国际空间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国工业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日益与外国企业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展开同台竞争与合作。建设工业强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整合利用全球资源、市场的能力和水平。一是要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在工业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研究提出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的行业清单、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要调整优化进出口结构。围绕工业转型升级目标 and 需求，加大先进技术和紧缺原材料进口，积极吸收国际技术创新辐射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加工贸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三是要引导有实力的工业企业有序走出去。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积极到境外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工业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四是要探索工业开放发展新思路。认真贯彻落实自由贸易园（港）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内陆地区等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不断拓展中国工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空间，打造工业开放发展新优势，增强中国工业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创新行业治理和服务体系，提高为工业强国建设服务的能力

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需要同步推动工业行业管理向工业行业治理转变，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努力为工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强对特定行业和领域的事中事后监管，重点加强食品药品、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监管和涉及国家产业安全领域的外资并购审查。二是要创新行业管理方式。加强工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探索行业规范条件、负面清单、行业自律、企业社会责任等新型治理方式，支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等各类第三方平台建设，提升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要大力支持行业协会承接行业管理基础性工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协会更多承接政府事务性管理，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反映企业诉求，维护企业权益，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更好地发挥联系政府、服务企业的桥梁纽带和支撑作用。

责任编辑：李 蕊

大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聂振邦 胡恒洋 邱天朝

摘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四化”之间总体上是良性互动关系，但如果政策措施失当，也会相互制约，进而影响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过去十年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总体上看，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中需要着力加强的“短板”。促进“四化”协调发展，重点是要坚持构建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城市各类资源向农村流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完善支农保护政策体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拆除制约“四化”融合互动的藩篱。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作者简介：聂振邦，国家粮食局原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胡恒洋，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巡视员；

邱天朝，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处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性、农业资源利用率、经营规模和生产要素禀赋等主要指标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党的十八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课题成果。

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同步发展”，以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四化”不协调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和战略运筹，对于加快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一、“四化”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个国家经济要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离不开“四化”协调发展。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农业这一基础产业，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所谓“四化”协调发展，是指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建立有效衔接机制，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实施科学组织和管理，通过工业化带动农业、信息化提升农业、城镇化拉动农业，以及农业现代化支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总体而言，“四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动耦合性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保障，起支撑作用；工业化是动力、核心，起主导作用；城镇化是载体、引擎，起带动作用；信息化是途径、抓手，起加速器作用（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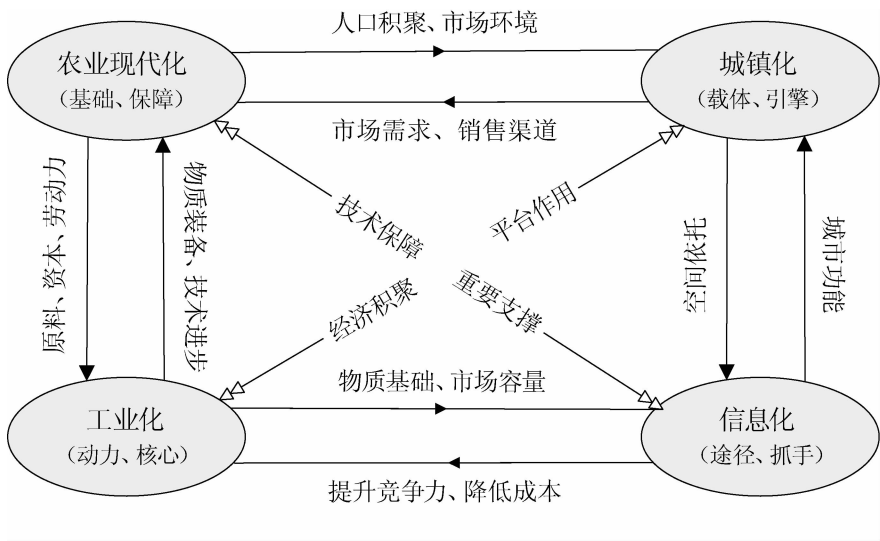


图 1 “四化”框架关系图

但是，“四化”之间既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也存在负面影响关系。所谓“良性互动”，主要是指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提供食物、原料、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撑和保障，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通过资金反哺、物质装备、技术支持、现代

化经营管理理念的普及等方式带动农业现代化。所谓“负面影响”，主要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四化”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政策措施失当，就会出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争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并且带来工业和城市污染、资源过度利用、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问题，并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受阻。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促进“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推进产业集聚和经济转型升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意义十分重大。

二、我国“四化”互动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为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选择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模式。当经济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又通过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加强农业支持保护、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扶持农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做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两个基本趋向”的重大判断，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四项补贴”等重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科技物质装备水平、产业组织管理形式等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呈现出诸多适应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传统农业正加速向现代农业跨越，“四化”互动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工农业关系由“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工业超前发展战略，我国采取对农业课以较高的税赋、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高价格向农民出售工业品等经济手段，使农业部门剩余净流入工业和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开始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2004年以来，我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全面取消农业税，不断完善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保护政策体系，建立起以“四项补贴”为核心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并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积极调整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确保用于“三农”的投入总量和比重不断提高，还积极拓宽投入渠道，从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现代农业建设。按照可比口径计算的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3年的214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3799亿元，十年

平均增长 20.5%，高于同期中央财政收入 18.1% 的增长速度。其中，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比重，已经超过 50%。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农民种田不再缴税，还能拿到国家补贴，工农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

（二）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我国正处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快速发展，将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支撑，为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提供物质技术支持。仅以农业机械化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向黑龙江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转让了先进的联合收割机制造技术，并不断推出新产品，填补了我国生产大马力拖拉机的空白，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耕翻、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干燥等多过程实现机械化。湖南古洞春野茶王产业合作社采用新型茶叶平剪整枝机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30 倍。近年来，在技术进步和国家补贴政策支持下，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提升，2013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59%。根据有关规划，2015 年我国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 60% 以上，2020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要达到 70% 左右，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彰显。

（三）产业链理念、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没有形成。2007 年中央 1 号文件首次提出“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鼓励现代农业以产业链方式延伸到农产品加工领域，标志着工农业联系开始由松散型向紧密衔接型转变。通过工业装备、科学技术支持农业，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可有效地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按照加工和销售需求组织生产，实现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推进农业发展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例如，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建成了闭环式的水稻加工循环产业链，将水稻加工延伸到 16 道工序，水稻加工平均利润达到 473.7 元 / 吨。我国传统的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兼业化的种植养殖方式，造成农业专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无法满足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需求。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各种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推动了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多种形式的发展，不仅能有效提高粮食和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也可以更好满足农产品加工业原料的需求。如，湖南省桃源县三江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实行“五个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规范了蛋鸡养殖行业行为，产品加工链条日趋成熟；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全福村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向，通过土地流转，与深圳市贵中鲜农业发展公司合作进行农业科技园建设，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推

动病虫害统防统治，农药使用量仅为原来的 10%，有效保护了土壤，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稳定、标准的优质原料。

（四）信息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

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得早，信息化出现得迟，不存在“四化”同步发展现象。而我国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正处在信息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阶段，信息化正在广泛渗透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各领域和环节。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结合，逐步融入农产品生产、物流、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已成为当代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当代的农业现代化。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农产品营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些龙头农业企业建设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建立了农产品加工、贮藏市场信息预警机制，对农产品加工、贮藏各环节进行编码标识和信息采集，实现了农产品加工、贮藏的现代化、标准化和信息化；还有一些农业龙头企业运用 ERP 系统进行企业管理，提高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网站已超过 3 万家，其中涉农网站达 6000 家以上，随着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日趋普及，将带来农产品产供销模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信息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土地、土壤、气候、水、农作物品种、动植物类群、海洋鱼类等资源的清查与管理，前景十分广阔。一些地区已开始使用作物生长模拟模型、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生产实时控制系统、作物遥感估测系统等信息技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今后这些信息技术将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更加普及。此外，信息技术在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农业经济管理、农业防灾减灾、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应用更加深入，将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差距。

（五）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建设相互促进、互动共荣

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产业是城镇人口聚集、繁荣发展的持久动力。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是否与城镇化互惠、融合、共荣。“皮革城”、“食品城”等城镇的兴起，表明有龙头企业带动和主导产业支撑的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建设，产业才能持续繁荣，经济充满活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包装、储藏、运输、信息、金融等服务业，有利于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吸纳农村人口快速有序地向小城镇集中，并带动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将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进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原来以温饱型为主体的食品消费格局，逐步向风味型、营养型、安全型、

便捷型甚至功能型的方向转变，迫切要求通过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能力，并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要求和安全、健康消费需要。同时，部分农民进城之后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今后，新型城镇化将突出以人为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到2020年预计有1亿农民进城落户，将从市场拉动和产业升级两方面助推农业现代化。

三、我国“四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过去十年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较快的时期，在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下，农业实现了粮食产量“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的辉煌成就，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但是，我国农业的连续增产，一定程度上是以农业资源高强度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过度超载为代价的。今后一段时期，对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而农业增产难度越来越大，农产品供求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总体上看，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同步中需要着力加强的“短板”，是实现“四化”协调发展的关键。

（一）农产品供求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仅以粮食为例，据各方面最新预测，2020年全国粮食需求量将达到13800亿斤左右，比2012年增加约1800亿斤（年均增长1.8%），其中谷物需求量将为11500亿斤左右，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巨大。从2004年起，我国已经变成农产品净进口国，且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贸易逆差已达到510亿美元。从品种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大豆、食用植物油进口依存度高，2013年，进口食用油籽6783.5万吨（其中大豆6338万吨）、食用植物油922万吨，棉花、食糖以及畜产品等进口量也快速增长。近年平均，我国谷物自给率仍保持97%以上的较高水平，但大豆、食用植物油、棉花、食糖的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20%、40%、70%和85%左右。仅谷物和大豆、食用植物油进口合计，相当于每年利用了国外近7亿亩的播种面积。从区域结构看，保持粮食区域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2005年-2012年，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73%上升到76%，而7个主销区省（市）缺口扩大300亿斤以上，达1363亿斤。2012年，粮食跨省流通量达到3284亿斤，净调入省份达19个，净调入量比2005年增长48%；主产区粮食库存占全国总库存的75%，主销区占9%，产销平衡区占16%，库存进一步向主产区集中。此外，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2012年我国新收获稻谷抽检样品重金属超标率为22%，2013年小麦重金属超标率3%，这部分粮食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近年来，我国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农药兽药残留、生物毒素超标、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较为严重。

（二）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

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水平较低，加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耕地、水资源、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各地变相扩大耕地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守住耕地红线的难度越来越大，农业和非农产业争水矛盾日趋显现。缺乏严格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导致水土资源质量不断下降。据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达 3.5 亿亩，其中，中重度污染面积达 5000 万亩，耕层镉、砷、铅、汞、铬、铜等重金属含量大幅度增加，工业化进程中工矿企业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形势相当严峻，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中南、西南重金属矿区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南方酸性水稻土壤区、大中城市郊区和一些农业集约化生产基地。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和水体富营养化，土壤肥力日趋衰减，迫使农民施用更多化肥增产，造成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收益下降，带来环境面源污染，形成恶性循环。城镇、工业污水排放及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其中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第一大污染源，全国约 40% 左右的河湖被严重污染。农业现代化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水资源作为基础保障，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也必然要占用耕地和水资源，必须妥善处理几者之间的关系，尽快改变以往大量占用土地为特征的粗放型土地城镇化模式，要提高土地容积率和空间利用率，实现内涵式发展。

（三）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推动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土地和物质投入，形成对农业的要素竞争，加大了农产品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和农资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9 年-2011 年与 2001 年-2003 年三年平均成本相比，我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大豆和棉花每 50 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 59.7%、40.6%、64.3%、和 75.3%，大部分农产品总成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8% 左右，其中增长最快的两项是人工和土地成本。农业生产成本快速增长，不仅是我国农产品生产与供给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直接削弱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国内生产和自给率。从 2010 年起，我国粮食价格已经全面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格。从 2011 年 10 月以来，棉花国内价格持续高于进口缴税后价格，每吨价差达 3000-6000 元，进口大量增加；食糖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国内外农产品比价关系的变化，直接反映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另外，我国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不高，阻碍了农业信息

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如以一个 70 米长、8 米宽的蔬菜大棚为例，需要配置一套传感器、一个摄像头，再加上控制模块、控制箱以及网关等其他设备，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 5000-8000 元。多数农民表示，物联网技术成本比较高，他们用不起。

（四）农业基础设施、物质装备及科技支撑依然薄弱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基础建设、物质装备和农业科技水平提高较快。2013 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9.65 亿亩，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 52.8%，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2%，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2013 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 717 斤，比 2003 年增加 139 斤，提高了 24%。但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国现有耕地中，优质耕地不及全部耕地的 1/3，陡坡开垦、草原开垦、围湖造田形成的耕地面积较大，目前 25 度以上陡坡耕地尚有 6500 万亩左右；全国仍有近一半农田没有灌溉条件，现有灌区灌排设施老化失修、工程不配套，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仅为 0.51。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水平。农业突破性新品种、新技术储备不足，高产作物大规模替代低产作物的余地不大，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对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的制约增强，单产提高的技术瓶颈短期内难以突破。现有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满足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际需要。特别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思想，对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足，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也不高，至使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十分严重。以湖南省岳阳市为例，大部分灌渠未衬砌，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 0.45 左右，全市 1030 座小二型水库中仍有 681 座需要进行除险加固处理。

（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工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趋势明显，农户兼业行为日益普遍。第二次农业普查的结果表明，2006 年末，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 20016 万户，其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占 58.4%，比 1996 年减少 7.2 个百分点，非农兼业户比重明显上升。另据典型调查，2008 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五省纯农户的比重只有 25.3%。大量研究表明，农户兼业行为对于优化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增加家庭收益具有正面效应，但对于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则有负面影响。很多兼业农户开始退出商品农产品的生产，农业生产行为逐步演变为“保口粮”、“保自给”。农业部数据显示，我国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 2011 年已经下降到 26.3%。多数农民既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也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目前，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已经从 1991 年最

高峰时的 3.91 亿人下降到了 2012 年的 2.58 亿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则从 1978 年的 80.5%下降到了 2012 年的 33.6%。与数量和比重下降相比，务农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也出现了结构性下降，老龄化、低学历化和女性比重上升趋势明显。2006 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50 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达到 32.5%，比 1996 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提高了 14.4 个百分点。到 2013 年，农业从业人员中 50 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 40%；按此趋势，到 2016 年，农业从业人员中 50 岁以上的比重将达到 50%。弥补劳动力大量转移后的空间，解决“谁来种粮”问题，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

（六）促进“四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

尽管近年来我国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显著加大，但还没有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小规模分散的农户经营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要求，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的机制尚未形成，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等等。以金融为例，尽管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矛盾依然突出。现代农业条件下，新型经营主体日益成为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骨干，相对于传统农业，其资金需求额度大、周期长，但受银行贷款政策影响，难以获得贷款支持。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11 年底，获得信贷支持的合作社 2 万家，仅占合作社总数的 3.8%。很多农民合作社反映，各银行没有真正对合作组织进行政策性支持，还是需要房产抵押；即使获得贷款，由于资金供求矛盾突出，致使借贷利率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的存贷比仅为 57.6%，比县域以上地区低 17.2 个百分点，资金外流问题仍较为严重。再以城镇化为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城镇化”，即人们能够在城镇生产、生活和发展。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左右，两者相差近 18 个百分点。大量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依然受制于现有户籍、医疗、社保等制度，处于“半城镇化”状态，“本人在大城市工作、家人在县城生活、农村留地养老”。这不仅造成城镇化质量不高，也不利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

四、推进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建议

（一）根据我国国情和“四化”发展实际，推进“四化”协调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来助推农业现代化。完善现行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体系，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农业现代化增速提质，以保持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相协调。

二是坚持发展“四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相结合。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水平有差异，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也存在明显差异，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促“四化”协调发展。“四化”协调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其深层原因在体制机制障碍。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针，全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除妨碍“四化”协调发展的樊篱，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四是坚持生态文明助推“四化”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本质是转变发展方式，在“五位一体”建设方略下，遵循生态规律，加快农业低碳化进程，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四化”的经济活动和谐地融入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形成融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为一体的环境友好型低碳农业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态化。

（二）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城市各类资源向农村流动

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大力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逐步形成与我国国情及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在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引导土地流转，积极探索设立土地流转专项补贴，建立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的体制机制。按照“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综合应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通过公共财政、价格杠杆等方式，促进城乡资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着力构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和拉动机制，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向农业流动。尽快把工业设备、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等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注重机具和技术的集成配套，探索农机农艺融合、农机化信息化融合途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不断优化农业内部组织机制，推广先进适宜技术，尤其是能提高投入品使用效率的技术，大幅减少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建立覆盖广泛、内容全面的农业科研信息网络、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科技基础数据库等形式，加

快打造农业科技创新的信息化平台。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产品生产、流通、研发中的应用，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信息化服务体系。

（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监督考核和激励约束。借鉴成都、苏州等地经验，探索建立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制度。加强政府的宣传引导和服务，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建立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监管制度，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尽快改变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品使用来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农业投入品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减量化”。加大测土配方施肥力度，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循环农业，分区域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行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支持高效肥和低残留农药使用、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推广高标准农膜和残膜回收等试点。通过示范引导，大力发展畜禽水产标准化规模养殖。探索建立畜禽水产规模化养殖准入制度，强化政府监管，对达不到污染排放标准和环境治理要求的养殖场、企业、农户，禁止开展生产。要抓紧编制和实施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在先行开展试点基础上，积极开展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等农业突出问题治理，在陡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加强天然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

（四）完善农业支农保护政策体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不断完善现有财政支农政策框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前瞻性。重点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and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加快建立政府“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确保足额计提、专款专用。强化中央和省级统筹，解决土地出让收益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要突出支持重点，统筹各种渠道资金，重点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和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突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适当提高建设标准和补助标准，做到规划一片、实施

一片、建成一片、发挥效益一片。积极推进各渠道资金整合。把县级作为资金整合主体，引导性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各类建设资金集中投入，做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发挥各类建设资金的集聚和示范作用。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着力加强农村公路、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动植物病虫害防控等建设，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不断提高农业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支持培育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增强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能力。特别是从能力建设和参与财政支农项目两个方面，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积极支持发展农产品流通服务，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组织发育不充分、流通效率低下的问题，建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大市场、大流通。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拆除制约“四化”融合互动的藩篱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科学推进银行、保险、金融服务等行业改革创新，完善金融监管，进一步发挥金融的促进作用。针对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突出矛盾，坚持服务“三农”的根本原则，以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为导向，通过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解决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机制，落实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在加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力度的同时，关键要尽快明确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比例，并健全相应的考核制度，改变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克服抵押担保瓶颈制约。鼓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为农服务的担保公司，构建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逐步提高风险保障水平，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改变现行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不合理限制，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更好的环境。分类推进不同规模、不同区域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优先放宽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为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创造条件。逐步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还原户籍制度的人口管理本来属性。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的加速创新和应用普及，将智慧城市、数字乡镇等新理念引入城镇发展，积极寻求城镇化的最佳发展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公益+市场”的农业信息服务机制，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和质量，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经济 •

论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

徐占忱 陈文玲

摘要：新时期我们应从战略高度和更长周期认识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深入研究我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等的经济外交关系，形成既有总体协调又有国别针对性的经济外交政策。要努力寻求大国利益汇合点，实施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联动，加强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的轨道化、机制化建设，推进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相互促进，发挥首脑外交和峰会外交的特殊作用，夯实与中等强国经济外交的战略基础，适当运用负面外交和威慑策略。坚持多策并举，推进中国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关键词：大国关系 经济外交 战略利益

作者简介：徐占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

经济外交是一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外交超越于一般的国家间经贸关系，它是由政府主导的以追求包括经济利益在内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活动。经济外交的成效取决于一国政府对与自身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际间重大战略性经济关系的总体把握、统筹谋划和实际运用能力。实践中，经济外交主要表现为以经济为手段和以经济为目的的外交活动两大类。

当前大国间战略性经济关系已成为引发新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丛”，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既有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体现、渗透和影响其中。这些新变化都给大国开展经济外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充分有效地推进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可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规划性和进取性有所增强，但从未来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展经济外交的内容，加大经济外交的力度。发展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大国间格局调整的历史性转变，打破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瓶颈”，维护和延长发展战略机遇期，引导和推动全球优质生产、创新要素和高端生产环节向中国集聚，加快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步伐。

一、从战略高度和更长周期认识并处理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

（一）大国间经济关系长期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并将塑造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和基本结构

历史上，大国关系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变动之中。从国际政治演进过程来看，成熟或相对定型的大国关系只在 19 世纪的欧洲多极均势和 20 世纪的美苏两极“冷战”期间存在过。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以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互动融合趋势十分明显。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经济外交在大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经济安全 and 经济利益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中的优先选项。

目前，国际关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技术几乎同时进入新周期，这一时期与中国 21 世纪前 20 年战略机遇期同步展开。美国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尤其是其所谓的中国快速发展的“挑战”，在军事上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同时，积极推进“一体两翼”战略。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试图在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联手制定贸易新规则，构造一个与己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继续主导未来全球贸易。特别是利用 TPP，撬开亚洲市场，干扰近年来东亚地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牵制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受国际大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也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控于美、欧等大国手中，大国间围

绕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之争将长期持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争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构成中国发展总体外部环境的基本格局，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

西方有学者认为，2008 年金融危机比冷战结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 1989 年 - 2008 年间的 20 年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变动的过渡期，2008 年金融危机则真正开始了大国关系的深度调整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几个重要指标。这些标志性指标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于一身，在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尚无先例。当前国际利益格局所涉及议题日趋复杂和多元化，任何大国实施实力资源的跨领域转化都难免力不从心，美国与其盟国在战略、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益转化并不顺畅。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与全球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外交关系，影响着全球大国关系演变格局，这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未曾有过的挑战。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发展已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之势，中国诸多国家核心利益中，经济安全在经济利益在国家总体利益格局中位置大大前移。最近几年，一些人批评中国是“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或“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认为中国根据需要把自己说成是“大象”或“蚂蚁”。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正在从低调的学习者、参与者向适度的管理者、领导者转变。国际社会期待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此，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和策略准备。在经济外交上中国如何构筑体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良性竞争和合作共赢格局，推进建立反映新兴大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治理新模式，都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构建可持续的大国经济外交关系是创造中国经济新红利，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近年来，中国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的矛盾现象给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提出了新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有很多现实利益问题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被西方大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很多出口商品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美、欧、日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稀土等领域缺乏大国应有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安全审查，困难重重。

应该看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动力，技术创新处于重大突破的前夜。世界大国间经济竞争更趋激烈，美欧积极推进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形成比我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可能处于被夹在中间的尴尬状态。对此，中国必须推进从战略理念到实现机制的全方位改革，要在收获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基于内需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借助发展与主要大国间经济外交，推进中国从原有的利用本国低端生产要素向利用国外高端生产要素转变，加快培育一批全球性企业，打造一批全球性品牌，推进一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尽快使中国成为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一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二、新时期中国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的战略重点与战略选择

新时期中国推进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既应统筹考虑，树立“一盘棋”思想，又应突出特殊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把推进中美经济外交作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主轴关系大国与分轴关系大国相结合，紧紧抓住中美经济外交这一大国关系主轴不放，发挥中俄经济外交的平衡作用，中印经济外交的共进作用，中欧经济外交的助力作用，最大程度抑制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对我发展的对冲效应。这里，就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经济外交关系与战略重点分别进行分析。

（一） 中国与美国经济外交关系的战略重点

1. 中美经济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中国快速发展是中美间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走出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宿命。中美关系呈现相当复杂性、微妙性和可变性，“非敌非友、斗而不破”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常态。中国快速发展给美方带来了战略“焦虑”，现实中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应对策略既有“围堵和遏制”，也有“接受”和“适应”，是其“理想”和“现实”间的折衷。美方不想也无法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要力图控制中国发展的时间和速度，防止对美国利益带来大的冲击。一方面，美方试图借助集体力量，利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规范”中国；另一方面，依靠经济和科技领域领先优势，在贸易、投资、汇率、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向中国施压，希望“用经济手段赢得与中国的这场竞赛”。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强的纽带。建交以来，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合作等

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双方从中获得丰厚收益。美国企业在中国开放市场过程中获利颇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得益于美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将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势必导致两国经济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加剧两国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增加不信任。目前看，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两国摩擦最多的风险源。前几年美方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有所缓解，但知识产权分歧份量上升。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安全审查、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中国未来城镇化、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等，将为美国企业提供不可多得的市场机会。这有助于加深中美间经贸联系，维护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中美着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将在更深层面和更广领域加深中美经贸联系，缓解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张力。建立中美新型发展大国关系下的互补、互信、互建、共赢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 对美经济外交战略重点。中国处于“将起未起”，美国看起来“似落未落”，中美两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起落变化的敏感状态之中。地缘政治、经贸往来、安全利益以及两国民族心理，都易于放大两国间相对关系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对美经济外交方面合作是具有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选择，寻找共同点、有效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共赢是中国对美经济外交战略重点。

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美国方面反应渐趋积极。中方提出以亚太地区作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验体。2013 年 4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提出美国“太平洋梦”的概念；美国“太平洋梦”中对中国的部分“期待”，在一定条件和前提下与“中国梦”并不矛盾，双方如能在一个平台下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共同梦想并非不可能。“中国梦”寻求国内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同时开放地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从中国快速发展中分享经济福利；“中国梦”不排斥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但要求取得与承担责任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梦”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和扮演信守承诺的大国形象，但要求在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存在世界秩序观和价值观的竞争，但共同实现梦想并非不可能。

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关系有相当的“韧性”。中国应继续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时期处理中美关系，应正面应对而不应继续回避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要让美国清楚中国发展的国内和国际诉求，以及中国在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的战略底线，减少美方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和过度想象；要努力将中美利益共同点做大，同时使美方明白，中国尊重和支持美国对于现有

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但需要美国不过度挤压中国正常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

（二）中国与欧盟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 中欧经济外交关系。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困境是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困境，民众长期享有高福利使得政府改革阻力重重，而民主政治造成真正改革型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中欧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重要力量。回顾近 10 年中欧关系发展，其间有“烦恼”亦有成效。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没取消对中国武器出口禁令。2013 年欧盟曾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欧盟史上最大的贸易调查。

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双方共同利益趋近，良性互动增多，新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近 10 年来，中欧经济关系实现了从贸易主导向投资—贸易双轮驱动的转变，双方建立了高层经贸对话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三大机制，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3 倍。2013 年中欧贸易额 5591 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欧洲在经历危机后正在恢复增长，中欧双方愿意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3 年 11 月中欧签署了《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成为未来 10 年合作的“路线图”，双方就全面加强贸易、金融、投资、高技术、新能源、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合作做出规划，合作领域之广前所未有。目前，双方就推进中欧投资协定和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德、法、英三国对此态度积极，双方力争到 2020 年贸易额达到 1 万亿美元，

欧盟有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贸区计划，这与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构想异曲同工。中东欧地区是欧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中东欧物流新动脉向西连接西欧、南欧，向东扩展到俄罗斯，并将中国与整个欧洲相连通。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签署《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协议》，涵盖经贸、金融、互联互通、绿色创新等领域 30 多项合作，中东欧国家对扩大与中国合作积极响应并充满期待。

2. 对欧盟经济外交重点。中欧经济合作基础良好，要重点加强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德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最为健康和良好，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德关系愈发紧密，中国市场需求是德国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力。德国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而低调处理所谓人权之类议题，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应尽力做到求同存异，低调处理相互间分歧，切实推进在特定利益契合点

上的合作，尽可能使经济合作不受意识形态左右。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互补性强。中国在保持与西欧、南欧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应积极扩大与中东欧十六国的合作，特别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合作。

（三）中国与日本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 中日经济外交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两国既是大国关系，又是邻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历史上长期我强日弱，近代以来日强我弱，现在进入两强并立阶段。一直以来，日本的“大政治”和大战略相对稳定，但过于频繁的政权更替和领导人更换，使其在战略实施上难以形成“路径共识”。目前看，日本国内对中国快速发展反应非常强烈。近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安倍现政府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人类共同价值，蓄意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我而言，日本可能是未来 10 年或更长时期内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现实外部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对抗的风险和烈度比中美结构性矛盾更具现实挑战性。中日关系如果把握不好，很有可能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大国，作为同处东亚地区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 GDP 已占到亚洲经济的 60%，两国关系直接影响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大谈“失去的二十年”，固然有真实的一面，但也不能排除“哀兵之策”的成份，日本的科技经济实力 and 创新能力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中日关系走入低谷，要防止目前地区安全困境把东亚这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拖入军备竞赛中心。美国因素在中日之间日益明显。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战略上严重受制于美国，日本下一步行动还要从更大的国际格局中观察分析。

2. 对日经济外交重点。当前，中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中日两国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外来大国与域内矛盾相互激发助长的问题，我们处理中日问题要基于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历史问题来制定决策，要放在国家发展和地缘战略框架下全面思考和妥善应对。

在中美日三个双边关系中，中国应抓住中美关系这一龙头，研究和制订出最佳战略。对于一些在中日双边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积极寻求通过多边渠道解决。就中日来说，一方面要着力推动中日韩 FTA，加强与日本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四）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 中俄经济外交关系。中俄关系在大国关系中具有平衡性战略地位。两国都在 21 世

界秩序中寻找新的定位，中俄（苏）之间由冷战初期的“蜜月模式”成功转化为当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身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成功模式。这得益于双方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坚持“四不”方针，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

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界，同为转轨国家，处于复兴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性强，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普京政府力主推动远东地区开发，对我对外投资是重要机遇。由于俄罗斯国内处于经济转轨特殊时期，前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给俄带来如其他西方国家那样的经济利益，中俄经济合作落后于两国政治发展，两国经贸发展落后于中美、中日、中欧经贸合作水平。

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发展正迈向新阶段，两国战略合作层次更高，合作领域更广，合作程度更紧密。在不断深化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势下，推进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大国，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两国地理毗邻，能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地缘优势。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拥有大量能源的俄罗斯和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相结合，将“可能形成新的东方”。2014年5月21日，双方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历时10年之久的谈判终于划上圆满的句号。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协议总价值达4000亿美元。这一合作完全符合两国发展的战略需要，中俄两国建立全面能源合作关系，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中俄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民用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空间对地观测、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等领域都有广阔合作前景。

“中国梦”的提出对中俄关系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俄罗斯各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直接获益。中亚国家是中俄共同的友好邻邦，维护中亚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中俄两国在中亚是互补关系，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并不意味着中俄在中亚地区展开竞争，相反有助于形成包括中俄和中亚国家在内的区域大合作，以此进一步提升中俄两国战略合作水平。

2. 对俄经济外交重点。中俄双方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着力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方应加强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沟通，增进俄罗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战略理解。近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也相应向亚太“东进”，推进其东部地区开发以促进安全。双方应贯彻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坚持在亚太地区协作不以挑战美国和将美国赶出亚太为目标。中俄加强战略合作，客观上可以制衡美国及其军事同盟的军事冒险行为。

我方应以目前中美俄三国两两之间已有的对话机制为基础，适时推动建立中美俄三

方对话机制，减少大国间的误解，增强三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认识，特别是防止一些外部势力破坏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企图。

（五）中国与印度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 中印经济外交关系。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新兴大国。西方国家对印度的身份认同度较高，印度在美制衡中国战略中扮演“被动伙伴”角色，不会心甘情愿地被美利用。目前看，印度不会和美国、日本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盟关系。中国和印度都希望南亚地区平安宁。近年印度加强与东亚国家联系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开发西部地区的目标具有互补性。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 年双边经贸规模达 800 亿美元，与两国各自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印度的强项是服务业，由于投入不足，其加工工业基础设施薄弱。2012 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 290 亿美元，约占其贸易逆差的 15%。目前，中国从印度进口以棉花、矿石、金属等原材料为主，对印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涡轮机等工业制成品。

2. 对印经济外交重点。中印经济领域合作需要新思维、新想法，但目前看，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有待进一步加强。作为发展中大国，双方应坚持互不威胁、互不遏制，不搞“龙象之争”，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金融规范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协调双方立场，实现共同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争取主动尽早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现有和潜在的利益冲突点，把双边矛盾控制在温和范围内。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未来中国高速铁路等能否成为合作的重要领域有待双方共同努力。

三、新时期做好中国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举措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应坚持“顺大势、借大势、造大势、行大事”的方针，顺新一轮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势，借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之势，造中国快速发展是全球各国之福之势，行创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国际环境之大事，全面参与、重点投入、沉着应对、积极作为。

（一）坚持全球化方向，寻找大国利益汇合点

中国和平崛起既是中国的命题，更是世界的命题。中国成功实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成为大国和平崛起的基本经验和道路。中国后 30 年或更长时间要让其他大国安心接受中国和平崛起，难度和挑战比以前要大得多。中国成为大国后，任何对外回应都会产生体系性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增

长的有利环境难以继续存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将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倒逼”压力；而随着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能力下降，国际社会有可能走向弱领导或分裂性领导。

中国要继续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倡导与坚持“包容共赢”的理念，推进实现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扩大和强国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推进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厘清我与对方大国关系的具体形态，研判大国新型关系是否平等，是全领域还是超双边，是对手、竞争者、伙伴还是盟友的关系，并基于此研究推动双方关系向于我有利方面转化的对策和策略。

（二）加强与大国经济外交的轨道化、机制化建设

与大国关系的轨道化、机制化，可以使双方的分歧得以及时沟通和解决，减少双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因素。目前，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其中重要内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中美商贸、农业、科技等专业联委会的轨道化作用日益显现。当前，中美各对话轨道中，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地位、政府采购等双方重大议题美方提出得多，谈判议题过多地反映了美方的利益诉求，工作框架中反映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支配地位过强。我方应积极在重大议题设置上争得相对平衡的权力，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关切和诉求。

大国能力不仅体现于应对个别事件，更体现于创造和利用机制的能力。二十国集团（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东盟 10+3、区域经济伙伴关系（RECP）谈判等机制，都涉及我与主要大国间经济合作，在用好这些组织提供的平台基础上，要主动创造大国间合作新机制，在机制创造中争得我话语权和经济利益。

（三）推动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相互促进

现实国际关系中大国间关系往往由不同问题构成，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结合体，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问题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实力资源的跨领域转化反映一个国家外交战略和现实能力，中国当前面临“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一方面，说明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国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缺乏应有转换。当前中国正面临一个和平崛起大国从未遇到的“崛起困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和政治优势，如何维护和增进利益最大化，如何有效地保持与主要大国健康和谐的外交关系，都是重大命题。

争夺市场和贸易机会是各国经济外交的焦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给全球带来

巨大的市场机会：“十二五”期间中国货物进口总量将超过 8 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量将超过 1.25 万亿美元，这对美、欧、日等大国走出经济低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市场机会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外交工具，中国应通过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国内市场，适度利用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利益向于中国国际政治、安全、军事等方面有利的方向转换，争得于我发展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推动经济顺利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四）实施大国经济外交与周边外交联动战略

当前，由于美国等域外地缘政治力量的深度存在，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已不只具有地区层面的意义，已是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中把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相区分，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原则。但从现实外交总体形势看，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已经和大国外交紧密相联。中国需要在整体性大国关系中来协调和处理地区关系，要构建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大周边战略。

当前，周边外交的重点是以经济外交为突破口，立足亚太精耕细作，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和亲、诚、惠、容理念，积极推进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增强周边国家对我向心力，孤立、打压少数国家，缓解我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推进广西作为中国中南、西南开发开放的战略支点，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加强上合组织合作，以能源合作为基础，推动中国与中亚地区互联互通和更广泛领域合作。

（五）发挥与主要大国间首脑外交、峰会外交的特殊作用

目前，中国与主要大国间高层交流对于化解分歧、推进合作共赢十分重要，最高领导人定期或不定期会面，增强了领导人个人间的了解和认可，也为提升大国间双边关系“定调”。目前，中国与主要大国间领导人通过年度互访、定期会晤等建立起密切的高层交往机制，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要继续发挥中国与大国之首脑外交，通过首脑间面对面沟通和高质量互动，进一步搞清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真正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减少外部或突发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使各方对两国关系有稳定预期和充分的信心。

峰会外交是当今全球经济外交的重要平台。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中国负责任的国际行动，也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权益的应有尊重。要利用 APEC、G20 等各种峰会场合，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立场，争取和赢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要积极发挥亚信、APEC 峰会、夏季达沃斯、博鳌亚洲论坛、全球智库峰会等我主场外交的作用，切实提升中国话语权，

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要组织专业力量，研究提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体现“和谐世界”理念的高质量议题，以议题作为大国经济外交的博弈手段，提升我大国地位。

（六）构造与中等强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支点地位

国际上一些中等强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性高。随着国际权力分散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些国家在国际治理和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和塑造能力正在增强。密切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间经济外交借力和博弈的手段。美国正在将加强与其所谓“关键国家”合作，以作为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的战略选择。当前中国应加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南非、沙特等国的合作，积极发展与这些中等强国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作为我处理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的重要战略“支点”和第二维度补充，使世界更多国家理解和认同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主张，提升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的博弈能力。

（七）适当运用负面外交和威慑战略

经济外交有正面外交与负面外交之分，正面外交主要表现为准入贸易、开放通商、馈赠货物等手段；负面外交就是要逼迫对方进行经济利益得失分析，威慑或胁迫对方不得实行对我有害的政策，停止对我有害的行为。近些年，更多时候中国是西方大国“双反”等的目标国，要学会从制裁中实施反制裁，逐步地从被制裁的目标变成制裁的发起国，实现正负双向经济外交策略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

参考文献：

- 1.孙哲主编：《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2012年9月版。
- 2.陈玉刚：《全球关系与全球模式》，《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
- 3.何茂春：《中国经济外交的机遇与建议》，《当代世界》2009年第9期。
- 4.张曙光：《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考察》，《文汇报》2012年8月20日。
- 5.周永生：《中国周边态势与经济外交反思》，《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 6.赵进军：《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3》，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责任编辑：刘英奎

2014 年：“安倍经济学”面临大考

王绍辉

摘要：2013 年初安倍政府宣布实施更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被比喻为安倍射出的“三支箭”。经过一年多的实施，前两支箭都射中了目标，但没有命中靶心；第三支箭虽然已射出，但离目标还远，是否能中靶，就要看 2014 年安倍政府的作为了。但由于各项刺激政策的效力正在减弱，消费税率提高，以及市场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2014 年日本经济在经过一季度的高增长后很可能会明显放缓，并直接影响安倍政府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 QQE 财政政策 结构性改革

作者简介：王绍辉，国家统计局博士。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实施一年多来，在促进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政策空间缩小和刺激效力减弱，结构性改革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以及消费税率提高对内需的负面影响，日本国内对“安倍经济学”的信心正在动摇，留给安倍政府的时间已经不多。2014 年将成为检验“安倍经济学”效果的关键之年。也有分析认为，2014 年的世界经济，除了应密切关注美联储如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新兴经济体如何保持平稳增长外，“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将是另一个重大事件。

一、“安倍经济学”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安倍晋三在 2012 年底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面对日本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挑战，认为日本正处于危机状态，必须采取行动扭转局势，并迅速宣布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更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 and 经济增长战略。用安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私人投资，从而让生产率进一步支撑日本的长期持续复苏”。此计划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由于安倍是射箭高手，故上述三项刺激政策又被比喻为安倍射出的“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旨在消除通缩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在 2013 年初宣布，无限量印钞直至通胀接近 2%。在黑田东彦主政日本央行后，于 2013 年 4 月宣布了“量化加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即当月购买 6.2 万亿日元日本国债，自 5 月份起每月购买约 7.5 万亿日元国债；在两年内将基础货币翻倍，使基础货币由 2012 年底的 138 万亿日元增至 2013 年底的 200 万亿日元，增长 45%，到 2014 年底再增长 35% 达到 270 万亿日元。在此之前，国际上一直抱怨美联储伯南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但日本央行推出的 QQE 规模远超美国，每月资产购买量相当于日本 GDP（5.9 万亿美元）的约 1/80，而美联储当时每月 850 亿美元的资产购买量相当于美国 GDP（16 万亿美元）的约 1/187。特别是日本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中又提出了“质化”，即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是通常所使用的基准利率，而是直接改用基础货币作为目标，既保持了央行调控的主动性，也增强了市场对央行政策的信心。这是日本 QQE 与美国 QE 的最大区别。

第二支箭是旨在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目的是在短期内拉动日本经济增长。2013 年 1 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一项 10.3 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加上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受到撬动后的支出，整个刺激规模高达 20.2 万亿日元，预计会使经济增速提高 2 个百分点，创造 60 万个工作岗位。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二大刺激政策，仅次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紧急救助政策。主要内容包括：重建日本的防灾体系；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支持尖端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充实可以产生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支持企业节能改造等。

第三支箭是旨在打破多年来阻碍日本发展的体制壁垒，以结构性改革建立经济长期增长。2013 年 6 月，安倍推出了经济改革计划，这是“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全面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设立“国家战略特区”，在部分地区进行法律和税制的改革试验；增强农业活力，提出农业所得 10 年倍增计划，并取消存在了 40 多年的“稻米生产调整”制度，政府不再控制稻米种植面积；改革劳动力市场，鼓励女性就业，力争到 2020 年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30%；承诺未来 10 年将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加 3%；扩充税收来源，从 2014 年 4 月起消费税率从 5%提高到 8%，争取到 2015 年将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减至 2010 年的一半，到 2020 年实现财政盈余。

安倍射出的这三支箭目标非常明确，即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克服通缩，大规模公共支出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结构性改革焕发日本活力，重拾发展信心，以便让日本经济真正走出困境。

二、安倍的三支箭是否中靶

“安倍经济学”实施一年多来，射出的三支箭是否都命中了目标，效果如何呢？从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2013 年日本经济增长 1.5%，连续两年实现正增长；物价从 2013 年 6 月开始连续上涨，到 2013 年 12 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1.3%，为五年来首次实现年度上涨。在日本政府 2013 年底的经济月报中，时隔四年二个月首次删去了“通货紧缩”四个字。这些数据意味着，“安倍经济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日本经济出现复苏，摆脱了长达 15 年的通货紧缩，看上去一切都在沿着乐观的轨道前进。但实际上，射出去的三支箭都有瑕疵，直接影响到了每支箭的力度和精确度。

1. 从第一支箭看，如何摆脱 15 年的通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的关键一环。早在 1999 年，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伯南克指出，要重振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通缩，采取强有力的量化宽松政策让通胀达到 3%-4%，使日元大幅贬值，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安倍上台后立即要求央行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希望在社会上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即家庭和企业低利率成本和政府刺激下提前增加支出，增加有效需求，形成物价上涨良性循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 QQE 的强力刺激下，日本汇市和股市成为最早体现“安倍经济学”成功的领域。2013 年 5 月上旬，日元跌破 1 美元兑 100 日元大关，为四年来第一次，到 2013 年底美元对日元升值了 21%。与此同时，日本股市全面上扬，日经指数全年上涨 56.7%，创下 1972 年以来的最佳年度表现，更直接提升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股市上涨所形成的“财富溢出效应”还增加了投资者的购买力，促进消费增长。第一支箭的效应也从金融领域扩展到了实体经济。从房地产市场看，房价自 1991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后，过去 20 多年来日本平均房价已下跌近 30%。但 2013 年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有所复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东京周边的二手房交易中赚到了钱。日元的持续大幅贬值也增强了大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振了出口商的利润。丰田汽车公司称，日元下跌对其营业利润的贡献达到 1500 亿日元，推动公司净利润增长两倍。

总体上看，虽然离设定的 2%的通胀目标还有差距，但日本正结束通缩困扰，安倍射

出的第一支箭已经射中了目标。日本央行预计，在 2014 和 2015 财年，日本消费价格水平将分别上涨 1.3% 和 1.9%。但是，第一支箭并没有直接命中靶心。

——实际物价上涨有虚高成分。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对内多印发钞票，对外使日元贬值。目前的物价上涨很大程度是大量进口能源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特征明显。日本发生大地震后，原来能够供应发电量 30% 的核电站都被关闭，不得不进口能源进行替代，90% 能源供应依靠进口。但由于日元大幅贬值，进口能源价格飙升，导致国内生产成本和物价上涨。

——通胀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削弱了日本消费者的购买力。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销售价格上，只能靠自身消化。2013 年第二、三季度，中小企业的经营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15% 和 32%。对消费者来说，随着燃料和其他消费品进口成本上升，“安倍经济学”的最大效应是生活压力加大，民众的消费只能精打细算。

——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速膨胀，宽松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 2013 年膨胀了约 42%，高于美联储的 38%，而欧洲央行缩小 24%，英国央行缩小 2%。如果以央行资产规模对名义 GDP 之比来衡量，日本更是高达 46%，而美欧等保持在 24% 左右。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是有成本的，印钞也不能超出央行的承受力和投资者对日元的信任。

考虑到上述因素，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可能正在减弱。到今年 3 月份，日本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涨幅与去年底持平，已低于预期。很多分析认为，如果日本央行不在今年年中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就很难实现预定的通胀目标，而加大力度的空间正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

2. 从第二支箭看，日本政府希望通过 20 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重建日本经济的强大实力。2013 年日本经济增长 1.5%，不仅明显高于 2001 年-2011 年 0.6% 的年均增长率，好于 2012 年的 1.4%，也明显高于 2013 年欧元区 -0.4% 的增长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的表现十分抢眼。

但从分季度的数据看，第二支箭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2013 年四个季度日本 GDP 环比折年率分别增长 4.1%、3.8%、1.9% 和 1.0%（环比分别增长 1.2%、1.0%、0.3%、0.2%），下降趋势明显。特别是去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成为安倍任首相以来的最低值，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资本支出、个人消费均放慢了增长，这令市场对日本复苏的持久性产生疑问。而且，面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的成果，也许安倍政府还没来得及庆祝，政府债务问题又已迫在眉睫。2013 年底日本国债高达 1017 万亿日元，国债与 GDP 之比超过 240%。2014 财年预算中，仅偿还债务（包括到期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费用就高达 23 万亿日元，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 1/4，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挤占于还本付息，而不是发展经济民生。2013 年

底日本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 0.6%，为全球最低，大型金融机构正缩减持有的国债规模，减少日常的交易量，大量资金流向海外。如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继续快速膨胀，日本国民和投资者不愿再多买国债，日本国债市场将宣告死亡，只有央行成为国债价格的唯一驱动者。可见，这样的财政刺激政策难以取得明显效果，无法解决更多实质性的问题，也不可持续。日本企业迟迟不愿将利润转化为企业投资或为工人大幅加薪，表现出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怀疑，这似乎也是对“安倍经济学”此前取得成绩的一种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依靠外需、扩大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也因为巨额贸易赤字的出现而破灭。2013 年日本出现了 11.4 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赤字，比上年猛增 65.3%，创历史新高。在 2013 年 1.5% 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为 0.3% 的负拉动。日本已经连续 3 年呈现贸易逆差，而且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贸易立国”模式正经历重大转折。而且，日元贬值对推动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小。2013 年中，日本出口在日元贬值的作用下快速增长，10 月、11 月出口更是达到了 18% 的超高速。但今年以来日元贬值陷入停滞，并有分析认为今年可能会升值 15%，韩国等国家也通过货币贬值对抗日元，到 3 月份日本出口仅增长 6.2%，而进口猛增 23%。

总之，“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虽然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射中了目标，但距离靶心似乎更远了一些。

3. 从第三支箭看，安倍政府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市场自由化，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到管制严格的医疗保险行业，从封闭的农产品市场到低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需要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农业、医疗保健、养老保险、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和能源行业。量化宽松、财政刺激取得的效益都是短期的，想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只能通过改革，解决由经济结构扭曲导致的竞争力弱、市场缺乏活力等问题。因此，第三支箭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

但这支箭是最难规划、最难实施，也是最容易失败的，因为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牵扯重大利益调整，代表不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集团在改革内容和方式上难以取得一致，甚至都反对新的改革。近 10 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始终难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课题，推进改革需要大量政治资本、公众支持、较长时间和周密稳妥的计划。就日本国内看，经济领域的各种利益关系也同其他国家一样盘根错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以农业为例，长期以来不敢开放，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生产力水平自然得不到提升，农业还是自民党传统的票源地。因此，即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4 月访问时给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但由于日本难以在农业方面让步，双方期待的 TPP 谈判也没有取得进展。所以，安倍对结构性改革迟疑已久，至今没有推出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行动，虽然已经提出的一些改革举措周期为 5 年-10 年，但是象征意

义似乎大于实际意义。但反过来，如果日本不进行结构改革和放松监管来增强私营部门活力、提高经济增长潜力，那么“安倍经济学”就会失败，日本经济将会重回原点。

综上所述，安倍的三支箭中，前两支箭都射中了目标，但没有命中靶心；第三支箭也是最关键的一支虽然已经射出，但离目标还远，是否能中靶，就要看 2014 年安倍政府的决心和举措了。“安倍经济学”的设计者滨田宏一用“ABE”（安倍经济学英文前三个字母）给这三支箭打了分：第一支箭得到最高的“A”，第二支箭得到“B”，第三支箭目前只有“E”。但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情况可能更糟，发展可能更迟缓。虽然目前的经济运行结果跟预期还有一定差距，但对于日本来说，能实现正增长、摆脱长期的通缩，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日本把货币、财政及重整经济结构的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综合手段，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的；克鲁格曼也认为，安倍踏出了勇敢的一步。

三、2014 年将是检验“安倍经济学”的大考之年

对于 2014 年的经济形势，日本国内均表态谨慎。由于 4 月 1 日起提高了消费税率，一季度特别是 3 月底前日本个人消费出现了猛增，再加上资本支出的意外增长，拉动一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增长 5.9%（环比增长 1.5%），成为 2011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长。但在个人消费集中释放后，随后的二、三季度经济会如何运行，消费税率提高对日本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还能发挥多大作用，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2014 年将是决定安倍三支箭是钝箭还是利器、“安倍经济学”是毒药还是良方的关键之年。

（一）消费税率提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是老龄化社会，政府用在民生等方面的支出只会不断增大，再加上持续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财政困境，逐步实现中期预算平衡，安倍政府决定 4 月份起将消费税率从 5% 提高到 8%，如果推行顺利的话，2015 年 10 月还要把消费税率提高至 10%。据政府估计，上调消费税每年可带来 8 万亿日元的新税收。但是，提高消费税率在日本引起很大争议。日本上一次提高消费税是 1997 年，当时税率由 3% 提高到 5%，结果导致国内消费急剧萎缩，加上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日本陷入长期通缩和一年半的经济衰退，也导致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倒台。日本各界都担心，此次加税可能会导致当年的噩梦重演。消费税率提高后，占日本 GDP 六成的个人消费将受抑制，估计会带来 2 万亿日元的需求减少。而日本本土企业十分倚重国内市场，除银行外的日本 50 家大企业中，近 2/3 的营业额都来自国内，肯定会受到加税的冲击。日本汽车业界预料，加税后年销售额可能下降 15%。消费疲软的负面影响还将波及经济

的各个领域，政府一旦应对不善，势必将重创“安倍经济学”。

为了缓冲提高消费税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安倍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强烈呼吁企业提高工资以增强消费者购买力。日本企业的手头现金和存款余额在 2013 年 9 月达到了 224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应该说企业有加薪的基础。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4 月发表报告称，经过今年春季的劳资谈判，日本大企业基础工资平均上涨 7697 日元，涨幅 2.39%，为 1999 年以来涨幅首次超过 2%。但占就业人数 2/3 的中小企业难以加薪，更多的只能是增加奖金。实际上，除了呼吁企业加薪，安倍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营造和改善经营环境，以便于提高服务业从业者、非正式员工和中小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如在有着巨大需求但报酬较低的护理领域，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营造就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是调整企业税，降低企业负担，期望能稳定内需。安倍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率的同时，将企业税率从 38% 下调至 35.6%，并提前一年结束专用于震后重建支出的企业税特别新增部分（原计划征收到 2015 年 3 月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企业税率是最高的，而消费税率最低；适当提高消费税、降低企业税，进行一定的再平衡是明智的，也有利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但下调企业税率只能减轻企业负担 9000 亿日元，不足以弥补提高消费税率导致的 2 万亿日元需求减少。

三是追加推出了一项规模为 5.5 万亿日元的短期刺激计划，还要求财务省将 2014 财年预算的一部分进行提前划拨。据测算，将有约 15.4 万亿日元的政府预算用于防止消费税率提高而可能引发的经济下滑，从规模上看已经足够有力了。但 5.5 万亿日元的支出项目中，只有 11% 约 6000 亿日元直接用于刺激消费（补助年收入低于 200 万日元的家庭），而 89% 都用于与消费关系不大的公共支出。原本用于扩大内需、消化提高税率负面影响的巨额财政支出，变成了满足各方面需求、各种利益集团欲望的“集体会餐”。这样的补充刺激政策难以收到预期效果，还会进一步加剧本已糟糕的财政状况。

总之，无论是加薪还是增加预算支出，都无法有效缓解消费税率上调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在经过一季度的高速增长后，二季度日本经济很可能会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

（二）2014 财年预算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014 财年政府支出将达到创纪录的 95.88 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高出约 3.3 万亿日元。从预算支出内容看，主要增加三大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加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基金为主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占财政经费约 4 成；增加防灾和救灾设施的建设；增加防卫经费支出。可见，财政支出更多是用于维持目前的民生保障和对外的国防军事，真正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不大。据日本财务省预计，2014 年财政支出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0.2%，远低于 2013 年 1.1% 的水平。虽然此次大规模财政预算凸显了安倍政府

全力刺激经济的强烈愿望，并希望能兼顾实现经济复苏和财政整顿，但实际上两者可能都兼顾不到。

而且，如果意外出现较高通胀或出现国债利率的上升，会给日本财政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按照当前的国债规模和财政收入水平，如果国债利率上升到 2%，日本政府债务的利息开支将会占财政收入的 43%左右，任何经济增长都不足以抵消这样的负担。从历史的观点看，如果政府利息负担超过财政收入的 40%，对一国的发展可能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如大英帝国为了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促进战后经济恢复，不得不大量举债，一段时期内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了 40%，成为引发英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到 2020 年实现中期预算平衡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

（三）日本国内对经济增长的信心问题

日本股市 2014 年新年开盘出现全面下跌，是日本近 20 年来首次发生开年即跌的情况，到 4 月底日本股市已下跌 12%左右，预示市场投资者对今年经济前景的担忧。日本国内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主要源于四个方面：

一是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出口难以实现快速增长。以前美欧等是日本产品的主要市场，目前美欧复苏并不强劲以及本地再工业化，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终端市场需求不振把日本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如在高端产品环节，美国以原创技术占得先机；在终端产品环节，韩国的产业结构与日本相似，产品质量相近，竞争日趋激烈；在大规模生产环节，中国、东南亚等又具有很大优势。日本索尼公司的持续大幅亏损就是日本企业的一个写照。曾几何时，索尼几乎是日本乃至世界科技的代名词，是创新和品质的化身。但由于没能跟上技术潮流，液晶电视方面落后于三星、LG 等竞争对手，在智能手机的角逐中落后于苹果、三星，中国手机厂商也在赶超，索尼在亏损泥潭中难以自拔。可见，很多日本企业现在受到多重挤压，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

二是财富增长缓慢使广大消费者的信心下降。日本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 0.025%，而物价涨幅在 1%以上，家庭资产在很大程度上缩水。股市上涨只会大幅增加持有股票资产的机构和富裕阶层的收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消费税率提高以及进口燃料价格上涨，也带来生活成本的上升。2013 年日本居民人均收入减至 38533 美元，1994 年为 38688 美元，20 年来日本国民收入呈倒退趋势。如果说这一数据对比有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等汇率因素影响并不准确。那么，还有一组数据更有说服力，到 2013 年 12 月，日本工人工资连续 19 个月下降，为平均每月每人 241525 日元，创 16 年新低。

三是人们期盼的结构性改革难有进展。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4 年《全球经济展望》

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为日本经济带来周期性复苏，但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复苏势头将难以持续。作为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今年 6 月安倍政府将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从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该战略将以就业、农业和医疗领域为核心，以医疗健康、环境能源、下一代基础设施等为重点，由政府扶持开展“战略市场创造计划”、“产业复兴计划”及“国际化战略”；并把受援助企业引进设备和“3D 打印机”的开发费用、面向高中生的创新设计奖学金、创建日本国立卫生研究机构的费用列入预算。但是，新战略是否能顺利推进，各类新措施是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日本经济今年的最大变数。

另外，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也不断显现。2013 年 3 月底，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首次突破 3000 万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24.4%，继续居世界第一，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以每年约 0.7% 的速度减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老龄化将持续恶化。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为越来越沉重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负担，以及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付出巨大代价。

日本政府 1 月份发布报告预计，2014 年日本经济将增长 1.4%，但鉴于上述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市场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这一预测显得过于乐观，日本 40 多家民间智库的平均预测值仅为 0.6%。总之，如果今年日本经济在经过一季度的高增长后出现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安倍经济学”前期成功所积累的政治资本、公众支持会逐渐消耗，发挥的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称，“日本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安倍经济学’再造繁荣的政策效力已经大大退化”。如果出现这样的经济局势，很可能也会影响到安倍政府的执政基础。

四、日本经济的另一面

在外界看来，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江河日下，综合国力日薄西山，正在挣扎着摆脱通缩和衰退。但作为日本的近邻，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 20 年”，尽管中国 GDP 已经在 2010 年实现超越，但从日本的科技实力和民众持有的财富规模看，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日本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环保意识强，劳动力技术技能强，整个社会公平程度高、市场意识强，以及地处世界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等，这些都为“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提供了基础。任何人都不可小视日本经济的实力，更不可小视日本国民和企业的素质，凡是访问过日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美国《纽约时报》曾有文章说，日本在所谓“失去的 20 年”中表现良好，在一些重要领域比美国做得好，日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质量而非数量上。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海外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几十年来日本一直着力在海外扩

张，其本土虽然没有铁矿和煤炭资源，但在澳大利亚却有它自己开办的铁矿、煤矿，不仅能够保障国内的需求，而且有着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在南美洲还经营着大量的土地。日本在海外并购市场也大有作为，2012年收购的国外企业首次超过500家，总耗资约830亿美元。日本海外资产的收益也非常好，每年为日本带来约1700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海外企业留在当地的利润。同时，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2万亿美元。日本还是亚洲的大型投资者，如泰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0%来自日本。日本也是流动性的庞大源头，随着QQE的实施，有大量的资金流出日本进入新兴经济体，有助于填补美国缩减QE所形成的流动性缺口。有分析认为，仅仅是近年来不断收购亚太地区银行的日资银行，就可能向东南亚经济体注入600亿-1400亿美元的资金。所以，应该看到日本经济具有两面性。

中日经济互补性强，中国需要借鉴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在科技创新、环保产业等方面还需要大力引进与合作。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日本应借助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密切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收益。但由于种种原因，2013年中日贸易额下降5.1%，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下降8.7%。如果安倍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用于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使对华出口不是负增长而是正增长，那么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将大为改观，经济发展也将增添更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张季风：《2012-2013年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展望》，《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崔成、牛建国：《2013年日本经济运行情况及2014年走势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12月下期。
3. 伞锋、张晓兰：《安倍经济学能拯救日本吗？》，《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4. 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5. 张哲、何明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新动向》，《世界经济与贸易》2013年第12期。
6. 刘国斌、赵霞：《日本加入TPP谈判与农业改革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2期。
7. 王喜文：《日本经济回归之梦的评述》，《现代产业经济》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融资模式比较研究

梁云凤 肖 鹏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典型的城市建设市场化融资方式分为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公私伙伴关系融资方式。比较发达国家城市建设融资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创新城市建设融资机制具有启示作用。本报告通过比较分析，针对我国城市建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结合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提出区分经济落后城市、经济欠发达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应采用与之适合的融资方式；二是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融资环境的营造上，允许私人部门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生产并提供产品或服务。

关键词：城市建设 市场化融资 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PPP）

作者简介：梁云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政金融处处长、研究员；
肖 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融资，是指政府在可能的职权范围内，将城市公用事业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从社会获得建设资本或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产品 / 服务。这种方式能够较好地处理城市建设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城市建设市场化融资方式分为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公私伙伴关系融资方式。

一、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融资方式比较

（一）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

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对所辖地方的特殊代理权，直接融得民间资本、企业资本和外国资本，或者融得城市公用事业产品 / 服务的方式。政府作为一个地区的管理者，拥有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许多权利，而这些权利本身是一种资源，政府要通过对这些资源的经营，来获得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所需的部分资金或城市公用事业产品 / 服务。这些权利包括冠名权、广告权、特许权、领养权、土地开发权、媒体渠道的转播权以及其他代理权。^①

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可用于非经营性或准经营性城市公用事业。例如，上海利用政府代理权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土地批租，10 年来为上海城市建设提供了 1000 多亿元，如果仅靠政府财力，过去 10 年的旧城改造任务估计需要花费 100 多年的时间。将政府代理权授予 BT（Build-Transfer，建设—移交）的承包人，即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与 BT 捆绑使用，可应用于非经营性城市公用事业。例如，市内道路建设同周边土地融资项目捆绑组合、绿化建设同绿化建设基金的市场运作相结合、污水处理设施开发同排污收费项目组合等。捆绑式组合型投融资方式普遍适用于无投资回报，但能产生较好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如城市道路、公园、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防灾设施等。

（二）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

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是针对非经营性城市公用事业的融资方式，即政府将非经营性城市公用事业按照经营性公用事业 BOT 的模式，授予私人部门建设维护的特许权，并与私人部门签订“回购协议”，从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在规定的年限内，年均等额支付，私人部门可凭政府的回购协议获得抵押贷款。

将 BOT 与建设移交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每年付款的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结合，就可应用于非经营性城市公用事业。在此种融资模式下，投资者可以将政府签署的回购协议质押给银行，向银行长期贷款融资。尽管项目本身不产生现金流量，但通过政府的固定回购，使得项目的融资风险基本锁定。政府的回购资金除了满足投资者本金收回、归还银行贷款外，还包括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利润。在 BT 模式下，政府不需要出具项目的投资费用，

^①冠名权：可以把道路、桥梁、广场、绿地等大多数城市公用事业当作一般产品，拍卖其冠名权，或者允许企业以建设换取冠名权；广告权：通过出售道路两侧一级重点地段的广告设立权引入资金；特许权：例如，大型文化活动的举办权、大型会议的赞助权、城市公用的经营权；领养权：只鼓励企业、个人以有偿方式对有关城市基础设施如树木、绿地等进行领养；土地开发权：授权开发城市道路、地铁等沿线的土地。

也不必直接承担项目建设时期的各种风险，只需在一定期限内相对均衡地支付报酬或租赁费，就能起到延迟支付的作用，易于平衡财政预算，又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

（三）公私伙伴关系（PPP）

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与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PPP 模式的组织形式非常复杂，既包括营利性企业、私人非营利性组织，同时还包括政府部门。合作各方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层次、类型的利益和责任的分歧。PPP 方式并不是对项目全局的改头换面，而是对项目生命周期过程中组织机构的设置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一般来说，私人企业的长期投资方有两类：一类主体是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基金，只对项目进行长期投资，不参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另一类主体是项目投资与运营企业，既对项目进行长期投资，又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经营管理。

这种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项目所在国政府与项目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在项目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组织机构的设置如图 1 所示。其中，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参与者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进行合作，与以往私人企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不同，他们的合作始于项目的确认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并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双方共同对项目的整个周期负责。在项目的早期论证阶段，双方共同参与项目的确认、技术设计和可行性研究工作，采用项目融资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确认，采取有效的风险分配方案，把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的参与方来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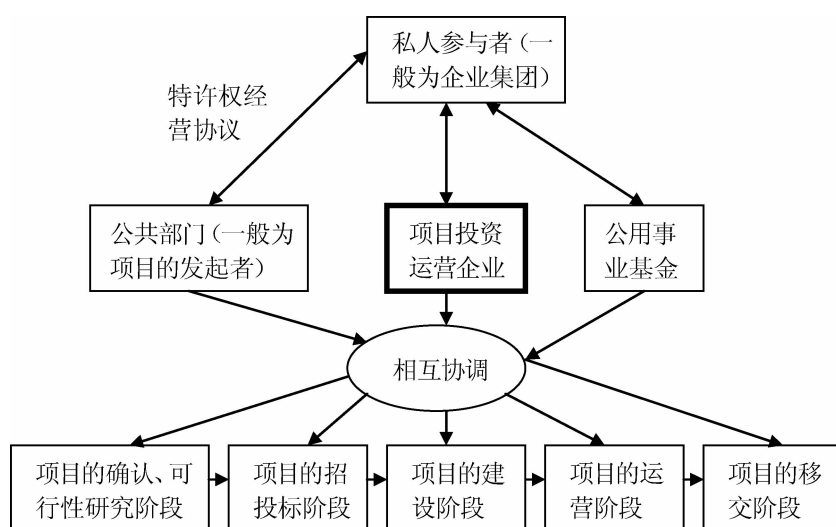


图 1 PPP 模式的运营特点

PPP 融资模式存在的基础是合同、特许权协议和所有权的归属，按照上述三要素组合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公私运作模式。

1. 服务协议（Service Contract）。对一些特殊的公用事业项目，政府可以把服务出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公共部门仍需对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负责，承担项目的融资风险。这种协议的时间一般短于 5 年。

2. 运营和维护协议（Operate & Maintenance Contract）。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运营和维护协议，由私人企业负责对公用事业进行运营和维护，获取商业利润。在该协议下，私人企业承担公用事业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的全部责任，但不承担资本风险。该模式的目的是通过引入私人企业，提高公用事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 租赁—建设—运营（Lease-Build-Operate）。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长期的租赁协议，由私人企业租赁业已存在的基础设施，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租赁费用。并在已有设施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资金或融资能力对基础设施进行扩建，负责其运营和维护，获取商业利润。在该模式中，整体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属于政府，因而不存在公共产权问题。

4. 建设—转移—运营（BTO, Build-Transfer-Operate）。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议，由私人企业负责基础设施的融资和建设，完工后将设施转移给政府，然后政府把该项基础设施租赁给该私人企业，由其负责基础设施的运营，获取商业利润。在此模式中，也不存在基础设施公共产权问题。

5. 建设—运营—转移（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拥有一转移（BOOT, Build-Operate-Own-Transfer）。由项目所在国政府或所属机构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Concession Agreement），本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负责安排融资。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负责开发、建设项目并在特许权期内经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在项目特许权期末根据协议由项目所在国政府或所属机构支付一定量资金（或无偿）从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手中取得项目。

6. 扩建后经营整体工程并转移（Wrap around Addition）。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议，由私人企业负责对已有的公用事业项目进行扩建，并负责建设过程中的融资。完工后由私人企业在一定的特许权期内负责对整体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经营和维护，并获得商业利润。在该模型下，私人企业可以对扩建的部分拥有所有权，因而会影响到公用事业的公共产权问题。

7. 购买—建设—运营（Buy-Build-Operate）。政府将原有的公用事业项目出售给私人企业，由私人企业负责对该公用事业进行改建、扩建，并拥有永久性经营权。

8. 建设—拥有一运营（Build-Own-Operate）。在该模型下，由私人企业负责公用事业项目的融资、建设，并拥有该项公用事业，对其进行永久性经营。

上述各种运作模式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大，但也各有特点，从而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PPP 融资方式优势突出：（1）这种组织机构的设置形式可以尽早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进行项目融资，并在项目的初始阶段更好地解决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风险分配。（2）可以使私企在项目的前期就参与进来，有利于利用私企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3）公共部门和私企共同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服务。（4）使项目的参与各方重新整合，组成战略联盟，对协调各方不同的目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5）有意向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私企可以尽早与项目所在国政府或有关机构接触，节约投标费用，节省准备时间，从而减少最后的投标价格。

二、发达国家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比较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公用事业投融资基本上是一种混合体制，即国有和私有并存。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公用事业，在不同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不同机制的运用有很大的不同。

（一）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注重私人经济参与公用事业的经营，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货币、经济立法、产业政策和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实行引导。其市场化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从投融资主体角度讲，政府是主体。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但私有化不是目的。政府认为，公用事业推动私有化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为了放开市场、促进竞争、改善管理，从而让客户有更多选择，并使服务价格更具竞争性。另一方面，限制私营资本的进入领域，优先国家垄断，仍以政府公有为主导。

从项目管理角度讲，政府直接管理，控制垄断行业价格。政府对交通、通讯、邮政、能源和供水等部门的价格，实行直接管理；对保险费和医疗卫生的收费，实行部分管理；对烟、酒、汽油等采取税收控制价格。

从项目监督角度讲，加强立法，注重政府监管。德国政府出台的公司治理方针，规范公司治理机制和竞争行为；制定了相应法律，从各个方面禁止或限制垄断行为，促进竞争。而且，政府建立了向政府直接负责的跨部门的联邦卡特尔局等独立机构，专门负责反垄断。

（二）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非常重视政府的作用，积极倡导公私合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投融资主体角度讲，法国模式按照项目具体属性及重要程度，明确投资主体。一方面，法国政府把城市公用事业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经营性或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这类项目完全由政府财政预算投入，如果财政资金不能满足投资需求，则由政府向银行贷款；另一类是经营性或可收费的项目，政府允许企业进入，鼓励企业通过市场融资。另

一方面，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合理分配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应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

从融资模式角度讲，法国政府积极提倡特许经营模式、发展公私合营。特许经营制度是指在保持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公有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将某一公用事业经营权委托给私人机构或某些公立机构，双方通过签订契约来明确各自的行为和职责，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从项目管理程序讲，法国政府细化了项目投资程序，政府掌握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权。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在政府决定建设某一项目后，通过该行业若干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政府选择一家优势企业，特许其参与该项目的经营。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保证政府目标的实现。从项目监管角度讲，法国政府完善了监管体系，包括受托企业内在运营机制和政府、居民的外部监控机制。

（三）英国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基本上把城市公用事业视为政府部门提供给公众的福利产品，主要采取政府投资运营的模式。1979 年开始推行以市场化为指导的公用事业投融资体制改革。英国模式集中体现了政府引导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投融资主体角度讲，英国政府大力推行民营化，鼓励竞争。英国政府通过出售国有股、政企分离等方式，对公用事业各领域实行改革。改革以促进竞争作为重要目标，积极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公用事业的经营，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政策也都是以强调竞争的作用为主要内容，从而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改革后期，过度看重私人竞争，政府放松了管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

从投融资模式角度讲，与强调竞争相适应，英国政府积极推行 PFI 模式（私人主动融资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私人主动融资，是英国政府于 1992 年提出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兴起的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是继 BOT 模式之后的又一优化和创新的公共项目融资模式。PFI 的含义是指政府部门根据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出需要建设的项目，通过招投标，由获得特许权的私营部门进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并在特许期（通常为 30 年左右）结束时将所经营的项目完好地、无债务地归还政府，而私营部门则从政府部门或从接受服务方来收取费用以回收成本的项目融资方式。该模式在削弱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从项目管理角度讲，英国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组织，管理、协调有关事宜。该机构主要为政府部门提供以下服务：快速而有效地推进政府项目的公私合作模式；与私营部门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政府节约公共投资的成本；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价值的保值

和增值管理。从项目监管角度讲，英国政府建立了法定的政府管制机构，同时重视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例如，社会各类听证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美国模式

美国自然垄断型公用事业的传统治理方式为民营经济负责，政府进行管制，严格的准入管制扼制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影响了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因而美国公用事业改革的核心在于改革对经营公用事业企业的管制。其中政府主要职能如下。

从投融资主体角度讲，以私人为主，依据项目属性具体划分。一方面，放松管制，放宽或取消进入市场的管制。但是，放松管制的领域主要是自然垄断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领域，以及原有自然垄断型企业经营的大量非自然垄断业务部分。另一方面，对自然垄断性业务，政府仍为投资主体。

从融资模式角度讲，依靠资本市场，多种融资模式并存。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发行市政债券是其主要融资模式。同时，BOT、PPP、ABS 等新型融资模式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从项目监管角度讲，重构管制机构。美国在实施自然垄断型企业管制改革时组织了专门的负责机构，这一改革主要通过由国会专门立法建立的独立管制机构来实施。这些机构大体上有三种管制权力：一是核发经营许可证；二是规定运费和价格；三是核准企业组织的内部规章。

从法律法规角度讲，完善管制法律。美国在公用事业的管制改革过程中，坚持管制标准中立、程序公开的原则，制定了较为完善细致的法律法规，使整个管制改革过程有法可依。

三、城市建设融资的演变过程

（一）发达国家城市建设融资演变过程

发达国家城市建设投融资改革从“国有化浪潮”，经过“私有化浪潮”，到目前的“公私伙伴关系”，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深层次的原因，如图 2 所示。

发达国家城市公用事业的生产、提供及市场化融资方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公用事业投融资处于国有化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能做到城市公用事业的普遍服务，但也暴露出财政资金严重短缺、政府完全承担经营风险、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以及存在垄断阻碍技术进步等问题。许多国家开始筹划引入私有化和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生产提供，财政不足部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债券。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券为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募集资金，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会受到很多限制和约束，还会因为偿债的危机而引发地方性财政信用危机，所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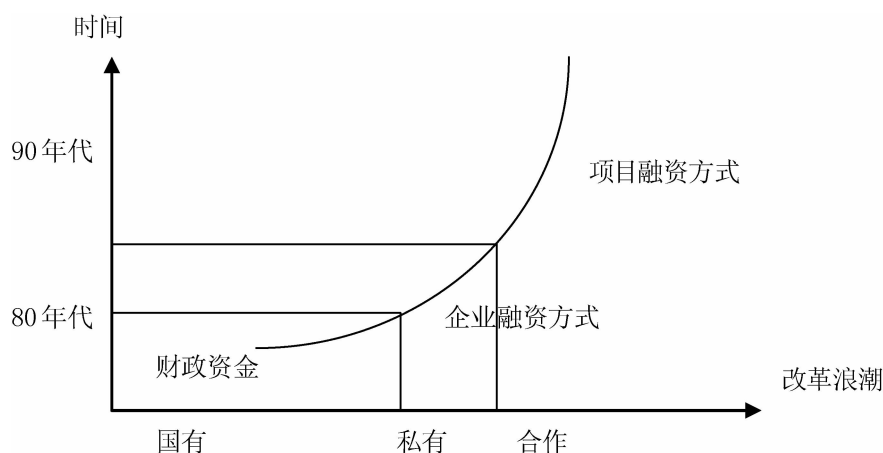


图2 发达国家城市建设融资演变过程

市公用事业项目经常采用发行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有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还成立了专门的公用事业部门为电力、煤气、自来水和通讯等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阶段：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融资方式。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城市公用事业投融资私有化的改革浪潮，即采取特许经营方式、BOT方式、国有企业整体出售等私有化方式。私有化虽然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又出现了城市公用事业提供价格高、不能实现普遍服务等弊端。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既能提供普遍服务、保障公共产品的公共性质，又能促使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提高效率的城市公用事业融资方式。经过私人生产、政府提供，建设资金几乎不需要政府资金。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城市公用事业除邮政、公路全部属于国有外，私人资金在其他领域占很大比重。西欧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浪潮之后，私人资金在城市公用事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在英国（除了北爱尔兰外），城市公用事业中除了城市公用道路、环保园林、固体垃圾处理几项外，其他城市公用事业基本实现了完全私有化，不再需要政府资金。

第三阶段：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项目融资方式。20世纪90年代，公私合作制成为城市公用事业投融资改革的新浪潮。采用公私合作制后，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使用、生产技术效率都得到提高。政府提供、公私合作建设生产，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收益由政府与私人部门共享。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方式是公用事业和服务生产方式的新理念，包含了公共部门选择合适的私人伙伴，并与之合作分担风险、分享收益的公共服务提供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英国提出公私伙伴关系的城市公用事业融资方式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得到响应。欧盟、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推广这一理念。公私伙伴关系应用于道路、桥梁、隧道、港口、轨道交通、供水、供电、燃气、垃圾处理等许多领域，如1996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8年法国世界杯体育场馆就是以公私伙伴关系

系方式建设和运营的。公私伙伴关系方式在发达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英国财政部对已经完成的公私伙伴关系合作项目的调查显示，88%的项目能够提前或按时完成，并且没有出现因为工程超出预算而要求公共部门承担额外费用的情况。而以前 70%的非公私伙伴关系合作方式项目都会延期完成，并且 73%的项目都会超出预算。75%的公共部门合作者认为，他们的合作在运营中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或比预期还要好。

（二）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融资方式演变

在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中，发展中国家主要经历了中央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的高度集权和中央向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私人部门放权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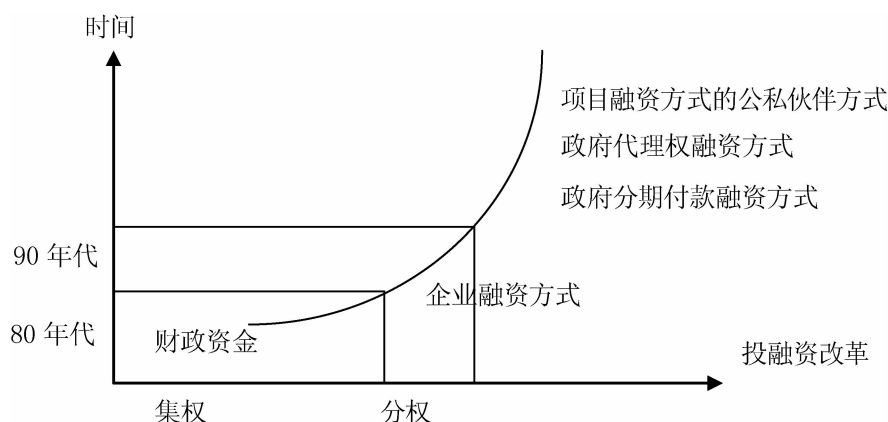


图 3 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融资方式演变

第一阶段：中央集权，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央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投资高度集权。中央政府将公用事业投资的权责集中起来，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进行建设，满足加速经济增长的需要。另外，由于存在“市场失灵”，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城市公用事业大部分由公共部门提供，结果远郊区得不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价格高、质量差，公共部门不愿进行长期投资和技术变革等。这期间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国有企业的投入和中央政府拨款，但是，政府集中建设管理又造成建设运营效率低和重复建设、浪费资金等问题。

第二阶段：地方分权，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融资方式和项目融资方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趋势对城市公用事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但地方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来满足城市公用事业建设的要求。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筹资等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私人部门转移，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允许私人部门参与城市公用事业投资。

我国城市公用事业融资经历了政府投资建设、私人参与资金，逐渐发展到私人部门参与生产的公私合作阶段。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大幅度提升，但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相对不足、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

四、对策建议

第一，不同地区城市建设采取何种融资模式，应结合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在经济落后的城市，应采用政府代理权方式，项目融资方式中的债权融资方式。如国外政府组织的无条件优惠贷款、国内开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这些融资方式不需要地方政府的特别行政管理能力。在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可采用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项目融资方式三种。但是项目融资方式中的 PPP 方式、企业融资方式中的股权融资方式，应选择在国内外已有成熟应用的城市公用事业行业尝试应用，因为这些融资方式需要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地方有丰富的城市公用事业建设经验的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可采用政府分期付款融资方式、政府代理权融资方式、项目融资方式，尤其是项目融资方式中的 PPP 方式、企业融资方式中的股权融资方式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创新应用，因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具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可竞争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第二，政府应该从城市建设的微观事务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融资环境的营造上。包括制定投融资制度、技术改革制度、激励制度、城市公用事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制度、私人部门竞争性规制等。针对不同的城市公用事业，采取不同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的方式，允许私人部门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去生产。具体操作可采用三种方式：一是自由竞争方式。对可以通过收费投资的城市公用事业项目，政府通过招标选择私人企业，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建成后向社会收取服务费回收投资，政府不参与投资和管理。二是政府补贴方式。对可以收费但通过收费不能完全收回投资的公用事业项目，政府通过招标选择私人企业，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主要通过向社会收取服务费回收投资，政府适当给予补贴。比如英国隧道建设项目，政府在建设前期提供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启动，投资回收则完全由私人公司负责。三是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不宜通过向社会收取服务费回收投资的公用事业项目，政府通过招标选择私人企业，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明确服务期限和付费标准。美国地方政府提供的 65 种基本市政服务中，有 23 种是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完成的，如私人部门成功地参与了修建收费公路、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等。还有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如垃圾处理、街道清扫、公园维护等，采取服务与管理合同外包的形式让私人部门参与。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关于“营改增”改革问题的深化研究

沈开艳 杨亚琴 汤蕴懿

摘要：本报告采用理论演绎和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营改增”的深远影响及未来的走势，认为此次税改以来“营改增”的减负效应基本达到预期，并提出三个重要观点：一是从长期看“营改增”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会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二是“营改增”作为重大制度创新将产生诸多联动效应；三是应通过政策组合把税改效应发挥到最大。本报告特别对“营改增”所带来的六大波及效应作了深层次分析，认为“营改增”带来的波及效应，一方面，会优化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结构，使得生产体系更加网络化、弹性化和融合化，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有力刺激新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展开，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营改增” 拉弗曲线 波及效应

作者简介：沈开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亚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汤蕴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012 年 1 月，上海率先在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方案，试点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和鉴证咨询服务共六类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1+6”）。2012 年下半年，北京、天津、江苏等八个省市也先后加入到“营改增”试点行列。2013 年 8 月份，国务院决定把“营改增”推向全国，与此同时，广播影

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也被纳入到试点行业。从 2014 年 1 月起，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也被纳入试点。这意味着下一步“营改增”的改革模式将从地区试点转向行业试点，分行业在全国推开，成熟一个行业推进一个行业。

作为一种“上下互动”型的改革，2012 年仅有 12 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试点，2013 年 8 月才推向全国。时间短、行业少使得现有的数据难以从“营改增”两年的进程中对之进行总体的、全面的评估，更难以展现出“营改增”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及影响。为此，本报告将更多采用理论演绎和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剖析“营改增”的深远影响及未来的走势，并提出如下重要观点：其一，从长期看，“营改增”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其二，“营改增”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将产生包括推动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在内的诸多联动波及效应。其三，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把“营改增”的效应发挥到最大。

一、“营改增”与税收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上海和全国的实践表明，“营改增”对服务企业有明显的减负效应，对于国家财政而言，从短期看，会降低政府税收收入；但如果放眼长远，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增。这也是“拉弗曲线”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一）从“拉弗曲线”看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经典的“拉弗曲线”中，决定税收收入总额的因素，不只是税率高低，关键要看税基大小。提高税率不一定会使税收收入增加，有时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主要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活动能力，如图 1 所示：随着税率增加，税收收入达到最高额 CA，税基 OA 也同步增加；当税率超过图中 C 点时，税率过高，税收负担加重，经济主体的活动受到限制，削弱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会造成生产下降趋势，企业的数量规模自然减少，导致税基降低。要恢复经济增长势头、扩大税基，就必须降低税率，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鱼与熊掌兼而得之——收入和国民产量都将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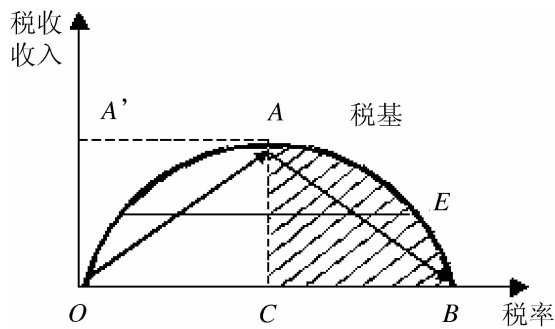


图 1 “拉弗曲线”中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关系示意图

“拉弗曲线”描述的是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各项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正是这种“时滞作用”，使短期虽然税基逐步放大，但税收降低（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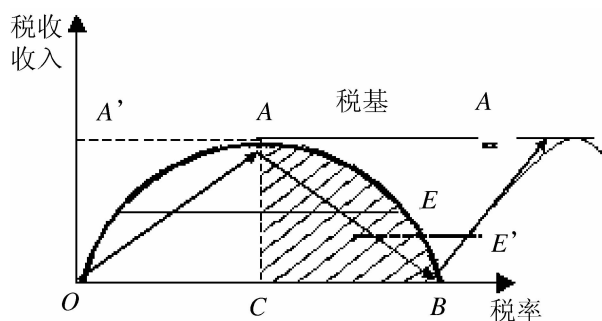


图 2 “拉弗曲线”中税收收入与税率增长的“时滞”现象

国际经验表明，单纯“减税让利”的低税负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反向关系。各国在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在减税前提下更注重通过税收的结构性调整，激发企业经济活动能力。

从各国实施增值税的经济发展背景看，由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弊病，当一国需要大量投入去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又要求加强专业协作的时候，营业税势必对投资产生较大的扭曲性，不利于专业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增值税来取代营业税，以刺激经济发展（表 1）。

（二）“营改增”的国际经验借鉴

20 世纪 90 年代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税收制度进行深刻改革，掀起了税制改革高潮，也积累了经验。各国实践证明，“营改增”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但也存在一定“时滞”效应。“时滞”周期长短受各国经济结构、市场化水平、企业发展和推进速度的综合影响。发达国家“过渡期”短，但税收增减幅度大，如澳大利亚 2000 年实行商品和劳务税后，2001 年税收增长率出现大跳水，由 2000 年的 8.93% 跌至 2001 年的 1.54%，但一年后又重新回到了 8.9% 水平并一直保持到 2007 年金融危机前。发展中国家“过渡期”长，但税收增减幅度小，印度用了 5 年时间，越南用了 6 年时间实现了税收回升。上海 1994 年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中，“时滞”过渡周期为 5 年，其中第 4 年税收增幅达最低点。从 1999 年后上海税收保持了连续 10 年的持续增长。

（三）“营改增”所带来的税收结构优化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此前有研究证明，中国减税让利的低税负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反向关系，总体税负水平若增加或降低 1 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可能相应地降低

表 1 各国实施增值税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

国家	实施增值税的经济发展背景	共性
发达国家	二战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百废待兴,需要巨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需要加强专业协作,而西方国家原来实行的重复征收的营业税,对投资有较大扭曲性,不利于专业化发展,必须有新税种取代。西方国家战后高科技发展迅速,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资本有机构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①	经济结构调整、专业化协作发展,以及国际分工、协作的日益加强,要求实行增值税来顺应这些变化。
澳大利亚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成熟,澳大利亚的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整体水平呈下滑趋势,而服务业整体水平则呈上升态势,占 GDP 的份额不断提高。随着澳大利亚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转出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服务业,从而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针对这些变化,澳大利亚进行了商品和劳务税重大改革,在全国开征商品和劳务税。	
印度	印度复杂的商品服务税制增加了商业成本,为商品流通设置了障碍,不仅割裂了国内市场,而且造成重复征税,加重了经营者负担。加上对生产和服务的不同税收待遇也扭曲了市场行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对商品和服务进口、批发和销售行为征收货物与劳务税,把生产和销售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纳入货劳税范围,减少免税项目,增加政府收入。	
其他国家	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流通环节增多,营业税使位于产业链后端的生产经营者累积承担的税负加重,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或提高 0.13 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税收政策重点应立足于税收结构的调整优化。

“营改增”政策试点,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整体税负和专业协作,更为重要的是,二三产不同经济主体间由于税种不同限制经济活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降低制造业的税负,从而提高了三产内部和二三产之间各专业领域的投资积极性,促成生产和服务协同发展的格局。

假设部分行业实行“营改增”,即对象仅限于上海目前增值税扩围的试点行业,那么

根据 $\Delta t_i = t_i - t'_i - \frac{\sum_j t_j H_{ji}}{R_i}$, 并利用《上海 2007 年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这些服务业的税负变化情况如(表 2)所示。

从表 2 看出,部分行业“营改增”中,有的企业税负比原来变重了,这主要原因是这

①亦韵:《消费型增值税》, <http://www.baike.com>, 2009 年 6 月。

表 2 部分行业“营改增”对相关服务业行业流转税率影响的测算

行业名称	税负变化	行业名称	税负变化
租赁业	0.0886	道路运输业	-0.0225
铁路运输业	0.0248	水上运输业	-0.0258
城市公共交通业	0.0093	软件业	-0.0277
管道运输业	0.0045	仓储业	-0.0371
航空运输业	-0.0040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0.0468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0.0054	建筑业	-0.0541
计算机服务业	-0.0194	专业技术服务业	-0.0732

些企业的抵扣税额相对较少。同时，改为增值税后所适用的税率较高，导致“营改增”的增税效应大于减税效应。

二、“营改增”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2012 年 1 月至今，“营改增”税制改革在上海试点已近两年。实践表明，“营改增”已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包括避免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良性互动，推动服务经济向纵深发展等。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在 2012 年一举突破 60% 关口，“营改增”功不可没。从理论层面剖析，“营改增”所具有的税收中性原则将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促进市场分工，促进服务外包。随着“营改增”进一步深化扩围，还将并入更多的行业，打通更多的环节，纳入更多的地区，从而实现改革效应的最大化。

“营改增”作为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其直接作用对象是服务性行业，除行业本身外，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都会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2012 年全年上海整体减税 260 亿元左右，而全国试点城市直接减税达到 426.3 亿元，整体减税面超过 90%。^①与直接降低企业负担相比，“营改增”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一轮又一轮依次产生的波及效应，特别是在行业和空间扩围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波及效应将远远大于直接效应。这种波及效应的不断深化将成为服务业转型和升级的催化剂；成为扩大税基、促进就业的助推剂；成为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优化完善分税制体系的发酵剂。

^①《上海“营改增”一年减税 200 亿》，《东方早报》2013 年 2 月 27 日，www.eastmoney.com。

（一）“营改增”带来四大直接效应

在征收营业税的情形下，生产环节越多，则该生产链条上企业被重复征税的次数就越多，企业整体税负越重，因而营业税不利于产业链的分工与细化，同现代化大生产体系所要求的“迂回生产”相悖。改征增值税后，这一弊端得以消除，生产链将按效率原则重新予以构建，资源的配置也将更为合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大大增强。这种“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上内化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剥离。二是总集成、总承包型企业税负显著下降，企业将更加专注于平台搭建、模式创新、风险控制、业务整合等核心业务，而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增强总包企业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三是同等条件下企业将越来越倾向于从市场中购买各种专业生产性服务，一方面，将直接刺激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企业的主辅分离。四是服务贸易企业实行零税率政策将极大地促进离岸外包企业的发展，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营改增”带来六大波及效应

上述种种还会进一步产生相对间接的波及效应，这类效应虽时滞长、见效慢，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营改增”改革的重要结果。主要包括：一是企业分工细化，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逐步提升。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得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不断深化。三是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按照效率原则或嵌于企业内部，或独立出来，推动制造型企业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制造”转型，而这也正是服务经济的最本质内涵。四是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营改增”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小微企业，其税率由原来 5% 的营业税改为 3% 的增值税，税负明显下降。这会使各类小而专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蓬勃涌现，使传统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也买得起专业化服务，从而提高小企业的竞争能力。从长期看，企业数量的增加将带动就业并产生直接的收入效应，而收入效应也将通过刺激内需为整个生产体系注入正能量。这是一个典型的良性正反馈过程，其结果是企业投资信心增加，税基扩大。五是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六是减负后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增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企业的业务会出现扩张，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另一方面，增值税可抵扣直接刺激某些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加速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第三方面，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逼迫企业在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如果在一个长周期内审视，可以发现上述种种变化，一方面，会优化整个经济体系

的生产结构,使得生产体系更加网络化、弹性化和融合化,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将有力地刺激新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展开,特别是依托大型城市的新城镇将首先从中受益,最终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从长期看,经济将变得更加富有活力,这也意味着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尽管从短期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所减少,但在长时期内,税收收入一定会因此而增加,这也是经典的“拉弗曲线”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基于此,本文认为,“营改增”税制改革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三、“营改增”扩围后的趋势及预判

(一) 对此次“营改增”性质的基本判断

1. “营改增”改革是基于分步推进扩围的策略选择。渐进式推进是中国改革的宝贵经验,此次“营改增”改革试点,充分体现了“先易后难、先生产后生活”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力求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实现增值税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下一步:首先,将容易操作且有共识的铁路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纳入试点行业范围,实现这两个行业的全覆盖;其次,将改革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建筑业、转让无形资产、文化体育业、服务业等行业,将能够按照标准方式征收增值税的行业尽可能都纳入到试点范围;最后,对不宜按标准方式征收增值税的金融保险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如娱乐业、餐饮业)等难度较大的行业暂时采取简易征收方式,从形式上基本将全部行业都纳入增值税范围。

2. “营改增”改革的战略意图是要推动服务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1994 年推行的第一轮“营改增”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包干制所带来中央财政陷入困境的问题,它直接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分工细化,推动中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而本轮“营改增”的宗旨在于推动服务经济发展。上海在 2010 年自发开展了“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研究”,该项研究以“雄辩的分析、翔实的案例、科学的数据和国际的比较”充分论证了“两税并存”已经成为阻碍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促使中央下决心加快推进此次“营改增”税制改革。

“营改增”有利于发挥增值税的中性特征,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税收瓶颈问题,对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深远影响。此次“营改增”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大幅度减税效应促进了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也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尽管税收收入暂时受到一些影响,但长远来看会产生减税后的“拉弗曲线”效应,即随着产业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税基将进一步扩大,于是总体税收收入将不减反增。

3. “营改增”推动服务经济发展要打政策“组合拳”。首先,通过“营改增”促进服

务经济发展，要牢牢抓住增值税不同于营业税的本质特征。第一，实行增值税能避免重复征税。发展服务经济，就是要利用增值税的这一特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促进市场分工，促进服务外包。下一步“营改增”需要打通更多环节，将更多的行业、更多地区纳入，只有这样，“营改增”的改革效应才会最大化。第二，增值税比营业税更符合税收的中性原则。增值税从消除重复征税上是中性的，它向服务业扩围，可以消除原来两税并存对服务业的抑制。但是，如果实行过多档次的税率，带来的不仅是税收征管的复杂化，实际上仍是维持行业税负不均衡的经济运行扭曲状态，也没有发挥增值税应有的中性作用。从长期来看，多档税率会影响下一步改革和国家经济运行。

其次，增值税改革要发挥作用，要有必要的外部条件，行业相关改革必须先行。增值税有效发挥税收中性需基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从现已实施改革试点的“1+6”试点行业来看，都是市场竞争更为充分的领域。当然，中国服务经济发展，仅税制改革还不够，“营改增”效应的发挥还存在很多税收以外的制约因素，如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等，这些对中国金融、贸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最后，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税制改革本身也要打“组合拳”。发展服务经济，是要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而服务业的高附加值主要高在人力资源或智力要素上。依据中性原则，税收同样不应抑制智力要素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的现状是，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过高，已经严重阻碍了智力要素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一道“高门槛”。因此，“营改增”仅仅是在流转税领域中解决服务业的税负过重问题，但是还没有在所得税领域中解决智力要素税负过高问题。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改革，需要多个税种打出“组合拳”。特别是金融行业等高端人才要素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业的发展，个税改革需求迫切。

4. “营改增”会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目前，改革试点的“1+6”行业领域主要涉及原营业税9大类（另有金融保险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和销售不动产等）中的“1.5个行业”，涉及税额仅占9大类营业税总额的不足一半，由此导致抵扣链条不系统、不完整，抵扣项目较少，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出现税负增加等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营改增”将影响当前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营改增”局部试点可以暂时不改变财政管理体制，但在“营改增”扩围以后，如何保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合理分配，成为考验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论怎样，“营改增”都会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改革，并进而深刻影响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

（二）“营改增”扩围后对各相关行业税负水平研究

按上文同样的方法，本文对“营改增”全面扩围后各相关行业的税负水平变化作了预测，如表3所示。

表 3 “营改增”全面扩围对相关服务业行业流转税负影响的测算

行业名称	税负变化	
	税率 6%	税率 11%
租赁业	0.07177	0.05771
铁路运输业	0.02396	0.02325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	0.00641	0.00403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0.00262	-0.00743
管道运输业	-0.00767	-0.01780
体育	-0.01218	0.03140
新闻出版业	-0.01237	0.03025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0.01285	-0.01905
银行业	-0.01297	0.02884
证券业	-0.01390	0.02843
航空运输业	-0.01698	-0.02783
邮政业	-0.01819	-0.01982
房地产业	-0.02349	0.01918
其他金融活动	-0.02369	0.02002
计算机服务业	-0.02397	-0.02776
水上运输业	-0.02685	-0.02776
道路运输业	-0.02704	-0.03083
居民服务业	-0.03015	0.01550
保险业	-0.03228	0.00462
软件业	-0.03250	-0.03646
文化艺术业	-0.03321	-0.03693
旅游业	-0.03464	0.00289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0.03509	-0.04168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0.03765	0.00471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0.04867	-0.05021
建筑业	-0.05463	-0.05507
仓储业	-0.05500	-0.06992
住宿业	-0.05786	-0.01112
餐饮业	-0.06331	-0.01578
地质勘查业	-0.06408	-0.06573
商务服务业	-0.06484	-0.06709
专业技术服务业	-0.07559	-0.07754
其他服务业	-0.07843	-0.03192
娱乐业	-0.08692	-0.04164

注：税率 6%与 11%表示，除“营改增”试点行业 and 行业税率假设为零的营业税行业外，“营改增”全面扩围后可能实施的两种税率。其中，6%是“营改增”后相对较低的税率，目前主要是研发和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采用；11%主要是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

从表 3 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营改增”会同时给服务业带来增税效应与减税效应，其中，主要是减税效应，企业在总体税负下降的同时，行业间税负水平分化加大。“营改增”采取行业间逐步扩围的推进模式，不同行业的抵扣链条存在先后实施顺序，企业减税效应随着涉及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放大。经测算，“营改增”全面扩围后，当前 34 个现代服务行业中有 24 个行业税负水平将绝对下降，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减税效应最明显。如采取 6% 税率，租赁业、铁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税负水平将增加；如采取 11% 税率，税负水平增加的行业还将增加新闻出版业、银行业、房地产业、其他金融活动、居民服务业、保险业、旅游业。在全面扩围情况下，“营改增”会使大部分服务业行业的流转税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获得较为显著的减税效应，但租赁业和部分交通运输业的流转税负会有所上升。

第二，由于“营改增”采取由“部分到全面”的改革模式，不同行业存在先后顺序。

第三，各省市将面临 3 年左右税收减少“过渡期”，其中，中西部地区“过渡期”更长，税收回升增速较慢。由于中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差距较大，本文估算，上海将用 3 年时间完成“过渡期”，并将在 2014 年-2020 年间实现税收和 GDP 的持续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过渡期”将延长到 5 年-6 年。

（三）“营改增”扩围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趋势预测：2011 年-2020 年

1994 年，中国启动了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并形成了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营业税并存的格局。本文对上海（1994 年-2011 年）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进行计量分析，就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测（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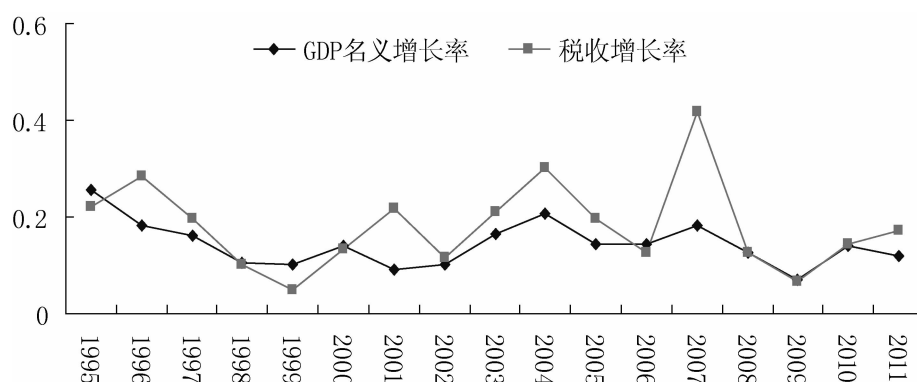


图 3 1994 年-2011 年增值税改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测算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上海经济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相关分析如下。

1. 1995 年-1999 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初期。税收增长率虽基本高于 GDP 名义增长

率，但总体趋势逐年下降，其中，1999 年税收年增长率下降到最低点，且低于 GDP 名义增长率。此阶段表现出税收政策调整的“时滞性”，周期约为 5 年，其中第 4 年为时滞效应最低点。

2. 1999 年-2008 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成熟期。GDP 与税收增长率开始保持一致，两者整体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且总体上税收增长率逐渐超过 GDP 增长率。此阶段前期税收政策调整的“时滞效应”已结束，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周期为 10 年左右，税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充分体现。

3. 2008 年-2011 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后期。金融危机开始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税收增长出现显著下滑，增长率未能延续之前的高增长态势。同时，与 GDP 增长率差距逐步缩小，说明分税制改革红利完全释放出来，需要新的税收改革制度推进。

4. 2011 年-当前：“营改增”调整初期。通过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税负对数和经济增长率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即现阶段上海市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税负水平的降低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即“营改增”通过结构性减税在短期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5. 2025 年前：“营改增”政策与经济增长的趋势预测。目前，我国“营改增”仍处于试点阶段，全国有更多企业将参与到“营改增”范围之列。我们以 1994 年-2011 年上海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检测作为参考依据，模拟出 2012 年-2025 年上海市“营改增”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结果显示，在经历了 2012 年“营改增”之后的迅速回落后，2013 年上海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逐渐走出下降通道，进入回升阶段，但其间会出现部分波动，预计在 2014 年下半年呈现稳健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到 2020 年，经济增长和地方税收增长将实现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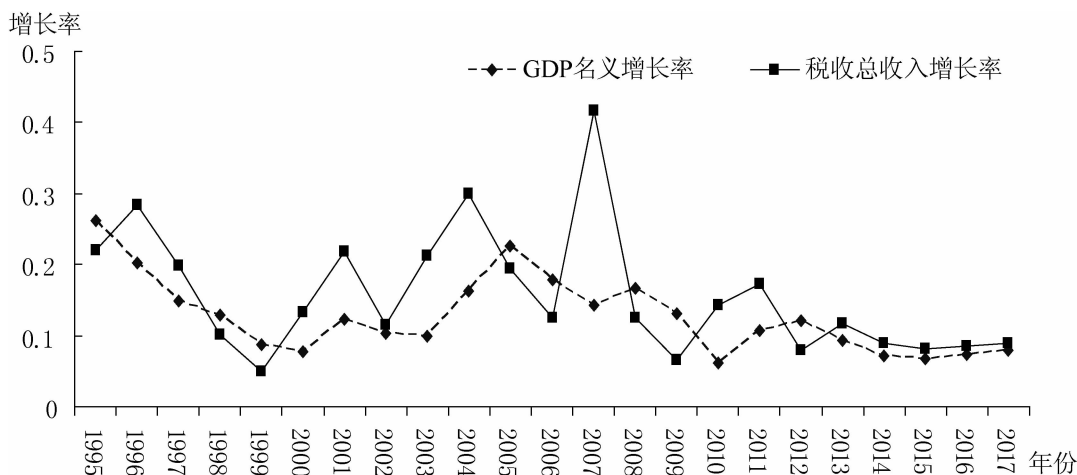


图 4 1994 年-2017 年增值税改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测算

四、“营改增”进一步深化的政策思考

“营改增”试点以来，在企业减负、产业升级、专业分工、二三产融合和规范运行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减少、“洼地政策”和税改效应冲突等阶段性问题。随着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的全国铺开，这些问题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将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进入深刻调整期，东部经济转型发展也需要更多制度红利。如何正视“营改增”的阶段特征和不同区域差异，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试点，需要更多的理论指引和实证经验。本文通过对国外同期改革的考察和上海前期经验数据，对深化“营改增”试点后不同行业税负、地方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拟预测，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以“营改增”为契机，加快推进房产税、资源税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作为试点的配套措施，目前采取的税收“增减平衡”是一种权宜之计，从长期看，现有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将被打破。因此，一方面，地方需要寻找新的主体税种；另一方面，现有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分税制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关于“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问题，结合目前各种可能的税种及其属性，房产税和资源税最有可能和理由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但目前的情况是这两个都是小税种，体量上无法和营业税相比，且资源税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对资源贫乏的中东部地区几乎没实际贡献。因此，从实际操作层面，建议把调整增值税共享比例与完善房产税、资源税改革结合起来，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因改革受影响的前提下，加快培育房产税和资源税，并根据地方税收变化，适时调整增值税共享比例和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

（二）简化增值税税率档数，设立基准税率和一档浮动税率

增值税从消除重复征税上是中性的，它向服务业扩围，可以消除原来两税并存对服务业的抑制。但是，如果实行过多档次的税率，带来的不仅是税收征管的复杂性，实际上还是维持行业税负不均衡的经济运行扭曲状态，也没有发挥增值税应有的中性作用。从国际来看，澳大利亚、新西兰实行的都是一档税率；欧洲实行传统型增值税，只有两档税率，一档是正常税率，另一档是对少数商品（如食品）实行低税率（见表4）。多档税率会影响下一步改革和经济运行。我国目前采用17%、11%、6%和3%四档税率，不同税率导致企业盈亏两重天，建议参照国际通用做法，设立3%为基准税率，同时对于一般纳税人采取5%或6%的一档浮动税率，保证绝大多数企业税负水平降低。

表 4 各国增值税税率设置比较

税率	国家	特点	趋势
单一税率	丹麦、挪威、智利、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	单一税率下增值税计征较为方便,但不利于对不同商品利润、消费的调节。	理论上,增值税作为一个中性税种,要求采用单一税率。然而,由于各国政策需要,目前采用多档税率国家居多。但多档税率的国家普遍有减少税率档次趋势,如法国由 5 档减为 3 档;亚洲国家采用单一税率较多。单一税率和出口零税率是世界各国增值税的发展趋势。
多档税率	欧盟国家	由两个以上税率构成,一般有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高税率。基本税率又称为标准税率,体现增值税的基本课征水平,适用于一般商品和劳务。低税率适用于生活必需品,如食品、药品类;高税率则针对少数需要加以限制的高档商品或奢侈品。	
免税和零税率	大多数国家	大部分国家对基本食品、医疗服务、房屋租赁、教育和金融服务业实行免税。发展中国家大多对种籽、肥料和农机设备等农业生产主要投入物实行免税。韩国对于不用特殊加工的食品、自来水、煤球、部分客运业和社会福利性服务业免税。大多数国家对出口商品和劳务都实行零税率。	

“营改增”后，中国基本税率水平与欧洲国家已接近，但低档税率仍然存在层次多、税率偏高等问题。这不仅与国际改革趋势不相一致，也增加了增值税征收管理难度。我们在深化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减少税率档次，对某些增值税税率高的行业还应进一步降低税率。

（三）建议对中西部地区采取五年过渡期的固定补偿机制

2012 年上海市“营改增”试点减税规模达 260 亿元，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 3%，占上海市 2011 年营业税收入的 28%左右。显然，“营改增”在动了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即营业税）后，给地方税收收入带来持续压力。

上文研究表明，“营改增”未来能带来更好的效益，包括经济增长和税收扩大，但短期内，地方政府更能感受到“营改增”对地方财力带来的压力和影响：一是在“营改增”政策转型期地方财力面临的压力减少；二是试点纳税人增加税负部分进行阶段性补贴也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这“一减一增”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税收方面的双重压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推行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短期

内减税对区域财政收支的压力更大；中期来看，地方上通过“营改增”这一制度红利实现经济增长的“过渡期”也会更长。因此，要真正打消中西部地方政府顾虑，解决中西部地区“过渡期”财政收入减少问题，就必须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好中西部“营改增”中过渡期的政策，把对东部“先征后返”的事后补贴行为提前到专项预算形式的事前补偿机制，并按实际需要设定5年的补偿周期。

（四）建议在东部地区率先推行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联动改革

上海的相关调研表明，前期试点行业的主要运行成本依次为：人工费、差旅费和办公场所租赁费，这三大成本约占企业运行总成本的60%-80%，其中服务业的能级越高，人力资本的比重就越大，但按目前规定，这三个主要成本部分却不能抵扣。因此，在“营改增”试点推进过程中，虽然涉及行业和试点企业进一步扩大，但其政策效应影响范围只占企业成本的20%-40%，抵扣比例严重倒挂，无法实现对服务业内部升级的激励。并且，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成本将持续提高，而生产资料固定设施等成本将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中可抵扣部分和不可抵扣部分的比例结构将进一步“倒挂”，成为制约东部服务业能级提升的主要制度障碍。

基于此，建议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联动改革。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继续推进改革同时，可针对政府财力状况和优先发展的服务业顺序，选择若干行业进行个人所得税联动改革，以实现“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双重调节作用，更好地为扩大企业税基的数量和质量服务。

（五）加强“营改增”宏观监控，拓宽“营改增”改革研究思路

建立全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大平台，对工商、税务、海关、经信委、商委、统计等部门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及早洞见交叉领域、新兴行业发展，对有潜力的行业进行定向扶持。此外，在对深化“营改增”改革的研究过程中，不应局限于国民经济统计的产业分类，或者一级税目、二级税目规定的行业定义。如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模式，应考虑将与此有关的物业管理服务、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租赁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使“营改增”能进一步促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英奎

现阶段我国民间投资格局与未来展望

王元京 史 昊 刘 明

摘要：根据各行业投资资金来源的所有制结构，本文统计分析了近年国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政策实施以来，民间投资的发展格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表明，民间资本在 22 个鼓励性行业和领域投资明显加强，但在能源、铁路、金融等垄断性领域投资比重仍然过低，面临着“进不去”“站不稳”和“出不来”的体制机制难题，因此，应把民生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自然垄断性行业作为民间投资下一步的主攻方向，采取措施实现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关键词：民间投资 “进不去” “站不稳” “出不来”

作者简介：王元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史 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刘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一、引 言

民营经济作为牵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经济形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支撑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投资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释放出越来越大的活力和效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私营、个人等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因此，在统计范围上，本文认为，民间资本作为非国有、非国营

的资本，具体包含了集体所有和联营、股份合作制的非国有成分、私营、个体、个人合伙及其它内资资本。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前，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据统计，集体积累和个人积累在全社会积累额中仅占 20% 多，^①民间资本发挥的作用较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重要文件，民间资本的活力逐渐迸发出来，在改进市场机制、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吸纳社会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民间资本一直都存在着投资领域不宽、融资渠道受限、投资权益保障弱化等障碍，禁锢民间资本发展的樊笼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打破，民间投资未来的发展思路有待于进一步理清。

国内学者目前针对民间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一是民间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伟等（2002）认为，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必须启动民间投资。^②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等（2006）以福建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当地民间投资与 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多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关系，证实了民间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③刘现伟通过分析民营经济重要的战略地位，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直接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式，要切实提高民间资本的质量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④张琦回顾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历年的投资增长情况，认为启动民间投资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的必要条件，拓展民间投资空间是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⑤

二是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陈有棠和卢莉（2001）应用托宾的“q 理论”，从资本的边际产出和成本角度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受限的原因归结为资金的规模效应不足、技术水平落后以及资金的获取壁垒。^⑥陈雪华（2003）从制度变迁层面论述了我国民营经济在信用制度、产权保障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方面的缺失，由此引出民营资本对制度变迁改革的需求。^⑦邱元直（2003）将阻碍民间投资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体制性障碍、政策性

①袁满：《浅析我国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河南大学学位论文 2012 年。

②张伟、侯中华、张奉军：《我国启动民间投资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探析》，《前沿》2002 年第 9 期。

③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晏露蓉、黄素英）：《民间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金融研究》2006 年第 10 期。

④同③。

⑤张琦：《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升级》，《社会科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⑥陈有棠、卢莉：《对我国当前民间投资现状的分析与思考》，《重庆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⑦陈雪华：《论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需求》，《学术研究》2003 年第 7 期。

障碍和其他障碍。其中，体制性障碍主要是市场准入限制、政府垄断因素的存在和国有资本退出受阻导致民间投资空间狭窄，政策性障碍集中在税负偏重、融资政策不利以及民间投资难以充分享有国民待遇；此外，投资主体的信念心态、产权和管理上存在缺陷以及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也对民间投资的增长构成了现实障碍。^① 张晓丹指出，民间投资已投资领域产能过剩、产业分布不合理也是民间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种过于集中的不合理的投资结构是政策管制的结果。^②

三是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关于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对策，各方学者在宏观层面上有大量探讨。秦风华认为，我国加入 WTO 后经济领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深化对内开放，除涉及国家重大影响的行业外，其他领域都应开放，鼓励民间资本进入。^③ 孟耀认为，为实现民间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要转变政府的投资职能，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放权让权、提高效率。^④ 此外，拓宽民间资本融资渠道和改善民间资本生长的产权、中介服务等软环境方面，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总体来看，对民间投资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侧重从宏观层面、制度层面探究民间资本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发展环境，提出的对策建议虽林林总总，但总是缺少实施的必要抓手。本文认为，发展民间资本应有更多的主体意识，打通民间资本与政府、国有企业的联系，内引外联，争取制度空间内最大的改革红利。

二、新 36 条实施以来民间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0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 36 条”）出台。2012 年 6 月底中央相关部委又相继发布了 42 部有关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实施细则，20 多个省级政府和不少市、县政府也出台了本地区的实施办法。政策放宽大大提振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信心，激发了民间投资的活力。

（一）民间投资总量稳步提高

2010 年 5 月“新 36 条”出台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1.2%。2010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 36 条”）出台两年来，我国民间投资规模大幅增加，民间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明显扩

①邱元直：《中国民间投资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003 年。

②张晓丹：《我国民间投资现状和发展建议》，《金融经济》2011 年第 8 期。

③秦风华、方明：《启动民间投资：对策与建议》，《中国投资》2001 年第 5 期。

④孟耀：《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发展演变》，《财经问题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大，民间投资增速始终高于同期整体投资增速。由于民间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多项指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①因此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 年-2012 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55.9%、60.3%、61.4%，增速分别为 32.5%、34.3%、24.8%，分别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7、10.5、4.2 个百分点。2013 年 1-11 月，民间投资完成 248381 亿元，同比增长 23.2%，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 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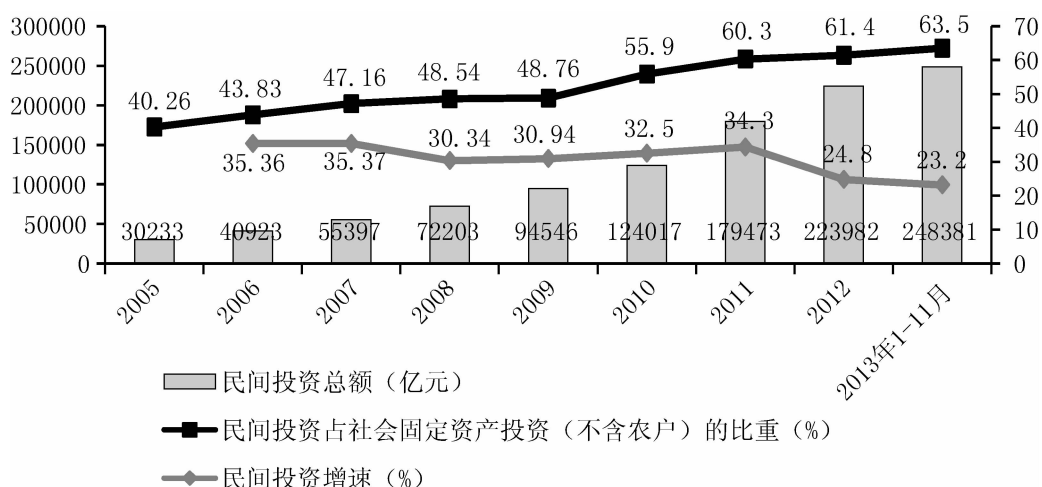


图 1 2005 年 -2013 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总量、比重与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2005 年-2009 年数据根据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计算，其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说明：统计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内资中集体、股份合作、集体联营、其他联营、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个体户、个人合伙、其他内资企业类型加总得出。

（二）民间经济在 22 个鼓励性行业投资明显增强

长期以来，民间资本在铁路、道路、航空、电信、教育、卫生等重点垄断性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的投资比重一直较低。但随着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36 条”、“新 36 条”和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实施，民间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在占比较低的重点行业上投资比重和增速都有了显著提升，民间投资的行业分布更趋均衡。

从表 1 可以看出，2005 年-2011 年 7 年间，在统计的 22 个重点行业中，民间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低于 20% 的个数从 17 个下降到 9 个，比重高于 20% 的行业数目逐渐

^①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晏露蓉、黄素英）：《民间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金融研究》2006 年第 10 期。

表 1 2005 年-2011 年民间投资占 22 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布情况

比值范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I \leq 20\%$	17	14	14	14	14	13	9
$20\% < I \leq 50\%$	5	8	8	8	8	9	11
$I > 50\%$	0	0	0	0	0	0	2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表 2 2005 年-2011 年 22 个行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

行业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ΔI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36	9.57	8.61	10.81	11.69	7.11	5.21	-27.65
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	29.15	28.50	27.94	26.52	25.70	28.34	30.04	5.86
燃气的生产供应业	23.90	34.17	38.54	38.37	41.17	43.75	52.39	25.48
水的生产供应业	16.22	21.33	22.49	22.85	19.82	23.52	28.73	23.4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63	12.39	13.97	14.89	15.20	15.99	21.45	37.45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	22.30	26.56	27.33	19.57	10.77	10.06	8.72	-13.22
铁路运输业	3.64	5.50	3.41	3.21	3.01	4.57	5.34	13.08
道路运输业	9.88	11.43	11.00	10.18	8.74	8.72	11.68	45.45
水上运输业	21.27	20.43	29.76	24.92	28.20	27.19	30.87	12.49
航空运输业	6.75	10.95	10.35	10.88	16.45	8.87	16.79	83.73
邮政业	7.44	21.98	10.76	31.24	22.91	26.62	51.74	164.07
电信业	5.53	6.36	4.92	4.73	11.51	6.02	11.26	72.94
银行业	13.86	20.43	18.35	19.73	19.44	16.50	19.68	22.33
证券业	5.29	16.66	28.86	19.43	18.02	26.67	33.68	24.73
保险业	11.45	11.94	16.16	23.91	21.30	17.95	39.43	204.83
教育业	12.68	14.48	15.53	17.43	16.52	16.09	19.33	21.03
医疗卫生业	12.36	14.10	14.25	16.32	17.44	15.51	18.39	21.00
社会福利业	22.39	28.34	31.69	33.11	24.20	31.73	41.23	39.68
新闻出版业	6.13	7.01	25.39	22.86	22.16	16.41	31.38	146.18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9.51	10.69	10.60	11.58	18.99	32.35	27.86	-11.16
文化艺术业	11.26	18.19	15.52	18.38	23.41	32.39	40.59	34.20
体育	12.51	9.48	11.84	12.27	13.11	7.97	20.10	140.29

说明： ΔI 为 2011 年各行业民间投资增速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

增加，2011 年当年有两个行业民间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了 50%，说明民间投资占重点行业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了显著提升，民间资本在这些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体上得到改善。

从表 2 可以看出，重点行业的民间投资所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普遍增长很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平均增速。2013 年 1-11 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民间投资总额达到 239 亿元，同比增长 55.2%，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民间投资总额分别达到 5307 亿元、1279 亿元、80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5%、28.0%、38.0%。^①

（三）民间投资在传统优势产业地位突出

选取 2005 年民间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60% 的 10 个行业，2005 年-2011 年，民间投资在传统优势行业中所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继续增加，在行业中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表 3）。2013 年上半年，非金属矿采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 94.5%、89.6%、87.1%。

表 3 2005 年-2011 年民间资本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行业的投资比重（%）

行业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非金属矿采选业	72.00	75.24	79.33	82.96	84.71	86.10	87.16
家具制造业	60.24	70.35	77.10	80.76	86.23	86.02	86.38
金属制品业	64.53	70.42	74.73	75.97	80.71	83.33	84.70
农副产品加工业	66.92	71.51	75.20	77.14	79.77	81.42	83.27
纺织业	63.60	69.10	71.70	69.78	76.16	78.98	82.8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1.25	70.86	72.03	72.55	75.01	77.53	81.94
通用设备制品业	61.35	68.80	73.16	74.43	75.76	79.07	81.30
零售业	69.15	72.86	73.34	72.47	77.05	76.06	79.06
专用设备制造业	57.62	64.51	68.27	70.26	71.71	71.74	75.2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4.09	62.79	67.01	65.07	70.10	71.25	73.20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①国家统计局：《2013 年 1-11 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12/t20131210_478166.html，2013-12-10。

三、九大行业民间投资比重过低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国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的 22 个重点行业中，2011 年民间投资占行业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低于 20% 的有 9 个，分别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城市公共交通业、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电信业、银行业、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铁路运输业和城市公共交通业民间投资占比更是显著低于 10%。

（一）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民间投资有待提升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是民间投资最难进入的行业。2005 年民间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10.36%，2011 年下降到 5.21%，占比不升反降。2008 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且 2011 年和 2012 年呈现负增长态势。能源是经济运行的动力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民间资本在增加紧缺品种生产、做好产供销衔接、确保市场供应方面应该大有可为，但由于石油天然气开采需要的投资规模较大，而且目前调动民营企业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针对民营企业油气产品市场开拓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没有真正落地，因此，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面临很大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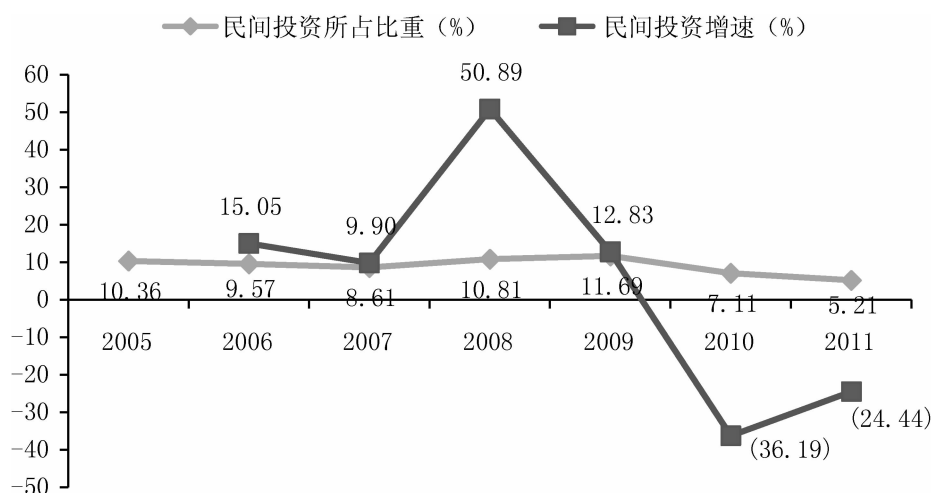


图 2 2005 年-2011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民间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二）铁路运输业民间投资长期低下

2011 年，铁路运输业民间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5.34%，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比重大致相当。7 年间民间投资占比稳定在非常低的水平，投资增速波动较大。铁路建设具有投资数额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周期长、利润低、单条线路的收益回报难以独立核算、铁路运价机制和运行调度难以自主、缺少产品控制权、线路区域间交叉补

贴等特点，长期以政府投资为主，而且，最近几年铁路市场化改革在几次大型事故之后呈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现状已难适应当前铁路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铁道部政企职能分开改革的深入以及铁路资产的重组，未来民间投资进入铁路运输业的障碍应逐渐被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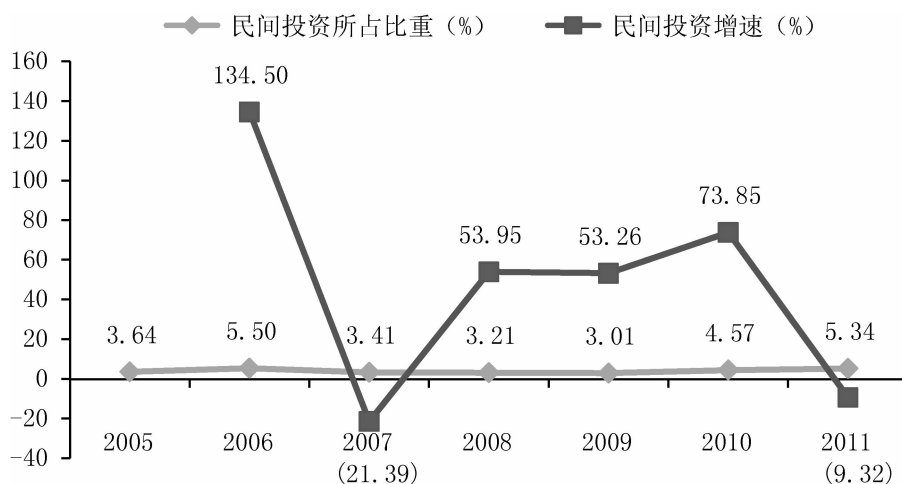


图3 2005年-2011年铁路运输业民间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201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三）银行业民间投资需上一层楼

2011年，银行业民间资本投资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05年的13.86%增长到19.68%。截至2012年底，民间资本占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股本的45%，而城市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则超过半数，达到54%。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超过90%。其中，城镇银行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为73.3%。全国262家非银行机构中，民间资本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33家，包括10家信托公司、19家财务公司、3家金融租赁公司和1家汽车金融公司。^①

目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还面临着诸多障碍，如“门槛”较高，主要体现在前置审批上往往需要较多时间、持股比例受到限制，《商业银行法》对银行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明确限制性陈述，一些地方政府也规定小贷公司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出资不得超过一定比例或金额；行政色彩浓厚，审批透明度低；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目前政策规定的民资能进入的金融领域相对狭窄，仅集中在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小型地方性银行，盈利模式较为单一等。

^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报》，<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18492CCBDD04435A8BFAB3FF6F2CA51C.html>，2013-0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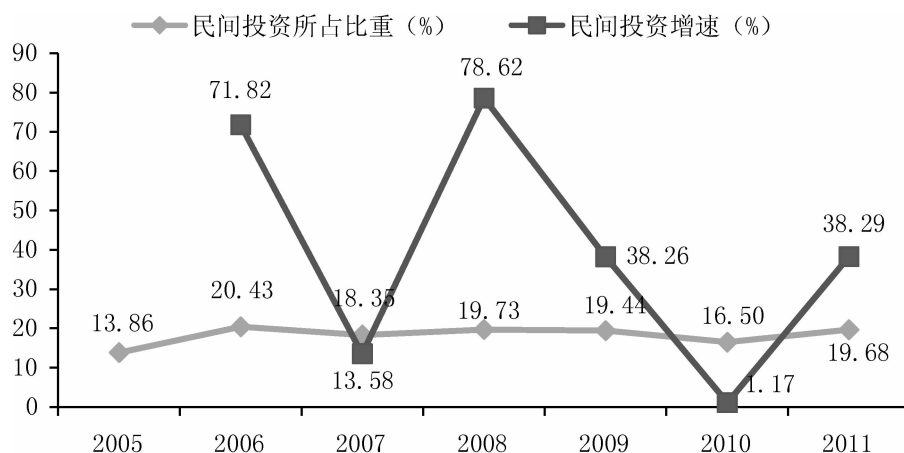


图 4 2005 年-2011 年银行业民间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四、下一步引导民间投资的主攻方向

（一）分担民生建设任务是民间投资当务之急

“十二五”期间，国家对民生建设事业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如表 4 所示，“十二五”规划在保障房建设、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文体事业上，都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要求，比如，要建设 3600 万套保障性住房，估算约需 4.7 万亿元投资；建设 927000 张新床位，在硬件方面至少需要投入 1800 多亿元；预计在学前教育领域需投入 2656 亿元，义务教育阶段硬件方面需投入 1.5 万亿元；社会养老方面约需投入资金 2040 亿元，建设更多养老床位。政府筹资能力吃紧，因此，必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共同建设。

（二）扩大市政公用设施民间投资是中期的主攻方向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更新与完善将有效降低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门槛。在城镇化过程中，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城镇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预计可达上万亿元，市政基础设施中基本道路、桥梁等建设完善之后，城市公共交通、城市污水处理、燃气管道铺设、城市绿化、垃圾处理、公园建设等一系列公共设施的投资将继续加大。据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约 1000 亿元。^①

而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银行涉融资平台公司贷款获得困难，以及债务到期的几重难关。对民间资本开放基础建设、市政工程领域，可以有效缓解地

^①冯兴弟：《人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 2012 年。

表 4 社会事业领域的民间投资方向

行业领域	“十二五”规划目标与 投资需求	现行投资体制	未来投资模式
保障性住房	完成 36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约需 4.7 万亿元	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企业建成后,由政府回购,企业一次性收回成本;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代建总承包建设模式;政府出让土地,房地产企业自主经营开发	中央及地方政府出资、土地划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建设
医疗事业	城镇按照每万人拥有 59 张床位计算,还需要 927000 张新床位,至少需要投入 1800 多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达 81.61%,民间投资占比为 18.39%	大力引进金融资本、外商资本、私营资本等各类投融资主体,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投融资主体结构
教育和社会培训	幼儿园在园人数预计将新增加 1342 万人,预计将在学前教育需投入 2656 亿元,义务教育均等化在硬件方面投入 1.5 万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达 80.67%,民间投资占比为 19.33%	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元化渠道筹措的教育经费新体制,鼓励民间自主投资
社会福利事业	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 340 余万张,估算约需 2040 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达 58.77%,民间投资占比为 41.23%	政府投融资主体和其他投融资主体相协调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	我国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4.5%、0.7%,预计总投资将达 3.5 万亿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达 53.49%,民间投资占比为 46.51%	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建设-运营-移交 (BOT)、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多种投资方式

资料来源:各行业“十二五”规划和据《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计算得出。

方政府在资金上的压力,降低地方政府依靠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扩张财力的压力,使民间资本分担土地金融的风险。民间资本的引入也将为地方投资建设带来新的活力,强化竞争机制,提升投资效率。

(三) 扩大铁路、电信、石油等自然垄断行业投资是长期的主攻方向

铁路、电信、石油天然气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投资呈现出显著的投资规模大、进入门槛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而且垄断性行业普遍存在着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

表 5 市政公用设施领域的民间投资方向

行业领域	“十二五”规划目标与投资需求	现行投资体制	未来投资模式
城镇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达到 3300 公里,快速公交系统(BRT)运营里程达到 3000 公里, 预计投资达到 5000 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高达 94.7%,民间投资占比仅为 5.3%	以政府投资为主,更多地引入民间资本,创新公私合作运营模式
城镇供气系统建设	城镇燃气供气总量约 1782 亿立方米,新建城镇燃气管道约 25 万公里,城镇燃气管道总长度达到 60 万公里,城市的燃气普及率达到 94%以上,预计投资 1000 亿元	2011 年民间投资占比 52.39%	通过转制、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城镇燃气建设与运营
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	进行水厂改造、管网改造、新建水厂、新建管网等建设,设市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 95%、县城达到 85%、预计总投资 4100 亿元	2011 年民间投资占比 28.73%,国有及国有控股比例高达71.27%	更多借助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形式,吸纳社会资本置换存量资金,盘活固定资产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全国形成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87.1 万吨/日,基本形成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相匹配的无害化处理能力规模,总投资约 2636 亿元	2011 年环境管理业民间投资占比仅为 25.79%,国有及国有控股比例高达74.21%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垃圾处理链条,给予企业一定的回收再利用资源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政策,完善资源处理产业链

资料来源：各行业“十二五”规划和据《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计算得出。

企业经营自主权不完整、政府部门资源分配的行政干预色彩过重等非市场化的特点,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能站稳并能自主退出,非一日之功,因此,垄断性行业将是民间资本长期的主攻方向。

五、现阶段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

民间投资在某些行业占比过低的状况,反映出目前束缚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障碍还很多,归结起来是民间资本“进不去”“站不稳”“出不来”的问题最突出,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最严重。

表 6 垄断行业的民间投资方向

行业领域	“十二五”规划目标与 投资需求	现行投资体制	未来投资模式
铁路	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煤运通道等固定资产投资 2.8 万亿元,年均投资 5000 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高达 94.66%,民间投资占比仅为 5.34%	逐步向扩大引纳民营资金和吸收外资为重要投资主体的市场融资新格局转变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新建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需投资 800 亿元,油气管线建设还需投资约 3500 亿元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高达 94.79%,民间投资占比仅为 5.21%	民间资本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民用航空	新建民用机场 45 个,总数 230 个,新增飞机 1900 多架,投资需求超 1.5 万亿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高达 83.21%,民间投资占比为 16.79%	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经营航空器和运输服务
电信业	初步建成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 2 万亿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高达 88.74%,民间投资占比为 11.26%	形成电信业内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不同所有制投资者的公平竞争
金融业	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 5%左右,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 15%以上	2011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为 67.39%,民间投资占比为 32.61%	形成国有、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业

资料来源：各行业“十二五”规划和据《201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计算得出。

（一）“进不去”：市场准入存在阻碍

尽管“新 36 条”提出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行业，但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着投资准入门槛不公平、投资准入信息不透明和投资准入程序不规范的现象。

首先，为维护行业稳定，避免竞争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一些政府部门往往对新开办的民营金融机构、交通机构、电信机构、油气机构、医疗教育机构前置审批实行严格的“牌照管制”。主要原因是审批部门害怕民营金融机构等数量过多，会导致行业竞争影响治下金融等机构的稳定经营，进而影响部门政绩。^①此外，行业投资信息平台建设欠缺，

^①陈毅聪：《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透明天花板”》，《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3 月 9 日。

在投资建设中未能根据国家、地区产业政策和发展建设规划，推出面向民间资本的建设项目进入招商目录，使投资准入的项目信息目录不透明，民间资本的投资检测分析与信息引导仍然不到位。^① 再次，在程序准入中，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多、环节繁杂、时限长，行政服务效率低，民间资本面对复杂的法律条款和各层人事关系，为获取程序准入方面的信息往往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这些都严重制约和吓阻了民间资本的流入，阻碍了民间投资的效率。

表 7 市场准入的三大制度障碍与影响

制度	民间资本进入的障碍	对民营经济市场准入影响
投资准入门槛公平	金融等行业民营投资难以拿到经营许可证即牌照	新增民营机构数量少，不能适应垄断行业发展资本形成的需要
投资准入标准与信息透明	没有推出针对民营的建设项目招商	民间资本拿不到项目，进入产业无事干
投资准入程序规范	审批条件模糊，审批程序繁琐	为获取程序准入方面的信息，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

（二）“站不稳”：投资经营环境欠佳

即使民间资本成功进入了某个行业，但要想立定站稳、发展壮大也不容易，民间资本普遍面临着欠佳的发展环境。首先，体现为民间资本往往难以获得控股权。垄断行业中企业的控股权一般牢牢地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民间资本参与水电站、火电站、公路、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一般只允许参股，不允许独资或控股，使民间资本丧失了投资决策的话语权，直接导致民间资本缺乏进入的兴趣与热情。其次，民间资本的经营权往往不完整。在垄断性行业中，民间资本往往只能作为参与投资建设的财务投资者，在最关键的产品定价、结算和运营环节，民间投资都被排斥在外。再次，民间资本往往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市场竞争中，民间资本往往在融资渠道、项目审批、物资供应、财税补贴等优惠政策等方面处在与国有企业不平等的市场地位，资源严重向垄断国有企业倾斜，民间投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影响投资效益。比如，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对外发行股份融资往往只能依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渠道过于单一，很多企业争取不到机会。^②

① 苏颢、张诗艺、李梅娟：《我国现阶段民间投资发展研究——投资现状、主要障碍及对策建议》，《商业经济》2013 年第 2 期。

② 李国义：《深化民间投资体制改革》，《中国金融》2013 年第 2 期。

表 8 投资经营的四大制度障碍与影响

制度	民间资本经营制度障碍	对民营经济投资经营影响
投资控股	只能参股,不允许控股	民营资本没有自主投资决策权,对投资项目丧失兴趣
投资经营权独立	只能投资,不能拥有运营、定价、销售、结算等环节权益	民营资本没有自主经营权,对投资风险无法把控
融资渠道畅通	民企很难从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民营资本没有融资渠道,对投资来源无法把控
投资待遇平等	在竞标、融资、建设、运营、价格补贴、财税等方面待遇不平等	民营资本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盈利模式,信心不足

（三）“出不来”：投资权益缺乏保护

“谁投资、谁经营、谁占有、谁支配、谁受益”，这一权责利“五统一”的投资原则仍然难以得到很好地贯彻，使得民营投资权益保护存在三大制度缺陷。

首先，投资财产权益保护基础不公。民间资本最关心的是辛苦投资、合法经营积累的财产能否保持完整性与安全性，而不会因为各种人为因素被“剥夺”。国家有关民间资本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相当零散、时效性不明确、可操作性差，对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产权、债务纠纷等问题往往难以“一碗水端平”，行政权力容易超越法律制度，利益驱动下政府信用堪忧。其次，投资经营权益保护体制不稳。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规则与秩序是否稳定，直接决定了民间资本生存环境的质量。政府与民间资本签订的各项特许经营合同、使用权合同、承包租赁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能任由单方面随意更改和废除，企业运营过程中需要的融资、人力、财税优惠政策很多时候也不能对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一视同仁，不公平的产权、债权交易使民间资本投资经营权益保护体制十分脆弱。再次，投资财产权益保护效果不佳。民间资本投资经营的收益实现通道不能因为各种人为因素而被“堵塞”。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公用事业投资，水、电等公用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没有高度市场化，民营经济投资缺乏动力，其投资收益往往与政府形成利益交易，通过房地产等投资获取收益，“堤内损失堤外补”。

六、下一步推进民间投资的主要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5 年-2013 年我国民间投资总量、比重和增速数据，分析了近年来特别

表 9 投资权益保护的三大制度障碍与影响

制度	民间资本投资权益无法保障	对民营经济投资权益的影响
投资收益权益政策优惠性	保护投资收益的法制与政策不优惠,难以避免投资收益的亏损	民营经济收益权得不到保护
投资经营权益环境稳定性	维护投资经营合同的法制与政策不稳,难以避免投资经营秩序的混乱	民营经济经营权益得不到保护,只好寻求投资粗放短期行为,不搞精耕细作与创新驱动
投资财产权益保护公平性	投资财产保护法制与行政环境欠公平,难以避免合法财产完整性与安全性	民营经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转产,把现金带走

是 2010 年“新 36 条”实施以来民间资本的发展概况；研究发现，民间投资总量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增长，民间资本对我国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加大，民间资本在鼓励进入的 22 个重点垄断性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的“投资短板”也得到一定程度弥补，民间投资趋向均衡产业结构的速度较快。但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铁路运输业和城市公共交通业等行业的民间投资所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仍然显著偏低。为此，民间投资应结合“十二五”时期国家规划目标，将分担民生建设任务、扩大市政公用设施和重点自然垄断性产业作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

本文建议，发展民间资本应有更多的主体意识，打通民间资本与政府、国有企业的联系，内引外联，争取制度空间内最大的改革红利。

应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化建设的门槛，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弥补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据国家开发银行估算，未来 3 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 25 万亿元，平均每年需要 8 万多亿元投入，约占全年全国近 40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0%。在中央明确明年要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情况下，土地出让收入将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新增债务风险约束得以强化，完全依靠政府举债筹集城镇化建设资金将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应允许民间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补贴等方式，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和运营中来，在建设项目实施前期、中期和后期给予民间资本全套完整的政策红利，明确民间资本投资全程中政府的责任，注重发挥民间资本在市场化多渠道融资方面的优势特点，建立公平、稳定、有保证的民间资本投资收益保护机制，使民间资本的做大做强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

要探索对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引入民间资本，使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存，给予民间资本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以激活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鼓励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有效地活跃资本市场，解决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应制定石油、铁路等垄断行业面向民间投资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可以从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比较完善的业务部分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持股，再循序渐进，通过制定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促进民间资本在垄断行业的比重逐步提高。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政府职能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针对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出台具体、公平、透明的实施细则，有效落实政策红利，并强化对各地区政府服务民营经济的督导考核，减少民间资本投资中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并清理相关的历史法规，确保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健全中小型民营企业服务体系，将一些组织管理协调的职能下放到民营企业协会、商会，搭建系统的服务平台，延伸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企业的触角。在加强服务的同时，要改革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以往交叉管理和空白管理的混乱局面，重视对中小企业投资经营的引导，通过设立产业目录等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国民经济发展薄弱、有效促进就业、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行业，通过引导民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加快中小型民营企业“孵化器”的载体建设、制定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等方式，有效提升民间资本的运作效率，促使民间资本更好地发挥促进全社会技术创新的功能。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产业发展 ·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重视的几个关系*

姜长云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仍需科学处理五种关系：一是坚持合作社原则的规范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二是坚持农民自愿与加强示范引导的关系，三是发展合作社与培育合作社企业家的关系，四是合作社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五是专业合作社与综合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关系。

关键词：合作社 农民 农业现代化 专业合作社

作者简介：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旨在解决单个农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难以经济合理地解决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既能保持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又能克服农业家庭经营局限的产业组织”，“农业中普遍存在合作组织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经营在农业的普遍性和家庭经营在竞争市场中的局限性”（黄祖辉，2009）。张晓山、苑鹏（2009）分析了发展

* 本文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2-2013 年度两年期基金课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课题指导为聂振邦副理事长，课题组长为胡恒洋司长。感谢课题指导、课题组长和课题组成员提出的宝贵意见。

合作社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并将经济合理性概括为四个方面：（1）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规模收益；（2）让农民获取或分享初级产品进入加工销售领域后的增值利润；（3）减少不确定性和规避市场风险；（4）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形成市场竞争中一支合法的抗衡力量。苑鹏（2009）强调，“广大弱势小农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改善市场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组成了合作社。与小农分散独自进入市场相比，合作社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来看，发展农民合作社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都是值得肯定的。如许多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动了农户从事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集约化经营，为联结农户和市场提供了桥梁和纽带，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载体，达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群众”的效果。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很快。到2013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已达95万家，实有成员722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7.8%。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规范化、广域化和产业链一体化的趋势，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合作社的联合和示范活动积极展开。在许多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是发展区域农业主导产业的重要带动力量，向特色农业、高端品牌农业甚至民间工艺、休闲旅游农业的延伸态势迅速形成。在重点发展行业合作、产品合作的同时，土地、农资供应等要素合作和农机、植保、统防统治等作业合作日益成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新亮点。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社开始将服务内容由产中服务向产前、产后延伸，将包装、储藏、加工、流通和品牌培育服务作为服务供给的新增长点。合作社在内部开展信用合作的已近2万家，联合社已达5600多家，联合会2554家。^①但就当前而言，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社对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必须科学处理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坚持合作社原则的规范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农民合作社功能作用的发挥，是以坚持其基本原则为基础的。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修订和重新确立的合作社基本原则包括七项内容：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民主控制，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发展。合作社是惠顾者——社员的企业（张晓山、苑鹏，2009）。但合作社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成员民主控制，盈余按交易额返还，资本报酬有限（潘劲，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的原则概括为：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以服

^①佚名：《2013年合作社年终盘点：合作·共赢·发展》，《农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其作用和前景的怀疑情绪也在不断滋长。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前合作社发展中的教训，导致对合作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客观地说，近年来这种原因的影响在总体上已明显减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经历一个随着其自身的成长及其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而逐步增强其功能作用的过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对于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态度，表现出了较大程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急功近利色彩，甚至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惜牺牲合作社本应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合作社功能的异化。至于形形色色的“假合作社”、“空壳”合作社，更是合作社异化的极端结果。由此很自然地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上过度灵活，由此形成的异化了的合作社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合作社的功能作用？能否继续成为联结农户和市场的桥梁？能否继续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织载体？

有些地方为了“进一步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作用，不惜下任务、定指标，甚至将合作社的发展数量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按照“复制粘贴”模式，甚至虚报和变相造假的方式，“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导致合作社名目繁多，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相当一部分合作社体现不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挂羊头，卖狗肉”，导致合作社的实际功能与其理论作用相距甚远。这说明合作社的不规范和“大跃进”式发展，以及对合作社原则的“灵活性阉割”，往往建立在损害合作社功能作用的代价之上。最近几年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作用的质疑明显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作社发展“规范性不足、灵活性有余”，导致其数量增加过猛，进而合作社在总体上的功能作用受到较大程度的“稀释”。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深刻检讨对于合作社原则“灵活性取舍”的传统思路，深刻反思过分追求数量扩张的传统模式，将促进其转型升级和提高其发展质量，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升发展合作社、规范发展合作社的需求日趋凸显。许多地方、许多合作社规范发展、成功发展的案例，已经对此提供了很好的阐释。因此，在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问题上，科学处理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已经日趋迫切。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引导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初期，对合作社发展的理论认识和经验储备不足，往往更容易导致实践中的合作社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的规范性不足。在此阶段，在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问题上适当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也有利于积蓄合作社发展的势能，加快形成合作社发展中的“群体规模效应”。但是，随着合作社总体规模和成功合作社示范影响的扩大，规范发展合作社的条件日趋成熟，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已经日趋迫切。在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问题上，如果继续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往往要以透支合作社的发展未来为代价，从长期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农民合作社越发展，越要重视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的规范性，越要重视提高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加强合作社的能力建设。

二、坚持农民自愿与加强示范引导的关系

农民合作社要以农民为合作的主体，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真正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这是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合作社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保证合作社资产的控制权、所有权和受益权主要由社员拥有，这是合作社与企业组织的主要区别”；甚至“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以专业农户为社员的主体，使合作社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真正掌握在专业农户手中”（张晓山，2012）。但在我国许多农民合作社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农民，而是企业、专业大户或地方政府，许多农民连自己是否是合作社的社员都不知道，更不要奢谈对合作社事务的参与，或者虽是合作社“有名无实”的社员，却纯粹是为了帮助作为乡邻的专业大户增加套取国家补贴的“筹码”，抑或是为帮助基层政府或村委会形成发展合作社的“政绩”。这样的合作社在带动农民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且缺乏可持续性，更难以通过农民对合作社的参与，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合作态度和企业精神。

但是，在许多地方，农民合作社到底是什么，到底能够做什么，加入合作社对农民到底是“货真价实”的利好，还是“坑蒙拐骗”的游戏？客观上需要一个农民和合作社互相了解、让利益相关者深化认识的过程。合作社功能作用的发挥，与其自身的成长和成熟也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鉴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加强对合作社发展的示范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一个重要目的是引导合作社的规范发展，提高其发展质量，发挥典型经验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农民合作社越发展，其经济影响和利益关系越复杂，加强示范引导就越重要。当然，在示范引导的过程中，也要防止“为树典型而树典型”，导致示范合作社缺乏让其他合作社或农民（潜在的合作社成员）学习、借鉴的价值。

三、发展合作社与培育合作社企业家的关系

大海航行靠舵手。合作社要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乘风破浪，也要靠素质超群的合作社企业家。大量调研表明，一个合作社的发展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熟悉市场、善于经营、群众威望高、奉献精神强，甚至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带头人——实际上就是合作社企业家。甚至“没有合作社企业家就很难产生合作社”（张晓山，2012）。许多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面临融资难、产品销售难、品牌建立难，甚至合作社发展难的问题，但如拥有了具备上述才能的带头人，这些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在支持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要把培育合作社企业家队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发育的环境放在优先地位。

目前，在我国许多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能人或专业大户带动型较多，^①与合作社企业家在合作社发展中的重要性有密切关系。作为专业化农户联合的产物，合作社的发展如果面对的是高度同质性的农户群体，农户之间虽有成立合作社的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也很容易导致合作社“胎死腹中”，难以形成促成合作社“破壳而生”的“临界最小努力”。如果合作社的发展面对的是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农户在投资、经营、技术或组织能力方面较具优势，可以担当合作社发展的带头人，那么合作社的发展就很容易蓄积起“脱颖而出”的动能。在许多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出现能人主导和大股东控股的现象，可以看作是对这些合作社发展带头人的“选择性激励”。根据曼瑟尔·奥尔森（1996）的分析，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有些地方在合作社发展的初期，大股东控股较为普遍，甚至股金分红比例稍高，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合作社企业家在合作社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与合作社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资本化也有密切关系。从国内外经验看，合作社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时，往往出现合作社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分离的倾向。如果合作社的少数大股东在合作社经营中

^①将安徽和县和河南郑州市两个不同时点的资料进行比较，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到 2006 年 3 月，和县已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71 个，其中由农民牵头兴办的 42 个，占 59.2%；由企业、农技组织、科协和其他方面兴办的分别为 4 个、22 个、1 个和 2 个，分别占 5.6%、31.0%、1.4%和 2.8%。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成员 8451 个，占农户总数的 6.1%。到 2011 年底，在郑州全市 140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由农村种养大户、经纪人等农村能人领办的 1109 家，村组干部领办的 206 家，企业领办的 58 家，基层农技服务组织领办的 8 家，其他方面领办的 25 家，分别占 78.9%、14.6%、4.1%、0.6%和 1.8%。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12.3 万个，占农户总数的 11%。

确实发挥了合作社企业家的作用，可以将其通过股金分红得到的部分收入，看作合作社企业家作为合作社成员“兼职”职业化经理人的报酬。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社的初期发展中，大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往往起着主导作用。甚至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在创立初期，并非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农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潘劲，2011）。可见，对于合作社发展初期的能人主导或大股东控股，要看到其合理性，注意引导其扬长避短，但不要一味否定，导致“将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个“度”。当合作社的股金分红超过一定界限，甚至形成以资本报酬为主、按交易额返还为辅，或按交易额返还可有可无的盈余分配格局时，对合作社基本原则的“阉割”，很容易形成对合作社的本质“伤害”，导致诸如“假合作社、真股份制企业”等问题。尽管这样的“假合作社”在带动农户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仍然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并且很难说这种“假合作社”的效果就一定比真合作社差，但其作用机理和实际影响毕竟不同于真正的合作社。此外，有些合作社虽然在发展初期形成能人主导或大股东控制型格局，但如居于主导地位的能人或大股东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抑或通过完善合作社外部监管机制、优化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和政策引导、完善合作社内部规章制度等，逐步将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导入民主控制、盈余按交易额返还、资本报酬有限的方向，则此类合作社的发展很容易进入规范化的轨道，应是合作社鼓励发展的方向之一。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在规范发展和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的过程中，要将鼓励合作社企业家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完善合作社外部监管机制、鼓励合作社规范完善内部规章制度等，放在重要地位。

在许多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作为带头人的合作社企业家作用独特且不可或缺，成为合作社“因人而成”的典型。但由此也容易导致该合作社把特定带头人的作用绝对化，把合作社的发展过多地“绑定”在这个特定带头人身上。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农产品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如果这个特定带头人缺乏“与时俱进”的学习提升，昨日“因人而成”、“繁花似锦”般的合作社，很可能成为明天“因人而败”的“残花败柳”。由此可见，在合作社发展“因人而成”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合作社“因人而败”的风险，鼓励和督促合作社企业家加强学习提升，完善企业家选择和激励机制。

四、合作社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国内外运作成功的合作社，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外部支持发展方面，往往都具有各富特色的经验。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明显加快，覆盖面迅速扩大，甚至出现每月增加1万多个的“佳绩”。这与地方政府、涉农企业，甚至专业大户、

普通农户、农产品或农资市场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需求有密切关系。如许多地方支持合作社承担涉农项目，许多涉农企业主动对接合作社建设农产品原料基地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特定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演变和组织创新，是合作社利益相关者利益矛盾妥协、折中的产物。制度演变和组织创新的具体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分割，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民有时甚至被“挤”到“配角”地位。其中，地方政府、涉农企业或农村能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强势程度及社会责任水平，对于合作社发展的速率和路径选择，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地方政府、涉农企业或农村能人对于合作社制度演变和组织创新的影响，应该以不妨碍合作社成员的民主控制、经济参与和自治、独立为基础。否则，合作社运行中就很容易出现被外部利益相关者“鸠占雀巢”的问题，导致合作社行为的异化和“假、冒、伪、劣”问题，侵蚀合作社功能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在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出现“质疑声涨，功能注水”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由“主角”变“配角”，过度依赖外部支持，导致合作社丧失独立自治能力。因此，在发展农民合作社的过程中，也要审慎处理“独立自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努力做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五、专业合作社与综合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关系

从国内外实践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有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两条道路。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及政府的政策支持，都将重点放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上。2007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界定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在此之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部分地区的发展已经有声有色，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呈现若干新的趋势而已。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总体上顺应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农业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体现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此往往妨碍合作社的独立自治。相对于综合合作社，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专业合作社更容易成为现实选择，因为专业合作社更容易基于产业发展或服务需求的专业化和专业化服务需求的规模化，产生强劲的需求诱致力；专业合作社基于服务供给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分

工协作的效率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在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应该如何克服其局限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能否、怎样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功能升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否只有专业合作社一条路？

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其自身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的局限性迅速凸显，由此导致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和合作日益成为趋势，进而发展综合合作社的条件逐步形成和累积起来。但此时的综合合作社，实际上是依托专业合作社，是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与“原生”的综合合作社和我国的社区合作组织，都有很大的本质差异。多数“原生”的综合合作社，缺乏规模化、专业化、集中化的服务需求，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确实存在可谓是综合合作社的社区合作组织，但堪称综合合作社的社区合作组织实际上只是少数，大多数社区合作组织谈不上是真正的（综合）合作社。因为它们很少具备合作社的本质特征，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名存实亡的。可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形成综合合作社，可望成为我国发展农民综合合作社的主要途径。在政策支持上，应该明确依托专业合作社通过引导其联合和合作，发展综合合作社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理论、实践与政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 潘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中国农村观察》2011 年第 6 期。
3. 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4. 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的探析——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理论、实践与政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5. 张晓山、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6. 张晓山：《将合作社发展融入城乡统筹发展大格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站，2012 年 11 月 23 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企业发展 ·

深化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研究

宋 群

摘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我国进入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调整提出的更高要求。本研究报告力图在总结新世纪以来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 布局 结构调整 研究

作者简介：宋 群，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取得的主要成效

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从新世纪初开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布局 and 战略性结构调整。作为国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企业，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其布局 and 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国有资本分布领域进一步收缩，实力增强

一是中央企业数量减少。2003 年-2012 年，中央企业数量从 196 家下降到 116 家，有 79 家中央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被重组整合，平均每年减少 10 家左右，减少率 40%。

二是国有资本初步实现有进有退。目前，中央企业分布在军工、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 7 个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资本占全部央企的 80%，而一般生产加工行业的国有资产比重下降至 12%，初步实现了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实力有所增强。

（二）公司制、混合制、股份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公司制、混合制得到发展，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比例为 88.84%，较 2005 年底增加了 26.32 个百分点。同时，引入的民间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中央企业公司制企业户数比例为 45.59%，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规范董事会试点企业扩大到 51 家，试点面达 40% 以上。

二是推进中央企业股份制改制上市。目前，石油石化、航空、电信、建材、房地产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基本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建筑、机械制造业的大部分中央企业实现了整体上市。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占用全部中央企业 55% 的资产，创造了近 80% 的利润，表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良好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三）企业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一是企业主业集中度较高。中央企业按照占有国有资本数额计算，主业集中度为 86% 以上，其中国有资本占二级、三级和四级主业子企业的比重都在 70% 以上。国有资本基本集中在四级以上的中央企业。

二是企业之间整合重组初见成效。通过科研院所与相关优势产业集团重组，推动了产研结合，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通过海外窗口公司与产业集团、设计单位与施工企业的重组，提升了中央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工程总承包能力和总体竞争能力。中央企业之间业务链与产业链的整合，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

2012 年，在进入世界 500 强的 79 家中国企业中，有 65 家国有企业，其中有 42 家是中央企业，中央企业占入围中国企业的 53.2%，占我国国有企业的 64.6%，入围的中央企业是 2003 年 6 家的 7.3 倍，占 117 家中央企业的 35.9%。也就是说，有近 40% 的中央企业已经跨入国际企业行列，表明中央企业的规模化经营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五）对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一是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前，中央企业分布在第一产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 0.2%；第二产业占 64.5%；第三产业占 35.3%。中央企业的产业

结构与国家产业结构基本吻合，表明其在国家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二是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过去的五年，中央企业科技投入年均增幅达到 28.5%，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和利润增幅，已经成为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

三是较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100%的中央企业都有专门处理环境和能耗问题的部门，并建立了完备的制度和措施，90%的企业降低能耗水平。同时，中央企业积极吸纳就业，广泛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加大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工作的投入，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行业分布数量仍过多，分布质量效益较差

一是中央企业的行业分布数量仍过多。仍有近 20%的中央企业分布在商贸、农林牧渔、住宿餐饮、旅游以及纺织、轻工、食品、森工等一般竞争性行业当中，其中 9 成以上企业为小型企业。表明国有资本分布面仍然过宽，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中央企业数量仍然过多。

二是中央企业的行业分布质量效益仍较差。目前，中央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产能过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不足并存。如有 2 亿吨过剩粗钢、约 20%的氧化铝和约 25%左右的水泥产能过剩。与此相比，对关系国家经济振兴的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资本比重低，这类企业仅占 10.62%，未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态势，说明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很弱。

三是一些行业集中度仍不高。中央企业在石化行业集中度约为 40%，而欧美均超过 100%；中央企业在汽车行业集中度不足 20%，而美国则超过了 90%；中央企业在钢铁行业集中度不足 15%，而欧盟则达到近 40%。这表明中央企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与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较大。

（二）中央企业资源配置仍显“大而全”、“小而散”格局

根据国外跨国公司的发展经验，专业化经营公司一般占 80%，多元化经营公司占 20%，而我国的中央企业（约占 60%）几乎都是所谓的“多元化”经营，而且很多企业业务的相关性很差。绝大多数中央企业管理层级依然较多，导致信息传递缓慢、失真，对市场反应迟缓，从而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竞争力。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相对较低

目前，中央企业引入民间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仍偏低，如电力、石油天然气、电

信和军工等行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按户数占比最高不超过 40%；吸收民间、外商资本等非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30%。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层级看，主要集中在四级以下小企业，其占比达到了 80%以上。

（四）中央企业仍缺乏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目前，中央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只在一些低端或中低端的产品和产业上赢得了国际竞争力；由于缺少核心制造技术和高端产品开发能力，中央企业难以进入全球产业链高端，一些领域的关键生产设备目前仍需依赖进口。中央企业以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约有 70%的工业新产品开发技术仍然属于外源性技术。在国际知名品牌建设与营销模式创新上，中央企业同样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水平不高。

（五）中央企业之间同业竞争过度，合作整合不足

从中央企业内部的行业分布情况看，行业广泛分散于多个企业集团中，且多为集团的非主业，如商贸行业几乎涉及所有的中央企业，房地产开发行业、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及纺织行业都涉及不少于 20 家中央企业。由于一些中央企业缺乏合作意识和大局意识，导致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不仅中央企业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现象，部分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之间也存在同业竞争现象。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直接后果是不仅造成在多个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部分新兴产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研发技术等现象严重，导致资源大量浪费，严重制约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央企业整体形象与综合实力的提高。

（六）中央企业全球布局与国际化经营处于低水平

尽管中央企业通过“走出去”海外并购已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并开始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经营，但整体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与国际化经营的低水平初级阶段。如进入世界 500 强、代表我国新兴产业的三大电信企业，在经营收入与利润方面都已进入世界电信业前列，但标志全球布局水平的海外 POP 点、连接国家数量及海外子公司数量方面，我国电信企业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中央企业还缺乏对国际分工的深度参与，特别是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加快产业全球布局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中央企业的全球市场布局，以及在生产、市场、资本与研发的国际一体化方面还有较长路要走。

（七）原因分析

1. 指导思想上存在一定偏差。一是重做大、轻做强，重并购、轻整合，重扩张、轻管理等的观念与思想。中央企业布局和调整中，尽管提出的要求是做大做强中央企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央企业更多地是重做大，而轻做强；重并购的快速规模扩张，轻内部有效地整合资源与加强管理，致使许多中央企业在调整中片面追求扩规模、

增加产能，造成过多铺摊子、上项目，布局行业过宽。二是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轻国有资产质量效益。由于提出要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导致一些中央企业的布局 and 结构调整过于偏好高赢利、快赢利的行业。许多企业过多介入钢铁、化工、纺织、医药、商贸等已高度竞争化的领域，同时又忽视了国有资产整体布局的质量与效益，淡化了国有资产的本质与任务。三是缺乏国际化视野。目前的布局与调整考虑国内市场较多，较少站在国际化视野的高度来推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参与全球经济进行产业结构的深度整合。造成上述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与对中央企业的考核评价制度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如企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等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规模指标来评定企业好坏紧密相关，客观上助长了中央企业的数量规模的扩张态势。

2. 主业进入与行业退出机制不健全。在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中，由于并没有明确界定鼓励中央企业进入的产业、行业及领域目录，对主业的核定相对比较笼统，缺乏业务细分与差别化业务布局的考虑，加上缺乏强有力的考核机制与约束机制，特别是缺乏对特大型中央企业领导层的人事任免权，致使所提出的主业数量及法人管理层次的要求并没有在中央企业得到有效贯彻。同时，推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的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退出会触及多方利益，中央企业一些质量不高的资产难退出、难剥离；中央企业退出而带来的职工安置、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问题，也需要中央企业和政府付出大量成本，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央企业从经营不善或非鼓励领域退出的动力，形成了目前横向行业布局有所缩减，但纵向布局加快延长，层级增加过多的局面。此外，我国民营经济尽管发展迅速，但整体技术水平、管理能力还不够高，企业规模较小，尚不具备大规模承接中央企业退出资产的能力，客观上一定程度也延缓了中央企业退出的进程。

3. 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一是税费问题。企业加大内部整合必将推动产权、资产的流转，该过程中易形成较大的增值，根据现行税收政策，企业需因此承担巨额的税费。二是土地处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拥有的土地多为国有划拨土地，一旦内部整合中涉及土地的流转，则需先行变更土地的国有划拨性质，变性过程既要交纳土地出让金，又要交纳因评估增值产生的数额较大的土地增值税费，严重增加了企业内部调整成本。三是事业单位改制问题。目前，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国有产权管理在管理制度、机构和方式上并未完全衔接，特别是财政部对事业单位的资产处置和管理，管得过严、过细，对于同时拥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央企业内部的调整增加了难度。

三、深化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一）主要目标

未来 5 年-10 年，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开展以提高国有资本质量效益为中心、更加深入的中央企业布局 and 结构调整。到 2020 年左右，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的合理布局 and 结

构调整，形成中央企业功能定位清晰、国有资本集中、国有产权分布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合理、核心竞争力强、国际竞争力与综合实力优势明显、整体素质显著提升的新局面。

（二）重点实现五个转变

深化推进中央企业布局和调整，要紧紧围绕着国有资本进一步向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的“一个集中”，在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布局与结构的总体原则的基础上，重点实现五个方面转变，以做强做优做精中央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一是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要根据新形势，明确到2020年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范围，确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发挥作用的行业与领域。进一步收缩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线，将有限的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重点向关系国防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信息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向具有战略性、基础性与公共性产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集中度，增强其控制力。同时，要着重提高国有资本资源的整合能力及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国有资本布局的质量效益，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结构。

二是由低端传统产业为主向高端新能源、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产业为主转变，由单个企业主业集中为主向构建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业务集中转变，提高专业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产业配置。一方面，要加大企业产业资源整合力度，运用市场与行政等多种手段调整淘汰落后产业与过剩产能，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增强国有资本向高端产业布局的力度；另一方面，按照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的特点与要求，及战略协同、资源配置有效的原则，继续深入推进中央企业之间业务板块的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与混合一体化整合，增强产业链整合力度，促进国有资本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布局与集中的力度，增强其影响力，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产业结构。

三是由“垂直型”多层级向“扁平化”合理层级转变，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配置。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对中央企业各管理层级要明确定位，建立起分工合理、各司其职的三级管理模式。集团总部层级应该作为宏观调控中心、战略管控中心和投融资决策中心；二级法人层级一般作为资源配置中心、业务决策中心、业务管理中心、利润中心等；三级法人层级一般作为运营中心，是执行层面。按照层级定位进一步调整中央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增强其活力，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四是中央企业法人治理布局和调整由总经理为主的公司制向以董事会为主的股份制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进一步优化企业法人治理配置。要加大建设规范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和专职外部董事试点工作的力度，用3年-5年完成董事会建立。同时，

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除少数需要国有资本全资的中央企业外，中央企业基本都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增强其活力，进一步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五是中央企业的区域布局和结构调整由国内为主向国内与国际并重，重点向全球布局转变，进一步优化全球区域配置。要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加大对国家重点发展区域的布局，注重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适应我国建立更加开放型经济，加大“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要求，并针对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中央企业要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力争用 5 年-10 年的时间，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产业布局调整，进一步优化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提升具备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集团的能力与实力，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三）主要途径

一是推进“强强联合重组”，提升中央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按照国际经验，80%的跨国公司是专业化公司，只有 20%是多元化公司。这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发展日益趋向专业化，以提高竞争能力。这已是国际跨国公司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发展新形势下，中央企业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盲目一味做大，不合理多元化化发展，从而造成自身同质竞争、恶性竞争的恶果，而是要着力提高专业化水平，改变专业化不足、多元化发展过度的状况，用有限的资源做强做优做精业务，以适应更加激烈复杂的国际市场竞争。这需要进一步统一梳理中央企业各板块的情况，根据国内外市场竞争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中央企业的“强强”联合重组，将同业的企业加以整合重组，或实行严格的差别化经营，以减少同质不必要的消耗；同时，将一个业务的上下游组合形成有内在联系的专业化的产业链，特别是要加强“微笑曲线”两端的布局，在上游是新能源和新材料布局；下游要注重现代物流、科技、信息及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布局，将大量产业链的外部竞争消耗，变成内部合作，以提升中央企业的专业化发展水平。同时，也促进中央企业逐步转型升级，由传统业务结构为主向以现代业务结构为主转变发展。

二是重视科技布局和结构调整，增强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靠科技与研发先行。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应统筹考虑国有资本在科技及高新技术研发方面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加强在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及适用性先进技术的布局，加强在相关业务上科技力量的配套布局，改变中央企业传统产业布局过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以及科技服务业务与服务对象相脱离的状况，增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尽快缩小中央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科技实力的差距，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三是加大各板块中央企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全面提升管控水平。要重新定位并有强有力的机制保证中央企业各板块的业务发展重点，根据定位确定板块专业化发展方向，

板块内各企业根据板块发展业务要求进行相应的整合。要根据业务发展方向确定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并据此进行组织结构调整。要进行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特别是在国有产权相对控股的行业企业，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配置。要根据业务发展方向进行区域布局和结构调整，特别是在国内区域性布局的基础上，要加大进行全球性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全球布局和结构调整要以板块为单位，而不仅是以企业为单位，以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行业布局上的整体性与配套性，防止中央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重复布局与恶性竞争。要相应进行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包括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制度、子公司设置制度等，以全面提升中央企业管控水平。

四是化解产能过剩。在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中，要重点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特别要化解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化解如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可结合企业的业务重组，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产能；通过关停并转淘汰一批产能；通过加快“走出去”转移一批产能。同时，要建立产能过剩的首长负责制，加快形成对产能布局管控的制约机制。

五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以改革为动力，在布局和结构调整中积极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提高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质量，建立起改革与结构调整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机制，促进改革与结构调整共进共赢的新机制。同时，在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中既要充分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与规则，维护平等竞争的秩序与环境，也要加强宏观指导，利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政策干预，弥补单一市场机制存在的“盲目性、自发性及宏观短视性”，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降低调整成本，以提高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质量与效率。

四、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调整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一是增强全球布局观念。目前，国外跨国公司已在实施全球战略，并基本完成了全球布局，其核心是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吸纳和整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形成产业链，并进行全球竞争。面对新形势，中央企业应加快树立全球观念，抓住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提供的有利于“走出去”的机遇，加大全球资源的吸纳整合，加快推进全球布局步伐，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参加全球竞争。增强全球观念才能有大视野、大思路，才能决定大格局，真正切实提高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二是树立重质量、重做强、重整合、重管理的“四重”思想观念。重质量就是不单纯追求企业的主业、层级以及规模的数量增长，而是更要注重主业的内涵、质量、层级

的合理性及各类结构的合理性；重做强就是不单纯追求企业的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利润的扩大，而且更要注重企业的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人才结构等软实力的建设与水平提高；重整合就是不单纯追求不断进行新的兼并重组收购，而是更注重兼并重组后产权层面的深度合作、存量资产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重组整合、同业之间的整合等；重管理就是不单纯追求产品数量、职工数量、经营指标的一般性外延管理，而是更注重管理成本、节约能源、提高经营效率及管控有效的内涵性管理。

三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提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个总体的要求，并有时间的概念，特别是处于国家安全前列的军工企业，以及特别重大的国家级技术创新项目，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做到保值增值，或是不能马上做到保值增值。过多地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且用年度考核，反而一定程度助长了企业盲目上项目、扩规模的行为，不利于做强做优国有资产。因此，要正确理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含义，区别类型，有针对性地、合理地使用这个提法。

（二）加强布局和结构调整总体规划

中央企业产业分布调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而，有必要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对国有资产的功能定位要求，制定着眼于长期目标的中央企业布局与调整规划，包括总体规划与各中央板块的规划。总体规划主要是未来 5 年-10 年，在整体与全局上指导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中央企业各板块的规划主要是根据总体规划要求，指导板块内部的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点是整合同板块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业务。两个层面的规划是相联系的，总体规划是指导，各板块规划是基础，相互支撑，共同作用，以保障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健康有序进行。

（三）建立与完善布局和结构调整相关机制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的退出机制。要完善中央企业不良资产退出通道，应允许中央企业在不违反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自主处理退出资产；要加快培育市场承接主体，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共同成长；要完善中央企业退出的相关配套政策，包括人员安排、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等。要完善有效的资产处置平台。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资产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专业化平台优势，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中央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效率。

二是完善中央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与激励机制。要进一步确立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提供政策法规和财政税收支持，加强自主创新的平台建设，推动中央企业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形成研发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引入竞争机制，塑造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要为中央企业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创新文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同时，完善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引导中央企业建立内部创新激励机制。

（四）加强对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

继续加强对中央企业并购指导，切实防范企业并购风险，促进企业有效利用并购实现转型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集中度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中央企业在调结构、转方式中的引领带动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央企业海外并购的指导和引导，增强中央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的能力。同时，加强对企业之间资源整合指导，采用多种方式剥离重组中央企业非主业资产，关停并转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矛盾，防止重复投资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提升中央企业产业集中度与主业差异化程度，促进中央企业资源进一步向重要行业的产业链、价值链集中。制定新设企业投资管理办法，严格控制新设企业的层级。原则上，新设企业管理权责在中央企业集团，新设企业不导致产权层级增加，不涉足与主业不符领域，从源头上防止出现新的产权链条过长、过乱问题。

（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目前，对中央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比较注重数量规模指标，应根据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要求，增加考核企业质量、管理及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一方面，要完善中央企业产业布局调整绩效的考核激励指标；另一方面，要明确中央企业进行产业布局调整的硬约束指标，以保证布局和结构调整任务的完成。

（六）加大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力度

建议财政、税收等有关部门按照改制重组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调整税收政策；建议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出台政策，允许中央企业产权布局和结构调整涉及的划拨土地采用授权经营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的方式予以处理；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明确界定出资人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权责边界，简化审核流程；建议财政等有关部门积极推动中央企业中有关事业单位的改制。

参考文献：

1. 《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6〕97号）、《关于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国资发〔2007〕228号）及相关资料。
2. 李荣融：《遵循规律办企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
3. 陈鸿：《国有经济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刘英奎

· 理论前沿 ·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办好智库刊物是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

王晓红

摘要：本文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完善科学决策制度的关键环节，办好智库刊物则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与智库刊物具有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为决策服务应成为智库刊物的首要功能，分析了智库刊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本文提出，应把办好智库刊物作为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环节，明确办刊方向和风格定位，注重权威性、引领性和创新性，应倡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文风，注重作者队伍的专家化和多元化，加强编辑队伍的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建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学术公平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智库刊物 决策服务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

智库刊物既是传播智库研究创新成果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一个智库是否具有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全球共有 6626 家智库，中国有 426 家占 6.2%，数量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些智库几乎都创办了各种不同专业、不同风格特点的刊物，通过期刊在社会广泛传播智库的思想，形成了智库的影响力。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12 年全国共出版期刊

9867种，综合类期刊370种，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2559种，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4953种，文化教育类期刊1350种，文学艺术类期刊635种，经济管理类期刊达688种。其中，被列入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的有1924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达到144种，列入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的有535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达到102种。因此，发挥智库刊物的作用，对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办好智库刊物也同建设新型智库一样，是我们面临亟待研究和探索的新问题。

一、办好智库刊物是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完善科学决策制度的关键环节

智库即智囊机构、思想库，是主要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时出谋划策，为其提供政治思想主张、理论政策、系统解决方案等支撑，同时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研究机构。这类机构通常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基金会、咨询公司等组织。智库服务决策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中外历史所证明，尤其是进入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日新月异创新不断涌现，科学决策不仅需要充分发挥领袖的个人聪明才智，更要发挥集体智慧的创新作用，更强调知识的集成效应（霍建国，2014），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和智慧的集合体。通过智库科研人员、专家学者的集成创新，有利于形成准确、客观、系统、可操作、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政府、企业的科学决策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将加强智库建设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标志着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标志着中国智库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已经到来。同时，《决定》也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责任、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重要任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智库也承载着历史赋予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中国智库应该增强忧患意识，观大局、谋大事、创大业，站在为全人类谋和平、谋发展的高度，以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谋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己任，通过针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出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建设性、导向性的建议和方略，为中央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为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献计献策。一个智库是否能够为政府决策发挥好智囊、参谋作用，以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提高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和效率，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服务，是衡量智库影响力、质量水平的主要标准。

（二）智库刊物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要做到集全球思想、融各方智慧，就需要打破国家之间、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界限，广泛整合学术研究资源，建立国际国内智库合作交流的平台，智库刊物则是一个主要的平台、桥梁和纽带。智库刊物，顾名思义就是由智库所创办的面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的各种期刊，它是智库用来向全社会传播其研究创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扩大社会影响的媒体。智库刊物既是智库自身汇集专家资源、集聚各方智慧、传播思想主张、弘扬学术观点、进行理论创新的主要载体，也是智库之间进行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互鉴的平台和纽带。因此，它既是衡量一个智库创新能力、学术水平、成果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展示智库影响力、综合竞争力，推广打造智库品牌的重要窗口。

（三）智库与智库刊物具有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宗旨是“质量、独立、影响”，它也体现了打造成功智库品牌的三个要素。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必须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不断提升国际国内的影响力等方面来创建品牌。这其中，使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工具，是扩大和提升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一个智库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主要通过智库刊物进行传播；一个智库的创新成果产生后，主要也是通过内参和公开出版的智库刊物等媒体，向中央反映、向社会扩散，从而在决策层面、社会层面形成广泛影响。因此，一个智库的宗旨和目标体现在智库刊物上，智库刊物也承载着智库的使命、责任与担当；同时，智库的品牌、影响力通过智库刊物得以体现。智库是智库刊物的平台依托，智库的科研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对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号召力大小，也决定着智库刊物的影响力、号召力。智库刊物在传播智库成果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了自身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所以，一个智库刊物的质量好坏取决于智库水平的高低，是智库水平的综合反映。

（四）为决策服务应成为智库刊物的首要功能

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是智库的主要任务和功能。这其中，为政府决策服务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首要任务。智库应该以服务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为目的，以前沿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为重点，以成果的应用与转化为评价标准，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重大理论、重大战略对策作为智力支撑（荣婷婷，2014）。从

功能定位来看，智库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核心功能需要通过智库刊物这一传播工具得以实现。毋庸置疑，为政府决策服务也应该成为智库刊物的主要功能。一个有时代影响力的智库刊物，首先应体现在为决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上。其办刊宗旨、着力点应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中央宏观决策、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应成为决策者的“参谋”与“助手”。这一点，综观国际有影响的智库刊物无一例外。这些刊物通常以战略研究、政策研究为重点，为政府决策提供前瞻性、导向性、建设性的建议，以达到为政府科学决策发挥支撑作用的目的，具有风向标作用。如，美国《外交季刊》堪称智库刊物典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一贯坚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刊物，明确地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态度和立场，其权威性、引领性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风向标。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期刊《布鲁金斯评论》是经济政策类研究刊物，刊载分析当代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相关问题的论文和报告；另一个期刊《经济》由该学会出版社和拉美加勒比经济协会合作出版，为拉美地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分享高质量的研究，并直接应用于政策问题提供了论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该杂志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在128个国家发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期刊《华盛顿季刊》是一个国际事务杂志，分析全球性的战略变化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反映了不同政治、专业的观点，决策者将该刊物视为对国际政治、安全挑战、国家政策独立思考的源泉。

二、智库刊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尽管目前对智库刊物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如何办好智库刊物也在摸索与探讨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但目前智库创办的期刊也可谓多如牛毛，几乎每一个智库都有自己的期刊。这些刊物的内容、风格、导向仍然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总结，从中找到经验和教训。本文尝试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经济类学术期刊进行分析。因为，目前的经济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基本来自政府和民间科研机构、高校、协会、学会等组织，均是由智库所创办的，可以称为智库刊物。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国际国内面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经济学术期刊也不断涌现、十分活跃，这些期刊是传播经济思想理论和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研究创新成果交流的主要平

台，长期以来为促进学术繁荣，提升智库研究咨询能力和影响力，推动国际国内前沿性经济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探索 and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刊物定位、内容、风格来看，多数没能很好地体现智库刊物的特色，也难以承担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功能，发挥智库刊物应有的作用。许多期刊戴着“学术期刊”的桂冠，不免落入“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孤芳自赏”的境地，已经成为极少数学者自娱自乐的园地。这类刊物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 论文形式和研究模式单一，缺乏可读性。目前，经济学术期刊的文章以数学模型计量研究为主，这类文章多数党政机关干部看不懂，当然也很难在政府层面形成影响和传播。尽管目前党政机关干部的学历素质、知识水平都在迅速提高，许多是博士和硕士，但多数人仍然看不懂。记得几年前，我曾经与一位经济学家谈及此事。我提出，现在经济学术期刊的论文越来越看不懂了，一律要求有数学模型的计量研究、实证分析，一些刊物还规定论文没有模型就不能发表，是不是有些跑“偏”了。他表示，看不懂就对了，看不懂学校可以奖励 3 万元，看懂了就只能奖励 3000 元，这被称为“与国际接轨”。这话当然带有调侃性质，但也印证了一个现象，即论文越看不懂越值钱，看懂了反倒不值钱。也就是说，衡量论文质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思想性、创新性，而是论文的形式。

2. 论文质量和内容创新性不强，缺乏对战略问题研究。许多刊物不注重对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现实问题的研究，论文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为了方便采集数据做模型，应用理论陈旧，缺乏思想理论的创新点，甚至存在抄袭、数据造假等问题。一些学者为了把模型做得漂亮，结论符合自己的假设，不惜在数据采集、选择上大做文章，得出的结论与实际严重不符，可谓“谬以千里”。还有一些论文做了很长的模型演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用高射炮打蚊子”，而且还被一些学者标榜成“这叫经济学论文”。近年来，由于核心期刊供不应求，也出现了收版面费等不良现象，这种“花钱买发表”的做法必然造成“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谁给钱替谁说话。收取版面费造成了论文质量难以控制，公信力大打折扣，影响了学术公平公正。

3. 多数论文政策转化效果差，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许多论文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切合实际，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是闭门造车，很难转化为政策被实际部门采纳、操作。还有一些课题在确定选题时，目的就是为了发表论文，因此，一切研究的过程都是为了迎合刊物发表的意图和要求，而没有考虑到解决实际问题，课题成果发布后只能束之高阁。有些专家自嘲说，我们整天在制造学术垃圾。显然，许多论文是缺乏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

4. 作者来源范围比较狭小，尚未发挥集聚思想智慧的功能。这类期刊的主要作者群体是高校的教授、研究生，圈子十分窄小，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各类考核、评比、毕业答辩等硬性任务要求。来自科研院所、党政机关、企业、行业协会等经济生活一线的作者较少。这从客观上使经济学术期刊集合思想的广泛性受到局限。

5. 编辑队伍专业化程度较低，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目前，只有少量刊物采用专家匿名审稿方式，多数刊物仍然由编辑部审稿把关，但多数期刊存在编辑缺乏专业知识，业务素质较低，很难把握论文质量，不能满足一个经济学术期刊对编辑的专业学术素养要求。

（二）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 从论文刊用标准上看。目前，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基本进入了一个以数学模型为主流的狭窄、单一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这对刊物具有明显导向性作用。一些刊物把有没有计量模型作为审核论文质量的标准，如果没有模型就不是经济学文章，就不能发表，这是十分荒唐的。采用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是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以来被广泛使用，但它不能代替所有方法。我们通常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要求做实证研究，同时，数学模型是否做得好，也是衡量一篇学位论文是否优秀的指标之一，其目的是为了要求在读研究生全面掌握各种研究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和方法，接受规范化的学术训练，这是十分必要的、无可厚非的。但它绝不能成为衡量一篇论文质量好坏的首要指标，更不是唯一指标，同样也不能等同于评价测度一个经济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标准。无论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如何创新都是为内容服务的，衡量论文质量的首要标准，仍然应该是其学术思想理论的创新价值和应用价值。

翻阅一下目前被列为核心期刊（CSSCI）的经济学术期刊，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看懂？不要说是一般党政机关干部，就是许多专家、博士、业内人士也很难看得明白。试想，一堆让人看不懂的文章，又如何谈得上社会价值和意义？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经济学术期刊就成了“皇帝的新装”，成了少数学者自说自话、自问自答、自我欣赏的工具，也成为少数学者谋求利益的工具。其实，这些刊出的论文，许多连编辑自己也看不懂，因为许多专业编辑不懂数学模型，况且还有许多不懂专业的编辑。所以，这些文章的学术质量就无法保证。据一些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专家称，目前许多期刊发表的论文存在计量模型错误，即便是国内具有权威地位的期刊也存在计量模型错误的问题。可见，一个错误的演算只能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

2. 从价值取向上看。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主要用途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是为评

定职称、教授年终考核、研究生毕业等需求服务，因为高等院校都对教师、研究生有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刊等硬性考核指标规定，多数高校还自己指定了核心期刊，论文只有发表在指定的期刊上才算数，才记入考核任务、给予奖励，否则就不予记入考核任务，教授就面临岗位晋级风险，研究生则不能毕业。教授和研究生们必须围着这个指挥棒进行论文生产和制造，这些人写作和发表的积极性最高，同时在考核指挥棒的快速舞动下，也随之产生粗制滥造的现象。而对于工作在经济生活一线政府机关、企业等工作人员来说，发表论文通常不被纳入考核任务，投稿写作的积极性也较低，这是实际情况。

3. 从运营机制上看。目前，经济类学术期刊主要分为财政拨款和自收自支两种类型。由于受刊物定位、传播范围的局限，学术期刊不可能像通俗大众读物依靠广告收入，盈利能力较差，普遍存在资金困难，造成许多刊物依靠收取作者版面费谋生，一些核心期刊更是“洛阳纸贵”。

三、办好智库刊物的几点思考

一个智库刊物要发挥影响力，就必须注重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导向性、应用性、包容性相统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同志为该智库创办的《全球化》杂志提出了“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理念，和“创新、求实、睿智、兼容”的办刊宗旨，并提出了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平台的目标（曾培炎，2013）。这也精辟地概括了办好智库刊物的精髓，对于我们如何办好智库刊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智库刊物应该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经济脉搏，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加快自身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提高竞争力？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为此，应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精准刊物定位，改革期刊管理体制、建立持续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营造有利于智库刊物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把办好智库刊物作为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环节

从现实情况来看，各研究机构、高校、协会、学会等智库，通常把上报内参作为向政府沟通信息情况的主要渠道，而没有充分发挥智库刊物的作用，这是有失偏颇的。与内参相比，智库刊物可以更好地兼顾传播的社会属性和政府属性，兼顾受众的广泛性和高端性，兼顾研究的大容量和深入性，因此，在发挥为政府决策服务中具有内参不可比的独特优势。美国在评价智库时，把智库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的数量、被媒体引用的次数、对媒体的影响程度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对智库提高研究质量起到了重要激励作用。

这一做法也反映出，智库刊物是体现智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二）明确办刊方向和风格定位

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是办好智库刊物的前提。作为一个中国智库刊物，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己任的目标。在刊物定位上，必须做到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政府宏观决策为着力点，加强对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新形势下，智库刊物应注重在提高中国话语权、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全面地了解中国，提高中国作为大国的感召力、影响力等方面发挥导向性作用。

智库刊物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传播渠道，从而也决定了它的风格定位。智库刊物既不同于一般大众化的财经新闻类刊物，也应有别于单纯的学术期刊。财经新闻类期刊的读者定位是针对大众群体，对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的解读、剖析要求通俗易懂，版面和文章的表现形式也要求短小活泼、多样化、大众化，让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学术期刊是用来刊登学术论文，主要针对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小众化、高端化、专业化特点，供业内专家学者阅读，通常具有理论规范性、系统创新性、深度大容量等特点，覆盖层面通常是高校、科研机构等狭窄的范围。与前二者相比，智库刊物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财经类、新闻类刊物相比，它具有高端性、专业性、理论性、研究性的特点，读者对象通常是专业人士，一般不针对大众群体；与学术期刊相比，它具有包容性的特点，读者对象不单纯局限于学术界，而是包括政府、企业、咨询机构、科研单位、高校等较宽、较广泛的领域。从权威性、影响力来看，智库刊物体现在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影响力，对业内专家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三）注重权威性、引领性和创新性

一个智库刊物要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力、拥有话语权，首先要具备权威性。这就要求坚持专家办刊、质量兴刊、精品名刊的战略。所谓专家办刊，就是作者队伍、编辑队伍都应该是专家型人才，对作者、编辑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所谓质量兴刊、精品名刊，就是刊物内容质量取胜，登载的文章能够反映现实、引领形势、影响决策、流传久远，这是刊物形成权威性、影响力、品牌竞争力的关键和坚实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凝聚一批专业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权威作者，培养一支专业化程度高的编辑队伍，才能打造精品。保证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一个智库刊物的生命之所在，只有坚持不懈地思想创新、内容创新和风格创新，不断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发现和

研究新问题，善于接受和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才能够永葆青春活力。

（四）倡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文风

独立性是智库的核心属性，这是被国际经验所证明的。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只有保持独立性，其思想观点和结论不受政府、相关利益集团等各方的影响左右，才能确保为政府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这也是办好智库刊物的关键所在。智库刊物要真正发挥好上述职能，切实为政府决策服务好，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的理念，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文风；就要从谋求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敢于建言献策，敢讲话、讲真话，勇于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探索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理论性和政策性、实践性、应用性有机统一，不仅要刊登学术理论文章，还要注重刊登联系实际、“接地气”、深入调查研究的文章，力求做到“有用、管用、能用”，以达到引导决策、服务决策的目的。

（五）坚持兼容并蓄、包容互鉴的风格

坚持包容性发展是办好智库刊物的一个重要理念。所谓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章风格的包容性、内容的包容性、作者的包容性、读者的包容性等方面。这要求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允许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伴相生、和谐共处；兼顾知名专家、党政干部、青年学者、企业家等不同层面的作者，融合各方智慧；兼顾规范性、长篇幅研究文章与短小精悍的观点性论述；兼顾党政机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类型专业人士的读者群体，力求为从事经济决策、理论研究、经济管理的读者所喜闻乐见。此外，建立广泛合作的同业交流联系机制，加强智库刊物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相互借鉴，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享网络和品牌资源。

（六）注重作者队伍的专家化和多元化

作者是期刊的核心资源和支撑，也是决定刊物质量、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办好智库刊物需要凝聚一批业内权威的大家、底蕴深厚的专家以及众多青年新锐，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作者队伍，才能保持刊物的权威性地位和生生不息的活力。所谓作者专家化，就是要求作者应该是在专业领域坚持长期研究，具有深厚专业积累的专家学者。只有这样，才可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准确地分析问题，用前瞻性的理论解决问题，写出的文章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言之有物，切中要害。所谓作者多元化，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作者来源多元化，专家队伍应该有广泛的覆盖性，囊括高等院校、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领域；二是作者结构多元化，既要有著名专家学者，又要有学术新

人；三是学术思想多元化，要提倡不同学术思想交锋，不仅能够增强期刊的学术公信力，还会丰富学术思想。

（七）加强编辑队伍的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建设

培养一支专业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作风精益求精的编辑队伍，是决定刊物质量的关键因素。一个智库刊物的编辑通常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是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要把握正确的办刊方向，编辑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政治理论、中央方针政策等，准确把握政策口径，及时把握经济生活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适应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二是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一个好的编辑也应当是专家，需要具备较高的学术修养和专业知识，才可能对稿件的学术质量、学术价值、学术前沿性问题做出准确判断，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文章。因此，编辑首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专业修养，如继续学历教育、业务进修学习、参加学术论坛活动等，都是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重要方式。此外，还要熟练地掌握编辑学的知识，一个刊物要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就要求编辑在文字把关、审读、校对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基本功。三是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编辑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富有亲和力、感召力、凝聚力，才可能凝聚作者、发现新人。通过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大赛等，都是联系作者、发现学术新人的好机会，也是获取刊物优质稿源的重要途径。

（八）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

智库刊物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具有一定公共服务产品的特性，充足的经费支持是保证学术公平公正和纯洁性，防止学术腐败的重要条件。目前，由于刊物经营机制不善所产生的收取版面费、隐形广告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办刊质量和学术公平，助长了学术腐败之风。其主要原因：一是多数刊物自收自支必须考虑生计问题，为了生存就必须从事这些经营活动；二是由于对职称评定、教授晋级、研究生毕业等学术考核标准，导致作者不惜花钱买文章、刊登文章的现象。为此，应从刊物运行机制上解决问题。应该看到，依靠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社科基金、课题出版资助等方式，扶持一些优秀期刊是必要的，但仅是起一个引导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刊物的经费保障问题。因此，还应该从市场化方向加以探索。美国现有智库 2800 多家，所有智库没有一家是财政供养的，都靠在市场竞争中生存（郑新立，2014），这反映出解决智库刊物经费保障的根本出路也在市场。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杂志，通过设立专业运营公司的方式来解决刊物的经费来源问题，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刊物内容是完全分离的，既能够解决刊物经费来源，又保证了刊物的公共服务特性，不产生商业化倾向，是一（下转第 122 页）

· 名人观察 ·

产业变革和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卢中原

与我国经济转型相伴随的深刻产业变革，正在积蓄新的增长动力，开拓新的市场前景和职业需求，为产教融合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

服务业活力凸显，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经济增速最近两年连续低于 8%（均为 7.7%），但是新增就业仍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分别超过 360 万和 410 万人）。新兴服务业成长迅猛，例如，国内快递业大部分业务是为网购服务的。服务业蓬勃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前景十分广阔。

产业迁移日趋活跃，生产要素跨区域整合形成新增长极。东部传统产业加快迁出，中西部主动承接，突破行政区划培育产业集群，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有力拉动中西部区位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后发经济优势，提升东部产业层次和高端竞争实力。产业区域重组必然激活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和人才流动。

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压力加大，动力增强。随着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综合成本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我国低端加工、简单组装、劳动密集的传统竞争优势和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倒逼资源型城市加快转型，发展低能耗、低排放、可循环的接续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革命催生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来新的可能。

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融合各显其能，优势互补。现代产业变革不仅继续沿袭专业化分工的方向，体现了规模经济、瀑布效应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而且呈现出产业分工界限模糊、融合发展为新兴产业的趋势，如物流业融合了运输、仓储、配送、批发等业态，电信产业出现电信业 + 信息业 + 媒体业 + 娱乐业融合发展势头，体现了集聚效应、范围经济带来的综合竞争优势。因此，专业性和复合型管理、技术人才各有广阔舞台。

资本替代劳动趋势明显，新的人口红利仍有潜力。由于技术进步、劳动力成本提高，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减少用工成本，也迫切要求加强在职培训和转岗、再就业培训，培养新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同时，我国劳动力总量大，劳动力素质较高，而人工相对成本仍然较低，既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这是加强职业教育的较高起点，也是形成新的人口红利的可靠基础。

为顺应产业变革趋势，面向市场需求，建议从以下方面促进产教融合对接。

——依托园区经济，深化校企合作。各地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园区经济，对市场变化、产业变革前景和产业迁移走向高度敏感，对相应各类技能型、实用性人才需求强烈，又可提供实验、教学、研发设施和场地。不仅应当发挥每个园区各自特长，更应适应跨行政区划的产业迁移和承接趋势，整合各地园区资源和需求，扬长避短，推进园区企业与职教学校、普通高校主动对接，拓展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方式，共同培养适用人才。

——搭建主题平台，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政府宜加强统筹规划，根据产业迁移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突出某一方面主题，搭建校企联姻平台、产学研对接平台、行业指导平台、教育改革试点平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等，探索共同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合作办学新路径。

——动员社会力量，促进校企良性互动。发挥各类学会、行业协会的专家、信息和组织优势，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采取生动活泼、实战性强的多种互动方式，如营销专业大赛等，调动校企合作积极性，促进人才供需衔接，实现校企互利共赢。主管部门宜给予适当支持。

——倡导教改引领，激发办学活力。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推进职业教育集团主导、普通高校转型等新型产教融合。适应产业需求，自主调整专业设置。按专业需求对接，成立工科、商科等职教联盟。按项目对接，应用型项目可以职教机构与企业合作为主，成果转化项目可加强普通高校、职业高校与企业三方合作。完善“订单式”对接，按不同人才需求层次，促进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短期培训、中长期定向培养协调发展。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英奎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5 月份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新常态”已演变为“新中性”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低于平均水平的时代。PIMCO 认为，“新常态”已逐渐过渡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美国当地时间 5 月 13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PIMCO 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不约而同地趋近于较低却稳定的速度上限，而央行利率将不得不维持在危机之前的均衡水平以下，此之谓“新中性”。这是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 PIMCO 对未来 3 年-5 年的预期。

PIMCO 执行副总裁克拉里达表示，“新中性”是“新常态”的自然演化，它就好比汽车卡在了空挡上。“新中性”预期说的是全球经济并不是在复苏，而是在向疲弱的经济增长率趋同。

（二）全球经济五大旧风险和六大新风险

“末日博士”鲁比尼最近列出了全球经济正逐渐减弱的五大旧风险和六大新风险。

全球经济的五大旧风险：一是欧元区看起来将保持完整，希腊将来不会退出欧元区，且财政紧缩也几乎结束。二是美国走出了财政危机的泥潭。美国共和党 and 民主党在财政悬崖方面休战。三是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通缩风险已经下降，至少目前是这样。四是因为实施量化宽松（QE）政策，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通缩风险都不高。当然，通胀仍然非常低。五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叙利亚等中东地区仍然乱成一团。

全球经济的新风险：一是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有些人认为它会软着陆。鲁比尼担心中国经济会历尽坎坷，面临更加严峻的着陆。这意味着中国到 2016 年的经济

增长仅为 6%，或更低。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比如，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设定为 3%，但是这一水平过高。美联储退出 QE 的时间可能过早。三是发达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部分原因是收入的不均衡。现在，企业资金充裕，但并未进行任何的资本扩张。他们认为需求疲软，因为收入的不均衡和债务高企正使消费放缓。对于以消费为基础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问题。四是六个国家（阿根廷、委内瑞拉、泰国、乌克兰、俄罗斯和匈牙利）面临脆弱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五是俄罗斯扩张。普京不只是觊觎乌克兰，他还想建立一个欧亚联盟。六是中日关系紧张。如果这两国中任一国经济恶化，就会产生仇外情绪。这种冲突也可能传递到亚洲其它地区，至少会传递到韩国和印度。

（三）世界经济将缓慢增长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 3 月份先行指数，未来数月内，世界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例如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经济增速减缓，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维持稳定。

先行指数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正寻求再平衡，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相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发挥的作用在减少。但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旧缓慢并将一直保持此态势，因此，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经济增速缓慢引起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担忧。

今年第一季度数据中，除美国环比折年率下降 1.0% 之外，其他国家数据都还不错，欧元区环比增长 0.2%，同比增长 0.9%；加拿大环比折年率增长 1.2%；德国环比增长 0.8%，同比增长 2.5%；英国环比增长 0.3%，同比增长 0.6%；韩国环比增长 0.9%，同比增长 3.5%；澳大利亚环比增长 1.1%，同比增长 3.6%。因此，经济复苏势头不会太差。

（四）世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 5 月 18 日在柏林举行会谈，讨论世界和地区经济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称，世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也存在一定的危机因素，决不可掉以轻心。

联合声明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会持续下去，经济增速可望加快。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总体趋于好转，经济活动开始摆脱低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达 3.6%，明年则达到 3.9%。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明两年全球贸易将分别增长 4.7% 和 5.3%。但很多薄弱环节依然存在，比如公共债务、高成本信贷以及脆弱的银行。

（五）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增长

瑞银集团 5 月 20 日发表 2014 年至 2015 年环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增长，预期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3.1% 和 3.4%，远高于 2013 年的 2.5%，下行风险主要来自新兴市场。

报告指出，虽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令人失望，不过近期家庭收入支出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反映，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反弹，预计全年经济将增长 2.7%。

报告同时指出，日本财政紧缩政策将持续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显示，通胀虽已见顶，仍低于当地央行 2% 的目标，但日本央行仍未有放松财政政策的意欲。

（六）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向好

联合国 5 月 21 日发表的《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版中预测，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该报告更新版微弱下调了 2014 年全球增长速度，将 2014 年和 2015 年全球增长速度从年初预测的 3.0% 和 3.3% 降至 2.8% 和 3.2%。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表示，由于北美漫长寒冬严重制约了美国经济活动、乌克兰紧张局势及其地缘政治后果和美联储减少量化宽松购买量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等超出预期，年中更新版报告将全球经济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增长预期分别下调 0.2 个和 0.1 个百分点。但从全球来看，这些调整非常微小。

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将继续增长，2014 年和 2015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2.0% 和 2.4%。在发达国家中，美国 2014 年和 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更快一些，分别为 2.5% 和 3.2%，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4% 和 0.9%、1.6% 和 1.9%。这是自 2011 年以来美国、欧洲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首次在两年内实现同步经济增长，由此将为进一步强化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积极动力。

除发达经济体外，报告指出，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在未来两年也将实现增长。2014 年和 2015 年，转型经济国家如独联体等经济增长为 1.6% 和 2.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 4.7% 和 5.1%。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大的贡献。

报告警告，世界经济依然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未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依然是全球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主要风险。某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内挑战如结构失衡、基础设施瓶颈和政治局势紧张等也有可能降低其增长。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前日本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近期表示，

尽管中国近两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了就业和消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仍会保持高速增长。

濑口清之 5 月 22 日在主题为“日中经贸关系未来”的演讲中，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他表示，2011 年以前，中国 GDP 与就业呈正相关趋势；2011 年之后，GDP 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城市就业依然继续增长，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濑口清之认为，只要就业和消费温和增长，GDP 增速放缓并不是严重问题，当前中国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他同时表示，中国必须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前完成产业结构调整。

（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5 月 13 日发布的先行指数显示，未来几个月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将继续回落。

经合组织的先行指数显示，全球经济发展正在经历再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再像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那几年那么重要。但考虑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依然温和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如此，一旦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进一步放缓，今年全球经济的表现令人堪忧。3 月份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先行指数均告下跌，印度先行指数持平，这几个国家的指标都低于 100。100 是指经济增长处在长期平均水平。

（三）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瑞银集团 5 月 20 日发表了 2014 年-2015 年环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3.1%。受到房地产下行压力拖累，瑞银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 7.5%降至 7.3%，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预计明年增长 6.8%。报告指出，未来两年楼市是中国最大风险。

（四）中国经济放缓不会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称，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三至五年内的平均增速在 6%左右，也许放缓至 5%。PIMCO 副首席投资官 Scott Mather 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比五年前要好太多，而中国经济的放缓不会太过拖累全球经济。PIMCO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实际政策利率可能为零，较目前的水平下降 2%-3%。

（五）中国经济增长显示出见底迹象

瑞士信贷研究分析师陶冬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增长正显示出见底的迹象。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丧失增长动能的最坏情况已经过去，但仍在多个领域中面临着挑战；与经济增长前景相比，信贷状况更令人感到担心；同时，重申此前预期，中国政府不会

出台刺激性措施，而是会采取象征性的举措。

（六）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联合国 5 月 21 日发表的《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版中预测，中国经济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增长率将分别为 7.3% 和 7.1%。尽管同 2013 年相比，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但这符合中国政府提高发展质量和进行经济转型的要求。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115 页）

种值得探索的模式。还有一些期刊，通过大企业、财团投资文化产业等融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总之，智库刊物的资金来源可以通过财政、基金、企业等多渠道解决。

（九）建立学术公平的保障机制

保证学术公平既是刊物公信力的基础，也是刊物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方面要坚持文章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刊出优秀作品，不断推出学界新人，更广泛地吸纳作者。智库期刊要善于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为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提供展示平台。另一方面要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如，建立匿名审稿制度，可以有效杜绝各类人情稿、关系稿，是保证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国际学术期刊的通行做法。期刊应注重专家库建设，与审稿专家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形成一个重要的外部专家网络。

参考文献：

1. 霍建国：《加强中国智库建设 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全球化》2014 年第 4 期。
2. 荣婷婷：《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五点思考》，《全球化》2014 年第 4 期。
3. 曾培炎：《新年寄语》，《全球化》2013 年第 1 期。
4. 郑新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球化》2014 年第 3 期。
5. 王晓红：《如何办好经济学术期刊？》，《科技日报》2014 年 4 月 6 日。
6. 王晓红：《智库刊物应切实为政府决策做好服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5 月 7 日。

责任编辑：李 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1 2012年-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年4月)				
世界	3.2	3.0	3.6	3.9
发达国家	1.4	1.3	2.2	2.3
美国	2.8	1.9	2.8	3.0
欧元区	-0.7	-0.5	1.2	1.5
日本	1.4	1.6	1.4	1.0
发展中国家	4.9	4.7	4.9	5.3
印度	4.8	4.6	5.4	6.4
俄罗斯	3.5	1.3	1.3	2.3
巴西	1.0	2.3	1.8	2.7
世界银行(WB, 2014年6月)				
世界	2.5	2.4	2.8	3.4
发达国家	1.5	1.3	1.9	2.4
发展中国家	4.8	4.8	4.8	5.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年6月)				
世界	2.4	2.5	2.8	3.2
美国	2.8	1.9	2.2	3.1
欧元区	-0.7	-0.5	1.1	1.5
日本	1.4	1.5	1.5	1.2
印度	4.8	4.6	5.4	6.2

注:IMF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表2 2012年-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世界	2.7	2.7	4.3	5.3
发达国家				
出口	2.1	2.3	4.2	4.8
进口	1.1	1.4	3.5	4.5
发展中国家				
出口	4.2	4.4	5.0	6.2
进口	5.8	5.6	5.2	6.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

表3 2012年-2015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年4月)				
发达国家	2.0	1.4	1.5	1.6
美国	2.1	1.5	1.4	1.6
欧元区	2.5	1.4	0.9	1.2
日本	0.0	0.4	2.8	1.7
发展中国家	6.0	5.8	5.5	5.2
印度	9.4	10.1	8.0	7.5
俄罗斯	5.1	6.8	5.8	5.3
巴西	6.0	6.2	5.9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年6月)				
世界	3.0	2.7	3.1	3.1
美国	2.1	1.5	1.8	1.9
欧元区	2.5	1.4	0.7	1.2
日本	0.0	0.4	2.6	1.8
印度	9.4	9.8	7.8	7.0

注: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3 年		3.3	1.6	5.8
	5 月	3.3	1.5	7.1
	6 月	3.6	1.8	7.6
	7 月	3.7	1.9	7.7
	8 月	3.5	1.7	7.6
	9 月	3.5	1.5	7.8
	10 月	3.4	1.2	7.9
	11 月	3.6	1.5	8.0
	12 月	3.5	1.6	7.7
2014 年				
	1 月	3.5	1.6	7.6
	2 月	3.2	1.4	7.2
	3 月	3.4	1.6	7.4
	4 月	3.8	2.0	7.4
	5 月	3.9	2.0	7.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3 年		2.7	0.0	5.9			
	5 月	2.0	-0.1	4.9	50.6	51.3	51.3
	6 月	2.0	0.0	4.9	50.6	51.4	51.5
	7 月	3.3	0.7	6.6	50.8	51.5	51.6
	8 月	2.6	0.8	5.9	51.6	52.3	53.2
	9 月	3.3	2.2	5.9	51.8	53.1	52.8
	10 月	3.3	2.4	5.3	52.1	52.9	53.3
	11 月	4.0	3.1	4.8	53.1	55.2	54.8
	12 月	4.0	3.3	5.3	53.0	54.9	54.4
2014 年							
	1 月	3.9	3.1	4.7	53.0	54.6	54.4
	2 月	4.6	3.7	5.1	53.2	54.6	54.6
	3 月	3.9	3.7	5.6	52.4	53.5	53.3
	4 月				51.9	52.9	52.6
	5 月				52.2	53.5	53.1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8	2.2	-1.0
	1 季度	3.7	2.9	-1.4
	2 季度	1.2	1.9	0.3
	3 季度	2.8	1.7	3.5
	4 季度	0.1	1.7	-6.5
2013 年		1.9	2.0	-2.2
	1 季度	1.1	2.3	-4.2
	2 季度	2.5	1.8	-0.4
	3 季度	4.1	2.0	0.4
	4 季度	2.6	3.3	-5.2
2014 年				
	1 季度	-2.9	1.0	-0.8

表 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8.6	4.2	0.7
	2 季度	4.7	3.8	2.5
	3 季度	2.7	0.4	0.5
	4 季度	11.6	1.1	-3.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1.5	-1.3	0.6
	2 季度	6.5	8.0	6.9
	3 季度	5.9	3.9	2.4
	4 季度	2.8	9.5	1.5
2014 年				
	1 季度	-1.8	-8.9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8	2.2	-1.0
	1 季度	3.3	2.2	-1.7
	2 季度	2.8	2.3	-1.3
	3 季度	3.1	2.2	0.2
	4 季度	2.0	2.0	-1.1
2013 年		1.9	2.0	-2.2
	1 季度	1.3	1.9	-1.8
	2 季度	1.6	1.9	-2.0
	3 季度	2.0	1.9	-2.7
	4 季度	2.6	2.3	-2.4
2014 年				
	1 季度	1.5	2.0	-1.5

表 9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10.5	4.7	3.0
2 季度		9.5	4.4	3.4
3 季度		6.5	2.8	2.4
4 季度		6.8	2.4	0.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4.3	1.0	0.1
2 季度		4.7	2.0	1.2
3 季度		5.5	2.9	1.6
4 季度		3.4	4.9	2.8
2014 年				
1 季度		3.3	2.8	3.1

注:季度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3 年		0.5		7.4	219.1
	5 月			7.5	19.9
	6 月	1.8	0.1	7.5	20.1
	7 月			7.3	14.9
	8 月			7.2	20.2
	9 月	3.5	0.5	7.2	16.4
	10 月			7.2	23.7
	11 月			7.0	27.4
	12 月	2.3	1.4	6.7	8.4
2014 年					
	1 月			6.6	14.4
	2 月			6.7	22.2
	3 月	-1.7	1.4	6.7	20.3
	4 月			6.3	28.2
	5 月			6.3	21.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22801.9		2.9	27565.9		0.1	-4763.9
4 月	1877.6	0.5	1.7	2281.8	1.9	-1.8	-404.2
5 月	1872.1	-0.3	1.6	2320.4	1.7	0.2	-448.3
6 月	1903.7	1.7	2.7	2269.2	-2.2	-0.7	-365.5
7 月	1899.0	-0.2	3.4	2293.2	1.1	0.8	-394.2
8 月	1906.1	0.4	4.2	2301.2	0.3	1.2	-395.2
9 月	1902.5	-0.2	0.8	2325.1	1.0	1.6	-422.6
10 月	1939.7	2.0	5.7	2330.5	0.2	3.2	-390.8
11 月	1949.2	0.5	4.6	2308.9	-0.9	-0.9	-359.7
12 月	1928.0	-1.1	1.6	2301.9	-0.3	1.2	-373.9
2014 年							
1 月	1921.8	-0.3	2.5	2322.4	0.9	1.1	-400.5
2 月	1881.5	-2.1	0.1	2307.4	-0.6	0.4	-425.9
3 月	1936.6	2.9	3.6	2378.3	3.1	6.2	-441.8
4 月	1933.5	-0.2	3.0	2405.8	1.2	5.4	-472.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96.8	3113.5	-1416.7
	1 季度	292.5	1045.6	-753.0
	2 季度	523.1	704.1	-181.1
	3 季度	449.3	915.9	-466.7
	4 季度	432.0	447.8	-15.9
2013 年		2307.7	3283.4	-975.8
	1 季度	433.1	812.1	-379.1
	2 季度	604.6	1011.3	-406.8
	3 季度	559.9	914.2	-354.4
	4 季度	710.2	545.7	164.4
2014 年				
	1 季度	-1173.3	583.5	-1756.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1	0.2
4 季度		0.3	0.0	-0.4
2014 年				
1 季度		0.2	0.1	0.3

表 14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7	-0.9	-1.1
2 季度		0.2	2.3	1.7
3 季度		0.6	0.0	1.0
4 季度		1.1	1.2	0.4
2014 年				
1 季度		0.3	0.3	0.8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 比增加(万人)	失业 率
		环比	同比		
2013 年		0.41		-125.4	12.0
	4 月				12.0
	5 月				12.0
	6 月	0.39	0.42	-9.1	12.0
	7 月				12.0
	8 月				12.0
	9 月	0.13	0.51	0.5	12.0
	10 月				11.9
	11 月				11.9
	12 月	0.14	0.89	16.4	11.8
2014 年					
	1 月				11.8
	2 月				11.8
	3 月	0.11	0.77	11.2	11.8
	4 月				11.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
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5	0.5
4 季度		0.5	0.1	0.1
2014 年				
1 季度		0.9	0.4	0.2

表 1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7	0.1
3 季度		-2.4	1.0	0.7
4 季度		-0.1	2.9	2.5
2014 年				
1 季度		1.9	4.1	4.2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年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18960		0.9	17372		-3.4	1588
4 月	1601	-0.7	9.0	1453	1.4	1.7	148
5 月	1561	-2.5	-0.2	1424	-2.0	-5.6	137
6 月	1586	1.6	-3.0	1462	2.7	-5.1	124
7 月	1556	-1.9	3.2	1454	-0.6	0.5	102
8 月	1575	1.2	-5.7	1451	-0.2	-7.3	125
9 月	1589	0.9	3.0	1458	0.5	1.3	130
10 月	1584	-0.3	1.4	1452	-0.4	-2.9	131
11 月	1587	0.2	-1.9	1429	-1.6	-4.9	159
12 月	1568	-1.2	3.8	1421	-0.5	1.1	147
2014 年							
1 月	1587	1.2	1.2	1451	2.1	-2.6	136
2 月	1607	1.3	3.4	1455	0.3	0.3	151
3 月	1600	-0.4	-0.6	1446	-0.7	2.8	154
4 月	1596	-0.2	-1.5	1438	-0.5	-2.7	15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
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
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851	1914	-1063
	4 月	163	238	-75
	5 月	566	128	437
	6 月	188	331	-143
	7 月	133	64	69
	8 月	287	291	-4
	9 月	-44	149	-193
	10 月	1788	1585	203
	11 月	46	245	-198
	12 月	-408	-311	-97
2014 年				
	1 月	160	250	-91
	2 月	-157	-465	308
	3 月	-224	3	-227
	4 月	-33	153	-18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
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1.0	0.4	1.5
	2 季度	-0.6	0.4	-0.6
	3 季度	-0.8	-0.5	0.4
	4 季度	0.0	0.5	0.7
2013 年		1.5	2.0	2.0
	1 季度	1.3	1.0	0.9
	2 季度	0.7	0.7	0.4
	3 季度	0.3	0.2	0.2
	4 季度	0.1	0.4	0.2
2014 年				
	1 季度	1.6	2.2	0.1

表 21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0.3	2.8	2.0
	2 季度	0.3	-0.5	1.4
	3 季度	-1.3	-4.0	-0.4
	4 季度	0.1	-3.0	-1.9
2013 年		2.6	1.7	3.4
	1 季度	-0.2	4.3	1.1
	2 季度	2.1	2.9	1.8
	3 季度	2.6	-0.7	2.4
	4 季度	1.9	0.5	3.7
2014 年				
	1 季度	4.5	6.0	6.3

表 22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3.2	3.7	2.2
	2 季度	3.2	3.0	1.3
	3 季度	-0.2	0.9	1.5
	4 季度	-0.3	0.7	2.0
2013 年		1.5	2.0	2.0
	1 季度	0.1	1.5	1.4
	2 季度	1.2	1.8	2.5
	3 季度	2.3	2.4	2.2
	4 季度	2.5	2.3	1.8
2014 年				
	1 季度	3.0	3.7	0.9

表 23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5.5	1.0	6.7
	2 季度	6.3	9.2	9.0
	3 季度	2.9	-4.8	5.0
	4 季度	-0.7	-5.0	1.0
2013 年		2.6	1.7	3.4
	1 季度	-1.2	-3.3	0.3
	2 季度	0.6	0.0	0.8
	3 季度	4.3	3.2	3.2
	4 季度	7.2	7.0	9.2
2014 年				
	1 季度	11.5	8.9	14.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3 年		1.1	1.46	4.0
	5 月	-0.8	1.42	4.1
	6 月	-2.0	1.48	3.9
	7 月	3.1	1.46	3.9
	8 月	0.3	1.48	4.1
	9 月	6.3	1.51	4.0
	10 月	6.3	1.57	4.0
	11 月	5.6	1.55	3.9
	12 月	6.9	1.61	3.7
2014 年				
	1 月	6.9	1.63	3.7
	2 月	7.1	1.67	3.6
	3 月	6.1	1.66	3.6
	4 月	5.0	1.64	3.6
	5 月		1.64	3.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697742		9.5	812425		14.9	-114684
5 月	58938	4.3	10.1	66788	3.6	10.0	
6 月	59164	0.4	7.4	66179	-0.9	11.7	-7015
7 月	58623	-0.9	12.2	68264	3.2	19.7	
8 月	59528	1.5	14.6	68431	0.2	16.2	-8903
9 月	59285	-0.4	11.4	70547	3.1	16.7	
10 月	59913	1.1	18.6	71777	1.7	26.3	-11864
11 月	59677	-0.4	18.4	73190	2.0	21.2	
12 月	60829	1.9	15.3	72683	-0.7	24.8	-11854
2014 年							
1 月	58716	-3.5	9.5	76108	4.7	25.1	-17392
2 月	60233	2.6	9.8	71601	-5.9	9.0	
3 月	58478	-2.9	1.8	74672	4.3	18.2	-16194
4 月	58506	0.0	5.1	67311	-9.9	3.4	
5 月	57795	-1.2	-2.7	66417	-1.3	-3.5	-8622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3624	133860	-130236
4 月	-465	13734	-14199
5 月	567	9173	-8606
6 月	997	9620	-8623
7 月	453	36886	-36433
8 月	355	5552	-5197
9 月	797	6183	-5386
10 月	-1152	7887	-9039
11 月	848	5135	-4287
12 月	489	18470	-17981
2014 年			
1 月	1042	12581	-11539
2 月	-1597	6339	-7936
3 月	4328	7376	-3048
4 月	-1386	6096	-7482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5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4.5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4.6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4	2.1
2013 年	2.7	1.8	1.9	2.3	4.6	1.3
1 季度	3.0	0.6	1.6	1.9	4.4	0.8
2 季度	1.9	1.8	2.3	3.5	4.7	1.0
3 季度	3.0	1.9	1.7	2.4	5.2	1.3
4 季度	2.7	2.7	2.0	2.2	4.6	2.0
2014 年						
1 季度	1.2	3.1	1.6	1.9	4.6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2 年	2.3	3.9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2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4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1	2.9	2.1	4.7	5.8
1 季度	2.1	0.6	2.9	1.4	4.2	6.1
2 季度	2.7	1.6	3.1	2.7	4.5	5.8
3 季度	3.4	1.4	2.8	1.3	5.0	5.6
4 季度	3.7	0.7	3.0	2.9	5.1	5.7
2014 年						
1 季度	3.9	1.8	3.0	3.1	6.2	5.2

表 29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3 年	7.1	7.7	5.5	5.5	24.7
5 月	7.1	7.8	5.8	5.2	
6 月	7.1	7.8	6.0	5.4	25.3
7 月	7.2	7.7	5.6	5.3	
8 月	7.1	7.7	5.3	5.2	
9 月	6.9	7.6	5.4	5.3	24.5
10 月	7.0	7.4	5.2	5.5	
11 月	6.9	7.1	4.6	5.4	
12 月	7.2	7.2	4.3	5.6	24.1
2014 年					
1 月	7.0	7.2	4.8	5.6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6.8	5.0	5.4	25.2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4.9	

表 30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3 年	3.1	4.9	3.4	4.2	3.1
5 月	3.2	4.9	3.4	4.2	3.3
6 月	3.2	5.0	3.3	4.2	2.7
7 月	3.2	5.1	3.3	4.3	3.0
8 月	3.1	5.2	3.3	4.3	3.1
9 月	3.0	5.3	3.3	4.2	3.1
10 月	3.0	5.0	3.3	4.2	3.3
11 月	3.0	4.5	3.3	4.2	3.4
12 月	3.1	4.3	3.2	4.1	3.0
2014 年					
1 月	3.2	5.1	3.1	4.0	3.3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3.0
4 月	3.7	4.8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4588.6	4618.5	-29.9	5414.8	6545.3	-1130.5
4 月	390.0	401.8	-11.8	454.9	525.0	-70.1
5 月	398.5	395.5	3.0	556.1	521.6	34.5
6 月	378.2	386.3	-8.1	471.5	542.5	-71.0
7 月	359.0	376.0	-17.0	468.0	544.6	-76.6
8 月	373.6	393.2	-19.6	416.0	511.1	-95.1
9 月	387.3	390.8	-3.5	433.6	577.2	-143.6
10 月	405.9	408.5	-2.6	458.5	605.0	-146.5
11 月	379.7	384.3	-4.6	425.2	596.5	-171.3
12 月	374.3	360.0	14.3	432.3	515.6	-83.3
2014 年						
1 月	368.3	345.9	22.4	437.0	566.5	-129.5
2 月	356.5	347.4	9.1	430.2	527.7	-97.5
3 月	400.8	388.9	11.9	442.6	576.0	-133.4
4 月	386.8	394.7	-7.9	387.6	562.6	-175.0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959.9	1035.0	-75.1	2421.8	2504.5	-82.7
5 月	80.7	84.8	-4.1	218.2	220.2	-2.0
6 月	77.1	78.1	-1.0	211.3	196.8	14.5
7 月	87.7	93.3	-5.6	208.1	236.6	-28.5
8 月	80.3	90.9	-10.6	214.2	211.1	3.1
9 月	76.9	88.1	-11.2	210.0	197.0	13.0
10 月	85.0	95.2	-10.2	228.2	240.3	-12.1
11 月	84.3	84.3	0.0	208.6	200.0	8.6
12 月	74.2	72.2	2.0	208.5	190.4	18.1
2014 年						
1 月	71.4	87.0	-15.6	160.3	210.2	-49.9
2 月	75.5	74.8	0.7	159.3	188.9	-29.6
3 月	74.0	85.0	-11.0	176.3	183.6	-7.3
4 月	73.4	85.7	-12.3	197.2	201.1	-3.9
5 月				207.5	209.5	-2.0

表 33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3125.5	4658.0	-1532.5	5232.9	3429.8	1803.1
5 月	246.4	447.1	-200.7	409.8	265.9	143.9
6 月	237.2	258.8	-21.6	418.4	281.9	136.5
7 月	255.4	380.2	-124.8	437.1	305.5	131.6
8 月	262.5	368.5	-106.0	425.3	287.3	138.0
9 月	278.6	342.2	-63.6	448.1	289.6	158.5
10 月	272.8	379.2	-106.4	434.7	305.4	129.3
11 月	239.3	336.6	-97.3	468.8	296.6	172.2
12 月	261.5	364.8	-103.3	494.5	323.9	170.6
2014 年						
1 月	268.1	363.1	-95.0	394.6	206.1	188.5
2 月	253.0	334.9	-81.9	365.3	241.1	124.2
3 月	290.8	395.4	-104.6	468.7	271.5	197.2
4 月	256.3	357.2	-100.9	474.5	276.2	198.3
5 月	280.0	392.3	-112.3			

表 34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596.3	5155.8	440.5	3801.9	3909.7	-107.8
5 月	483.1	423.9	59.2	328.4	341.7	-13.3
6 月	466.9	407.2	59.7	310.3	309.4	0.9
7 月	458.3	433.8	24.5	322.1	345.1	-23.0
8 月	463.1	145.9	317.2	326.7	337.6	-10.9
9 月	446.5	410.6	35.9	313.9	315.1	-1.2
10 月	504.8	456.1	48.7	350.9	361.2	-10.3
11 月	479.1	431.1	48.0	317.0	321.5	-4.5
12 月	479.8	443.5	36.3	320.9	312.1	8.8
2014 年						
1 月	455.8	447.9	7.9	270.4	311.0	-40.6
2 月	429.2	420.5	8.7	305.2	304.2	1.0
3 月	490.8	455.4	35.4	333.1	332.2	0.9
4 月	503.1	458.4	44.7	340.7	345.3	-4.6
5 月	478.4	425.3	53.1			

表 35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355.5	6222.8	-867.3	3054.4	2699.0	355.4
5 月	441.7	522.5	-80.8	263.0	218.7	44.3
6 月	415.3	508.8	-93.5	264.9	231.8	33.1
7 月	454.1	528.0	-73.9	253.0	220.6	32.4
8 月	461.6	573.4	-111.8	256.4	210.4	46.0
9 月	466.7	537.9	-71.2	252.4	229.0	23.4
10 月	485.0	540.4	-55.4	267.1	225.9	41.2
11 月	471.9	551.5	-79.6	257.3	213.8	43.5
12 月	455.3	535.6	-80.3	263.8	241.6	22.2
2014 年						
1 月	437.1	505.8	-68.7	242.9	213.4	29.5
2 月	328.7	414.3	-85.6	212.9	197.2	15.7
3 月	439.3	514.6	-75.3	277.6	258.0	19.6
4 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 月				266.7	213.8	52.9

表 36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2282.8	2060.1	222.7	1835.5	1873.7	-38.2
4 月	183.0	179.6	3.4	149.5	162.7	-13.2
5 月	184.9	175.4	9.5	157.6	166.2	-8.6
6 月	180.2	166.5	13.7	148.5	157.8	-9.3
7 月	190.3	181.4	8.9	154.0	177.4	-23.4
8 月	191.7	170.0	21.7	135.3	132.4	2.9
9 月	194.7	168.0	26.7	152.3	154.4	-2.1
10 月	211.1	185.2	25.9	158.4	157.6	0.8
11 月	194.5	164.1	30.4	158.3	150.6	7.7
12 月	202.3	172.8	29.5	169.4	154.0	15.4
2014 年						
1 月	193.6	174.4	19.2	143.9	152.1	-8.2
2 月	178.1	146.5	31.6	147.1	139.0	8.1
3 月	197.9	168.9	29.0	153.1	140.5	12.6
4 月	203.7	176.5	27.2	142.5	165.8	-23.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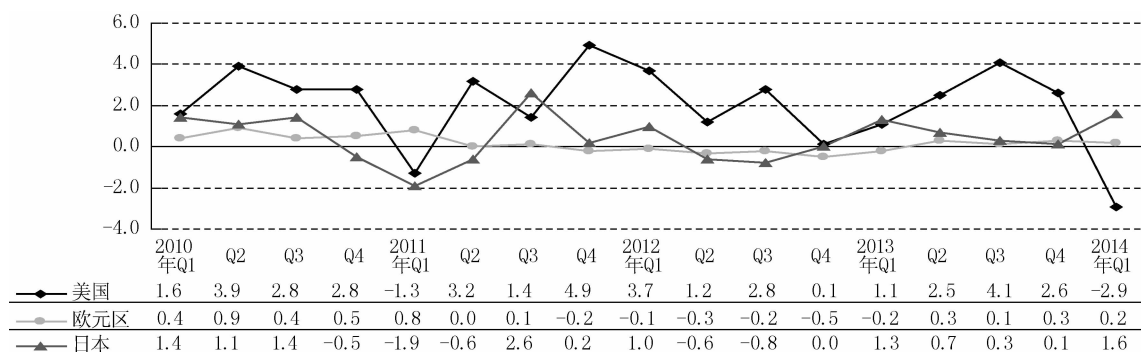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2014 年 1 季度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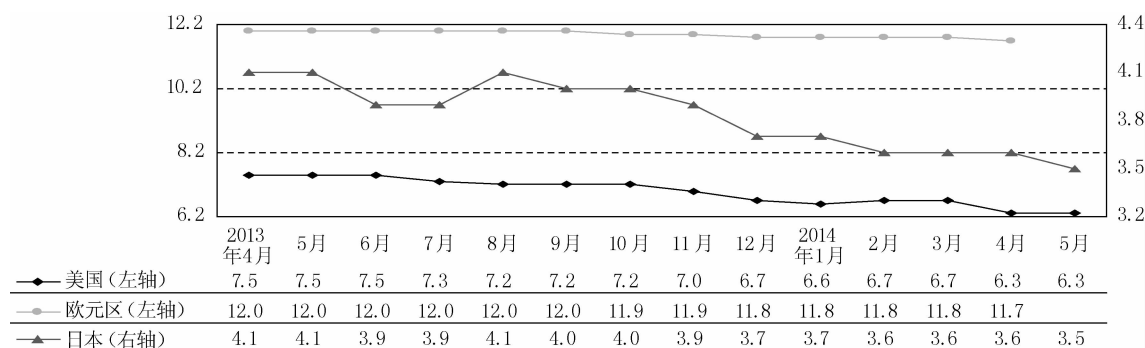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 4 月-2014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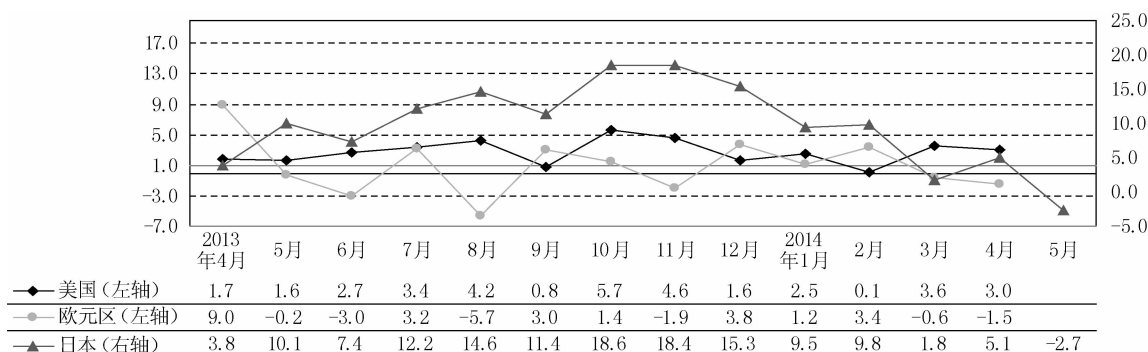


图 3 2013 年 4 月-2014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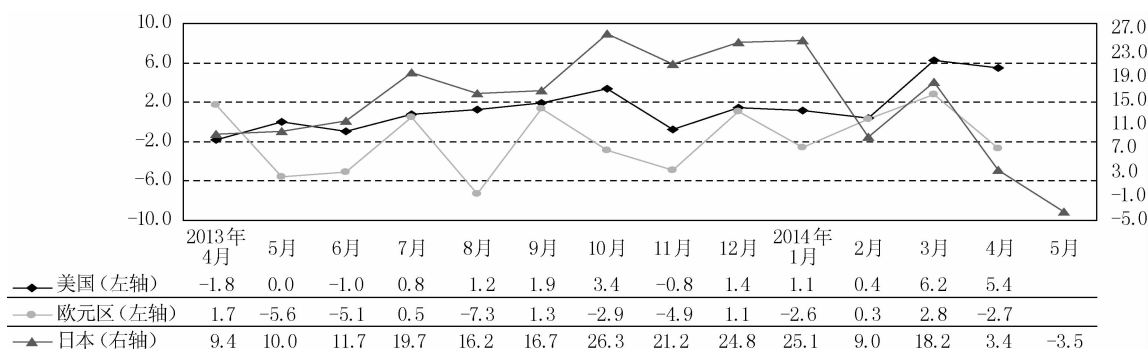


图 4 2013 年 4 月-2014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Working to Achieve the Dream for a Century: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owerful Nation

Miao Wei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owerful nation is the mission to achieve industrial growth and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way to achieve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effort since the new China was established, especially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China has been transited from an agriculture-based country 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now we are at a new historical stage: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owerful nation. To build an industrial powerful nation, we have to focus on the them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 the new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s of industrialization,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Nie Zhenbang, Hu Hengyang and Qiu Tiancha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four")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ur" generally have optimal interaction; but if the policy were misconducted, their interaction would be limited; thus would affect the process of mode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developed very fast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it is still the weakest part among "the four". It is the key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bring various resource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We also nee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encourage the resource-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friendly agriculture,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y system,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emphasize the system reform, and remove the barrier that restrict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3) On the Strategies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 Major Countries in the New Period

Xu Zhanchen and Chen Wenling

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highlight the economic diplomacy to major countries from the strategic view, to seriously analyze the strategic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Japan, Russia, E.U. and India, and to form the tactics with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It's also needed to find out the common interest with them, boost the linkage between major powers 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major powers, facilitate economic diplomacy conversion into politic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interests, express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summit diplomacy, reinforce the basis with the middle pow-

ers, and shape the new mode of economic diplomacy for China to major powers.

(4) In 2014: Abenomics Will be Put to the Test

Wang Shaohui

In early 2013, Abe's government launched new policies called Abenomics which take bolder monetary policies, flexible fisc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s core. These policies are also named Abe's "three arrows". The first and second arrows were shot at over but didn't make the bull's-eye. The third arrow has also been shot, but is still far away from the bull's-eye. The effect will depend on the new measures of Abe's government in 2014. However, after the first quarter's high growth rate, Japan's economy will grow slowly, and this will directly impact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Abe's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consumption tax, lack of confidence to economy and decreased effect of these policies.

(5)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arket Financing Mod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iang Yunfeng and Xiaope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claimed that China is strived to bala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develop mixed-ownership economy, promote urban construction supervising innovation, build up a transparent and formal urba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system and wide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channels. Featured urban construction market financing modes include government proxy finance, government installment finance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fin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s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financing system. By comparative study, the paper has two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stable funds shortage and low efficiency of fund use. The first one is to propose different financing modes based on respective economic status, i.e. developed cities, less developed cities and undeveloped cities. The second sugges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building of a better financing environment and allow private sectors to provide products and services by franchising.

(6) A Study on the Reform Program: "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Shen Kaiyan, Yang Yaqin and Tang Yunyi

The study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profound effect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reform program, 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rogram will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 firstly, the program will reduce the taxes on companies and will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revenue simultaneously; secondly, the program as an innovative system will create many linkage effects; lastly, such a combination of policies will yield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ax reform. The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six ripple effects, and states that they, on the one hand, will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economic system and become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will eventually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s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ll strongly simulate th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strategy

(7)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Prospects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ang Yuanjing, Shi Hao and Liu Ming

On the basis of capital ownership in some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private investment since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several primary policies about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private investment in China using statistic methods. This paper also has an outlook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main findings are following: 1) private investment has been enhanced in 22 encouraging industries but accounts for a very low share in some monopoly industries such as energy, railway and finance; 2) the private investment is faced with systematic and mechanistic difficulties like barrier to entry or exit, hard to dominate in the market;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constructions of people's livelihood, municipal facilities and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as the next emphasis on encouraging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akes measures to bring about a win-win situation to both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8) Several Relation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

Jiang Changyun

Farmer cooperativ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However,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ing the role of farmer cooperative played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5 kinds of relation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treated, such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dhering to farmers' voluntary and strengthening guidance, developing cooperatives and fostering cooperative entrepreneurs, exercising cooperatives autonomy and foreign supporting, and developing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s or cooperatives association.

(9) Research on Deepen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Enterprises

Song Qun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PC, it is said that we should speed up the creation of a new growth model and ensure that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improved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and we should invest more of state capital in major industries and key fields that comprise the lifeline of the economy and are vital to national security, thus steadily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state-owned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its capacity to leverage and influence the economy. It i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o attai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2020, it sets higher requirements to adjust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state sector. This research is trying to put forward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deepen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enterpris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acquired in its development from 2000.

(10) Making a Good Think-Tank Periodical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ink-Tank Influence

Wang Xiaoho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building a new think-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 the key part of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making a good think-tank periodic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think-tank. Think-tank periodical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nk-tank, and its main job is to serve the government at decision-mak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 and its 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k-tank periodicals. Making a good think-tank periodical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ink-tank influence, so we should clearly define the direction and style of the periodicals, focus on its authority, steer and innovation, advocate practical,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style of writing, emphasize author team's expertise and diversification, strengthen editor team'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nds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n academic fairness guarantee mechanism.

Editor: Lu Liu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 年度)评奖公告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章程》规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 年度)评奖工作将于 2014 年底开始进行。

此次评奖对象是,1979 年至 2014 年 7 月底(以近两年为主)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公开出版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中紧迫问题的理论研究。评奖旨在传承老一辈经济学家精神,坚持开放、公开、公平的原则,特别注重发现中青年的优秀作品,准确把握时代脉动,鼓励获奖作品在研究探索中的创新精神,在学术成果上的引领功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评奖委员会,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聘请的 29 位经济学家组成。评奖工作的程序是:2014 年 11 月底前,孙冶方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 21 个单位各推荐一位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初选小组。初选小组将于 2015 年第一季度集中评审参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选作品的建议名单,供评奖委员会评审。2015 年夏,评奖委员会委员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作品。之后,获奖名单将在孙冶方基金会网站公示一个月,如无异议,即报孙冶方基金会理事会批准。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奖的奖金标准为:著作奖每本 20 万元,论文奖每篇 10 万元。孙冶方基金会将于 2015 年秋季向获奖者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

申请评奖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 2014 年 11 月底前报送参选作品(著作类婉拒论文集和教科书),并附相关材料,内容包括:作品名称、作者、单位、发表时间、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推荐单位或推荐人(限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书(约 500 字)等。参选作品请寄送 3 份(恕不退还)。参选的外文论著,请同时附中文译稿。推荐表格可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网站上下载。

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评奖工作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具体实施。参选作品和其他材料请邮寄至“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迎新 周小和

联系电话:6802 4467

E-mail:sunyefangjjh@sina.com

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西华饭店 329 室

邮政编码:100045

网址:<http://sunyefang.cass.cn/>

为促进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高金融研究水平,促进金融学术进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

金会今年特别设立“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其评奖公告可在孙冶方基金会网站查阅,敬请关注。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初选小组成员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名单:(按拼音排序)

白重恩 陈东琪 陈锡文 陈雨露 樊 纲 高世楫 郭克莎 韩 俊

胡家勇 李 扬 李 周 李剑阁 厉以宁 刘 伟 刘世锦 刘树成

隆国强 冒天启 钱颖一 田国强 汪丁丁 王 江 王一江 吴敬琏

肖 梦 许成钢 张卓元 郑红亮 周其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2014年7月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 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 征文启事

1984 年 9 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2012 年-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创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并连续举办两届莫干山会议，取得一批重要研讨成果。

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又是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再次牵头筹备“2014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拟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21 日在北京和浙江莫干山同时举办。会议主题暂定“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拟邀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和改革专家出席，特别是一些曾经对中国改革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知名学者。

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出席论坛，现开始在全国范围征文，对象为 55 周岁以下，对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问题有独立思考和深刻见解的中青年学者。会议鼓励作者以真切的现实关怀、深邃的历史眼光、宽阔的国际视野，融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法，科学研究我国国家治理中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全球战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金融改革、混合所有制、生态文明建设、边疆和民族问题等。

请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前将论文电子版（以及对论坛有关建议）同时发至：fcsunny627@gmail.com、brendaxiel04@163.com，或邮寄至论坛秘书处（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1 号 7 层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100045，请在信封注明征文投稿）。论文请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格式，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字数一般限制在 10000 字以内，并注明作者年龄、单位、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信息。论文评选工作将于 8 月底完成，并确定邀请出席莫干山会议代表名单，论坛秘书处还将为获奖论文进行奖励（2013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征文共评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3 万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2 万元；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1 万元。获奖名单见<http://mgs.icc-ndrc.org.cn/detail.aspx?newsId=3442&TId=57>）。优秀论文将推荐给国家权威学术期刊，并收录《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文集》。会议不收取参会费，提供免费食宿，交通费用自理（有困难可申请资助）。

有关“2014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会议筹备详情，请关注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官方网站（www.icc-ndrc.org.cn）。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组委会秘书处
2014 年 4 月 28 日